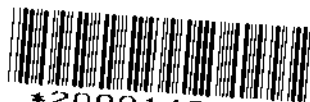


A

7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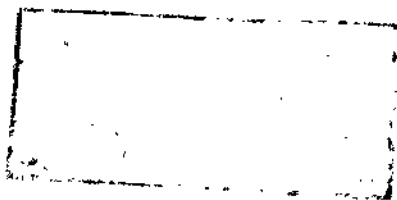


\*200014368\*

#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

王红续 宫力 喻晓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克敏  
封面设计 翟永蓬  
版式设计 冯力  
责任校对 苏彰秦

##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美]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

王红续 宫力 喻晓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57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035-0392-0/D·201

定价：3.10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              |         |
|--------------|---------|
| 作者的中文版序言     | (1)     |
| 序 历史研究需要开阔视角 | 金春明 (3) |
| 本书的国际反响      | (7)     |
| 导言           | (10)    |

## 第一编 毛泽东的思想及行为变化的轨迹

(1948—1965)

|                         |      |
|-------------------------|------|
| 第一章 毛泽东的进化辩证法           | (24) |
| 第一节 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           | (25) |
| 第二节 自发性与组织性             | (26) |
| 第三节 红与专                 | (28) |
| 第四节 大公无私与特殊利益           | (29) |
| 第五节 有计划的改造 (1949—1957)  | (31) |
| 第六节 急速的改造 (1958—1960)   | (34) |
| 第七节 改造人的思想 (1961—1965)  | (37) |
| 第二章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           | (41)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 (41) |
| 第二节 毛泽东的领导作风            | (44) |
| 第三节 毛泽东与刘少奇             | (46) |
| 第三章 冲突模式                | (52)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问题 (1952—1955) | (52) |

|         |                        |      |
|---------|------------------------|------|
| 第二节     | 农业机械化战略 (1958—1966)    | (54) |
| 第三节     | 对苏联模式的一致赞赏 (1949—1957) | (58) |
| 第四节     | 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1958—1960)   | (59) |
| 第五节     | 探索新道路 (1961—1965)      | (61) |
| 结 论     |                        | (64) |
| • 注 释 • |                        | (65) |

## 第二编 领袖的合法性

|         |                               |       |
|---------|-------------------------------|-------|
| 第一章     | 合法性的基础                        | (80)  |
| 第一节     | 超凡魅力型权威                       | (80)  |
| 第二节     | 个人崇拜                          | (85)  |
| 第三节     | 业绩标准                          | (87)  |
| 第四节     | 民族主义的作用                       | (89)  |
| 第五节     | 法定—理性型权威                      | (90)  |
| 第六节     | 传统型权威                         | (95)  |
| 第二章     | 毛泽东权威的变化特征<br>(1949—1976)     | (100) |
| 第一节     | 1949—1958：全面加强                | (101) |
| 第二节     | 1959—1965：游离于法定—理性型<br>与传统型之间 | (104) |
| 第三节     | 1966—1971：法治遭到破坏<br>超凡魅力大显其威  | (108) |
| 第四节     | 1972—1976：对领袖的传统性抵制           | (112) |
| 第三章     | 新一代领导人对合法性的追求                 | (119) |
| 第一节     | 华国锋的继承权                       | (120) |
| 第二节     | 卓越的邓小平                        | (127) |
| 第三节     | 向法定—理性过渡的不确定性                 | (131) |
| • 注 释 • |                               | (139) |

### 第三编 毛泽东及毛以后的正统原则 和谨慎原则

|       |                                   |       |
|-------|-----------------------------------|-------|
| 第一章   | 正统原则和谨慎的政治行为·····                 | (157) |
| 第二章   | 毛泽东时期稳定的上层政治<br>(1949—1965)·····  | (163) |
| 第三章   | 林彪的沉浮(1966—1971)·····             | (169) |
| 第四章   | “两条路线斗争”<br>(1972/73—1976)·····   | (178) |
| 第五章   | 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时代<br>(1976/77—1982)····· | (186) |
| 结论与展望 | ·····                             | (198) |
| ·注 释· | ·····                             | (201) |
| 译者后记  | ·····                             | (214) |

## 作者的中文版序言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中译本，我很高兴，十分感谢。同时，我也十分感谢把此书译成中文的中国朋友们。如果本书能为中国学者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中外学者之间相互了解的不断发展，是学术领域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1985年以来，我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受益匪浅。访问期间，我不仅与中国同行交流了学术观点，而且获得了更多的资料。尽管中外学者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学术交流对双方都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交流中已经发现了许多共同点。由此，我对中国政治获得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些都应归功于我所接触的中国学者。

本书初版于1984年，当时的中国相对来说尚处于改革时代的初期，资料的公布还不充分，我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还未展开。因此，与我以后的著作相比，开放政策给本书带来的益处就少得多了，书中的阐述也就难免存在不少的局限性。现在，有了近年来公布的新的中文资料做依据，我就可以纠正本书存在的许多失误了。然而，即使存在这些局限，当时我仍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比如认为中国政治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等等，而这些结论在写作本书的那个时期还未被人们所接受。至于本书的资料来源，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不够充分，我就谨慎地利用了其他来源的资料。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导致史实和分析方面出现了某些失误，但我希望这些失误保持在最小限度之内。我非常欢迎人们对本书进行各种具体的批评，诸如指出本书在何处由于材料不充分或者失实而造成了不正确的分析等等。

总之，中外学者可以从对方的著作以及双方直接的学术交流中得到启发，以利于双方学术水平的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学术分析和理论阐述而言，了解和参考各种观点，只能使中外学者均得到益处；就研究资料而言，当然中国学者更有优势，会给外国分析家更多的帮助。我相信，开放政策一定会使中外学者之间卓有成效的观点和资料交流继续发展下去。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

1990年7月于悉尼大学

## 序 历史研究需要开阔视角

近10年来，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研究和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党政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被较多地翻译介绍到国内。这对我国有关学科的发展繁荣起了有益的借鉴和促进作用。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在学术文化交流方面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

搞经济建设不能闭关自守，必须改革开放，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吸收全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借鉴各国的经验，才能使本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这种观点，经过10多年改革实践和建国4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已成为今日国人之共识。但是，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是否也必需如此？则至今尚不能说已经被得到公认。西方国家的学术著作大量涌入，会不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会不会造成“和平演变”的后果？这种议论虽然在公开报刊上很少见到，但在其他场合还是不时可以听到类似忧虑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纯一的东西是没有的，任何事物都包含两重性。关键的问题是看一个事物的主流是利还是弊，以及我们如何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取其利而去其弊。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发展、要繁荣，也必须走开放交流之路吗？回答是肯定的。在这里重温革命导师的教导，肯定是有教益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它的发展和繁荣必然是同整个人类文化的状况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化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sup>①</sup>“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的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sup>②</sup>

其次，封闭隔绝会使任何科学发展迟缓、落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也不能例外。恩格斯关于杰出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段评述，是颇能发人深思的。恩格斯说：“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sup>③</sup>“孤寂”的头脑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主义也是如此。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②以上全部引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347—348页。

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页。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能离开比较和鉴别的。毛泽东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sup>①</sup>不对外开放，不同世界各国学者交流，又如何能够充分地比较和鉴别呢？

总之，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没有对外开放和交流，是不能前进的，也不会繁荣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并不是无批判的、无选择的。我们有充分的主动权，能够而且应该择其优者，贡献给中国的读者和学术界。泰韦斯教授的这部著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被选择的。西方学者对这部书的评价颇高。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A·巴尼特认为它“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泰韦斯的所有论述和判断，都应该极其重视这些论断，因为它们极具启迪意义。对于所有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严肃学者来说，这部专著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竭力推荐。”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汤森也认为：“本书对任何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将大有教益，而且为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比较分析开辟了新的领域。”如此等等。

也许从一个角度观察，这样评价可能是合理的。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这样的评价可能是失之偏高的。首先，从方法论来说，作者早在1973年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颇

---

<sup>①</sup>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

为难能可贵的，提出的不少见解也是颇有见地的，能够给人以启迪。不过，作者所遵循的是西方流行的 马克斯·韦伯的定式，即把领袖分为三种类型：超凡魅力型、法定—理性和传统权威型。韦伯这种定式本身是否是科学的、准确的？也不是不可以怀疑和讨论的。其次，从历史科学的要求说，这门科学特别要求以确凿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为基础和前提。缺乏充分史实为依据的推断，即使看起来是颇为合理而诱人，也是很难成为公论的。而遗憾的是，这本书中的所有论断并不都能合乎这种要求。当然，这同作者所依据的是国外或港台的一些非正式材料有关系。作者本人也承认，书中的某些结论带有“推测性”和“思辨色彩”。令人感到遗憾的还有，书中不时可以看到用西方流行的权力斗争观点，分析中共主要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地方。这也很难认为是正确的。再次，对史料的分析上，也存在个别误解和偏见。如认为“政治挂帅”是“唯意志论”；共产主义“是一种对平均主义社会的憧憬”等。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学者来说，本来是很自然的，不值得奇怪的；而且从总体上来说，也并不妨碍这本书仍旧是一本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学术著作。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展卷有益”。只要自己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而且阅读对象又是经过选择的话，那么，这句话是言之不谬的。但愿每个读者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能够与我有同感。

金 春 明

1990年元月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 本书的国际反响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的这本新书，……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此书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泰韦斯是一位功力颇深的学者，他在著述中把细致的经验性研究同透辟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本书也不例外……作者将其分析集中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如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中国高层领导相互作用的特点以及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的作用及其变化。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泰韦斯的所有论述和判断，都应该极其重视这些论断，因为它们极具启迪意义。对于所有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严肃学者来说，这部专著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竭力推荐。”

——A·多克·巴尼特（绝大可）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泰韦斯教授的这部书，文笔流畅、简洁，富于创见，论证周密，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领导的动力。泰韦斯教授在论述从毛泽东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权威到1976年之后更强调法定—理性型权威的基本变化时，引证了有关中国政治的十分广泛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借鉴了韦伯的范畴和概念，并与苏联政治领导模式进行比较。他还深刻地分析了最高领导层发生的这种变化与调节、指导上层人物在中国政治中正统和谨慎行为为原则转换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对任何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将大有教益，而且为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比较分析开辟了新的领域。”

——詹姆斯·R·汤森  
华盛顿大学

“……泰韦斯对关于中国政治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挑战。他不赞成认为中国的政策分歧通常涉及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非原则的派别斗争的流行观点。他把1966年及其以前的毛泽东，描绘成一位可亲的统治者，因为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政治局委员们能够集体地和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良好气氛’。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畸形政治。当前，有些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政治，就带有这种畸形政治的特征。泰韦斯反对这种观点。因此，对于中国获得建立稳定的制度化政治体制的机会，泰韦斯比其他许多人更为乐观。这些论点值得认真考虑。”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密执安大学

## 导 言

本书论述中国体制最高层的领导政治。中国最具权威的团体，从狭义上讲，就是通常包括20—25位男性（而在1969年以来又有少数妇女）的政治局；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即中国各种组织的最重要的负责人，毛泽东曾经把这些负责人统称为800人统治中国。<sup>1</sup>最高层领导人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是什么？领袖——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以及近年来的邓小平——与其政治局同事之间，有着何种性质的关系？在最高领导人下面的这些显赫人物之间，出现过什么样的紧张态势？为了当代中国不同机构利益和整个庞大政府组织的利益，这些要人们的命运如何？在1949年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的这些不同方面是怎样演变的？

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带有思辨色彩。一般来说，任何政治制度中最高领导人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都鲜为大众所晓；在象中国这样的封闭体制中，人们则更加难以了解上层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然而，通过对已知材料的严格分析，还是可以获得成果，得出某些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性。况且，各个时期上层人物关系的公开程度是有很区别的。一般来讲，对于50年代中国的领导政治状况，人们了解得比较清楚。在这10年中，中共领导人对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详尽的讨论，包括最高领导人的详尽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

章，有时是作为个人意见发表的。<sup>2</sup>至于进一步的材料，可以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新资料中获取——尤其可以从迄今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不同选集中<sup>3</sup>，以及对高级领导人中所谓“走资派”洪水般的攻击中得到。关于后一种材料，其可信度通常是令人怀疑的。因此，将这些攻击材料，同眼下公布的文件加以认真的比较，才能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作出较为中肯的分析。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甚至对这一时期，这种分析也常局限于政治局内认可的观点。<sup>4</sup>

“文化大革命”中还“披露”了60年代初期的一些材料，但由于现在官方对这一时期提供的资料，数量少且质量下降，因此，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变得更为困难。<sup>5</sup>就“文化大革命”本身来说，从1966年至1968年，关于高层领导人之间充满冲突和普遍混乱的状况，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的红卫兵出版物，都提供了大量信息。然而，尽管对象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的活动，了解得比较详细，但对其他一些极重要的人物，包括毛泽东和林彪的作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由林彪之死而达到高潮的“文化大革命”后（注：西方许多中国学专家，通常把1966—1969年称作“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国内目前占支配地位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分期法不同——译者）的一段时期，是1949年以后中国领导政治中最模糊不清的一个时期。由于缺乏有关高级领导人之间分歧的具体材料，和关于林彪罪行除了有关他谋害毛的阴谋活动材料较多外，对于这一事件中其他活动却缺乏详尽的事后“揭露”，以及由于林彪倒台后官方作出的通常令人迷惑和矛盾的解释，<sup>6</sup>所有这些都使得对这一事件的任何分析，包括本书第三编作出的分析，都比其他时期的分析更带有推测性。



关于毛泽东最后数年的生活，分析起来也有许多困难。但是，当时官方出版物上进行的论战、海外可以弄到的内部文件，以及所谓“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揭露”，为说明1972—1976年这一时期高层领导人的内部斗争，提供了基础材料。最后，对于毛泽东逝世后的时期，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有所增强。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许多问题和政策抉择作了更有变动性和坦率的官方讨论。此外，还由于亲共产党的香港报纸和杂志，透露了更多的新的“内部”材料。<sup>7</sup>但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前那样，中共旨在维护领导人团结一致形象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上述有利条件。因此，虽然没有哪一个时期提供的材料，足以充分详细地描绘高层领导人之间冲突的情景，然而，这些资料对于论证本书提出的关于中国领袖政治的一般论点，却是绰绰有余的。

本书第一部分的最早问世，几乎是在10年以前，但没有在美国发行。<sup>8</sup>这一编集中论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领导的冲突和政策的变化。写作这一部分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种新的模式开始流行于对中国政治的分析。1966年前，作为北京自己强调领导团结统一的反映，学术研究中提出了一种高层领导人相互关系的共识模式。在这种领导人关系中，强调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相互配合，相信同一类价值观念，由此抑制了相互冲突的产生，并在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事之间存在着相互间高度的忠诚。<sup>9</sup>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大多数分析家似乎不再使用这一模式。为了弄清当时明显出现的动乱和分化的意义，许多学者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模式，即回过头来从中国术语中吸取营养的解释方式——“两条路线斗争”解释模式。

正如本书这一编所讨论的那样，“两条路线斗争”模式

强调，不断展开的斗争导致了领导层的分化。一些严肃的分析家，采纳了北京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分法。此外，其他各种两分法也在文献中大量出现。除了个人化的拥毛派与拥刘派的划分外，还有许多将官方说法加上社会科学概念的例子：动员化与制度化、革命现代化派与管理现代化派、积极分子与专业人员、平等与效率，等等。当然，还有不采用“两条路线”分析模式的明显例外。<sup>10</sup>可是，运用这种分析思路的人，经常在思索的一般水平上，以及在诸如领导层何时发生分化，一些特殊的插曲应作何种解释，以及毛泽东的权力的摆动幅度等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差异。然而，70年代初期（和这个时期以外的数年里），充斥于许多文献中的，包括对毛泽东的中国持同情态度学者的著作中，以及那些抱有更为偏颇态度人们书中的观点，就是把高层领导政治，看作两种明显对立的社会观念和有关政策纲领之间的斗争。<sup>11</sup>

因此，当时写的本书第一部分，是作为对“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批评，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这种解释思路，集中论述变化着的作用和观点，以作理解中国领导政治的钥匙。虽然这种解释方式，具有“以毛泽东为统帅”<sup>12</sup>模式的特点，但决非打算要过分地这么做。本书表明，这种解释当然没有认为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观点不存在严重分歧。书中也没有执意主张说，政策的变化，仅仅是毛泽东思想变化的结果。这一点也许表达得不那么清楚。毛泽东为了对一些真正的压力作出反应而采取行动。同时，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和行政的限制，许多途径对他不开放，或者是蓄意不让他那么做。这一编所描绘的，是毛泽东作为高层领导政治中至高无上、无人堪与匹敌的轴心——一位主宰一切的

领袖。用这一观点来看，其他所有领导人都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同毛泽东继续保持友好亲善关系。此外，当他被充分唤醒时，不仅能重新调整主要政策，而且能够重新规定这一政权的总的方向。

虽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方法没有取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主题，而给予前“文化大革命”政治的分析以深透的影响，但是，部分地由于这一次和以后的批评<sup>13</sup>，以及更根本地由于疏远“文化大革命”的用语，因此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两条路线”的叙述法用得越来越少。相反，竞相出现了一些更成熟的方法，包括复合党派模式、对冲突的部门机构利益的详尽分析、对社会的和经济条件限制的强调，以及对以前政策出人意料的后果的重视等。<sup>14</sup>然而，甚至在80年代里，“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变种依然存在。<sup>15</sup>所以，本书重新刊出这一部分，一方面是由于“两条路线”解释法的影响尚存，一方面是为了让从前未曾读到此文的美籍读者看到它，而主要是因为我相信，它关于前“文化大革命”领导政治性质的分析要点，仍然具有说服力。这次基本上按原样印刷，只是鉴于风格的统一，作了少量编辑加工，并在某些地方，对意思作了细微的改动。此外，经过再三斟酌，在我认为有必要作出某种说明或更正的地方，加上了一些解释性的注脚。

本书第二、三编，分析了直到目前为止的中国领导政治。因此，在这两编中，除了继续考察1949—1965年间的领导政治外，还考察了同上述时期有着根本差异的时期。首先，考察了毛泽东最后10年中的强烈冲突。至少在1972年至1976年间，的确展开了某种纲领十分显明的“两条路线斗争”——尽管毛泽东的立场并不那么容易确定和划分。虽然如同第

二编所着重指出的那样，到了毛泽东逝世前夕，他的无上地位比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受到重大的削弱。但是，整整10年中，这位主席仍然在中国政治力量对比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后，分析了后毛泽东时代迥然不同的领导政治类型。在后毛泽东时代里，没有哪位领袖拥有如同甚至毛泽东在1976年临终时保持的巨大权威或权力。虽然，正如后两编所论述的那样，邓小平复出后很快成为举国公认的领袖，但如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更加集体化的模式，高层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呈现许多分支。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编论述了第一编所放过的问题。鉴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认识被后一时期林彪的儿子所证实：1971年，他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sup>16</sup>——第二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承认毛泽东的政治技能、无情和某些时候的“分而治之”策略以外，<sup>17</sup>这一编还以更多的假设作为分析的前提——真正的权威和合法性。对于解释甚至在自己的行动受到周围的利益集团和高级同事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性质这一现象，借助于这些概念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考察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的两个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一，毛泽东能够发动反对实际上所有重要机构的利益和大批现存高级领导人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连刘少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的主攻对象）都被轻而易举地拉下了台，这些都表明了人们对这位最高领袖权威的服从。接下来，在10年后，尽管毛泽东病情沉重，以及众多高级领导人信任邓小平，并且拥护邓为中国未来发展所作的规划，但毛泽东依然再次罢黜了邓小平，这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如同过去一

样，许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在支持毛泽东。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些势力比起它们所暂时战胜的力量来，要薄弱得多。其次，用其他领导人接受毛泽东的指挥的说法，要比用争强好胜、劝说并建立占统治地位的联盟这一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过程论，能够更好地说明毛泽东何以具有压倒一切的能力。

对1949年后中国领导的合法性，我作了稍微系统一些的论述。查默斯·约翰逊，对合法性问题作了著名的分析。<sup>18</sup>一般是从把人民视为整体的看法出发，将其分析焦点放在整个体制的合法性上面（或者说放在党和政权上面）。<sup>19</sup>本书的分析重心与之迥然不同。它所考察的合法性，乃是领袖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不是人民，而是最高政治领导人。虽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制度和领导人的合法性是相关的，因而应当在讨论中加以考虑，但人们又认为，领导集团对领袖地位和权威的接受，是高级领导人相互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所关心的，是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人，为什么和在何种程度上，把个人视为他们的合法领袖。

开始进行这一研究时，我运用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超凡魅力的、传统的和法定—理性的权威的三种类型学说，还使用了在研究苏联式政治体制中的合法性时形成的一些概念。<sup>20</sup>书中尽管同意大多数分析家关于毛泽东的权威主要具有魅力特征的观点，同时，这一编还考察了其他合法原则的作用，提出了这些因素长期以来与魅力的要求是怎样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的问题，并且试图确定各个时期毛泽东的权威变化的程度。当分析延伸到后毛泽东时代和继承政治时，一系列新问题又提了出来。各种人在什么基础上要求合法的领导？在最高领导人们中，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要求？这

一时期出现并非非常强调的集体领导，怎样影响了领袖的权威？最后，近年来，将整个体制的合法性的基础，从魅力型转向法理型的努力，怎样影响了领导政治？

最后一编，对高层领导政治采用了另一种考察视角。不是象前几编中那样，把考察集中在最高领袖身上，而是通过研究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来考察这一体制的高层政治现象。至高无上的毛泽东在世时，这些高级领导人是怎样保护和增加他们的利益的呢？他们采用了何种政治行动战略？在何种程度上，人们能够采用政治领导人旨在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而应当遵循的行为模式——谨慎原则呢？由于毛泽东的去世，这些规则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改变？此外，对于高层人物可接受的行为方式来说，这些谨慎原则是如何与这一体制的正统原则相关联的呢？

在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地提出了政治战略策略问题，但几乎没有谁把政治战略策略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来研究。纵然这么做了，其研究重心一般也是各不相同，或者远没有达到其研究的目的。例如，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对中国制度下人们谋求晋级发展的各种方式作了很有影响的研究，但只是笼统地论述了中国人拥有的机会和职业选择，而不是专门考察高级领导人的晋升机会和职业选择。<sup>21</sup>另外一些研究著作，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官员采取的各种生存战略和策略。<sup>22</sup>还有一些著作，分析了在一些特殊时期里，政治局一些成员的战略。<sup>23</sup>然而，本书第三编不仅把研究中心放在中国体制的最高层上，而且试图对1949年后整个时期处于这一层次领导人的战略策略进行研究，概括出他们维护或提高自己地位的“原则”。如同第二编那样，本编区别了各个时期大不相同的环境。对相对稳定的前“文化

大革命”时期的谨慎原则作了概括考察之后，就开始考察极其混乱的1966—1976这10年：首先考察了林彪初次运用的战略，接着考察了“四人帮”与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遵循过去路线的党和国家行政管理家运用的战略。通过将 these 情况与前一时期的情况相对照，第三编分析了谨慎原则怎样受不断变化的情况所影响，以及正统原则对这一过程的十分重大的影响。

最后，第三编考察了后毛泽东时代——这是继承政治时期，而非继承斗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如同本编的分析所表明的，尽管华国锋成为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但邓小平很快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虽然是与毛泽东远为不同的领袖类型。接下来，探讨了华国锋拥有何种保留自己形式上的地位的机会，论述了谨慎原则对邓小平实施其领导的限制，以及整个领导政治的含义。因此，最后一编，对于中国最高层领导政治怎样从毛泽东以超凡魅力为基础的统治，转变到他的接班人更带集体性的和限制性的领导体制，做了概括性的考察。

## 注 释

1. 参见肯尼思·利伯索尔：《1949—1975年中国的中央党政会议研究指南》（纽约州利皮特：国际文理出版社，1976年），第3、36页。
2. 这是1956年中共八大特别申明的一个特色。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24页。
3. 最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二卷本，台北，1967年，1969年）。
4. 关于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时政治局的态度的分歧，参见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1950—1965年间的整顿和

- 党的规范的偏倾》(M·E·夏普出版公司,1979年),第247—257页。
5. 参见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和方法论问题》,载于A·多克·巴尼特所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一书第580—581页。
  6. 参见迈克尔·Y·M·考编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纽约州利皮特:国际文理出版社,1975年)。ix、xliv—xlv页,和文件第5—12、14—22页。
  7. 最著名的月刊《争鸣》,通常支持与邓小平相联系的“改革”政策。
  8. 它在美国信息服务处的香港刊物《时事舞台》1974年1月号 and 2月号上,分两部分发表。1973年,美国信息服务处开始改变发行规定,不让《时事舞台》在美国国内发行。
  9. 参见卢西恩·W·派伊在《中国政治中的派系和舆论动力:一种模式和若干命题》(桑塔莫尼克:兰德公司报告,R—2566—AF,1980年7月)第41—45页中,对中国政治分析的模式变化所作的评论。
  10. 尤其得参见W·F·多里尔早些时候的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形成过程中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桑塔莫尼克:兰德公司备忘录,RM—5731—PR,1968年8月),其中批评许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的“两条路线”的论述;并参阅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毛泽东领导下的政策制定述略,1949—1968年》一文中有关以毛泽东为中心的论点,该文载于约翰·M·H·林德贝克斯所编《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一书。
  11. 参阅理查德·M·普费弗对理查德·H·所罗门所著《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书的评论:《造反:评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一书》,见1973年12月号《关心亚洲学者公报》。普费弗在抨击所罗门心理—文化分析的“(反华)思想热情”之后,却又去赞扬他解释1955—1964年间高层政治的“两条路线”模式(参见第48页和第52—54页)。



12. 参见埃利斯·约菲《两次全会之间：中国领导层的内部冲突，1959—1962》（安阿伯：密执安中国研究文集，1975年第22期），第1—3页。
13. 特别要参见洛厄尔·迪特默《理论和实践中的“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再思》，《中国季刊》第72期（1977年）；以及安德鲁·J·内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波动述评》，《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
14. 参见派伊《中国政治中的派系和舆论动力：一种模式和若干命题》，戴维·M·兰普顿《中国的医药政治：1949—1977年的政策过程》（波尔德：西方观点出版社，1977年）以及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的《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这些书是前述方法的例子。虽然，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提出了类似的思路，乃至兰普顿和斯塔维斯作的老练分析包含了“两条路线”解释法的基本要素，但是，70年代初期“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对学术著作的全面影响，比起70年代末期要大得多。
15. 例子参见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政治和大学招生，1949—1978年》（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路易斯·T·西格尔《论“两条道路”和走我们自己的路：“资本主义道路”的神话》，《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7期（1982年）。
16. 《“571工程”纪要》，见迈克尔·Y·M·考所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92页。
17. 参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在《政治领袖》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该文载于迪克·威尔逊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77—81、91—95页。在我看来（参见本书的第三编），虽然在30年代夺取权力过程中和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的确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从40年代初巩固自己的权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分而治之”策略并不是毛泽东领导风格的一个主要方面。
18. 参见约翰逊的《共产党中国权威的性质变动和轨迹》，载于林德

贝克《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一书。

19. 由“文化大革命”引起这个观点的一个变化，就是强调党和领袖对合法外衣的相互冲突的要求。有关分析参见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的《中国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书中若干作者的文章。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党》，本杰明·I·施瓦茨的《善的统治：对“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领袖的进一步考察》，和伦纳德·夏皮罗和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极权领导人治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
20. 参见T·H·里格比的论文：《研究苏联权威、权力和政策的概念方法》，载于T·H·里格比、阿奇·布朗和彼得·雷得韦编的《苏联的权威、权力和政策》（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0年）。另见T·H·里格比和弗朗克·费尔的《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2年）一书中《绪论：政治合法性、韦伯和共产党的单一组织体制》。
21. 《共产党中国的晋升和进步：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成功阶梯》，载于刘易斯《中国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
22. 参见罗伯特·A·斯卡拉支诺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层人物》（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书中所载：帕里斯·H·张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省级领导人的生存战略》，和理查德·鲍姆的《高压状态下上层人物的行为：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的教训》。
23. 例子参见帕里斯·H·张：《在中国政治角逐中谁得到了什么，以及时间和方式——“四人帮”斗争策略的案例研究》，见《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1979年）。

## 第一编

# 毛泽东的思想及行为变化的轨迹

(1949—1965)

---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中国政治以前那种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政治，强调稳定和团结的领导层，强调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毛泽东与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具有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毛泽东的革命价值观念的组织体现。在对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性的重新解释中，出现了一种流传很广的倾向，它所采用的概念，尽管有着重要变化和修改，还是来自北京自己提出的政治冲突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拥护这一观点的人持的基本看法是：长期以来，两条互相对立的道路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政治的突出特征。一条道路是由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致的人所主张，他们要通过群众动员来实现现代化，并十分关心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纯化。灰色的党的机构遵循相反的道路，专心致志地完成平淡的生产和经济发展任务，处理中国问题时拘泥于合理的战略，并醉心于现存体制的有秩序的发展。刘少奇是后一种途径的代表人物，并领导党的机构遵循这一路线。

依照“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这两种道路在50年代初期只是出现了潜在的分化，但在大跃进以后的时期（1958年以后）中——或者如某些分析家所提出的那样，时间更提前了一些——这两条路线开始进入互相对立的阶段。鉴于每种立场的倡导者之间发生重要的和经常是尖锐的冲突，党的政策便发生摆动。由于毛泽东有时在权力上遭受严重损失，两种途径间的政治平衡常常呈现微妙变化。本编对上述观点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并对“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政治冲突和政策变化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

\* 下面的解释，并没有在各个细节上与“两条路线斗争”分析的个别例证相矛盾。我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首尾一贯的阐述。这种阐述在具体问题上，也许会或者不会与这种分析相对立。但是，我在书中又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一般观点：具有两种不同立场的领导层的分化；主要反映这两种立场之间不断冲突的政策变动，以及毛泽东的权力的重要变化。

## 第一章 毛泽东的进化辩证法

无可否认，领导层的观点分歧，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党的政策发生变动的一个因素。然而，同样清楚的是，无论就具体政策而言，还是就对自己思想观点不同方面的侧重而言，毛泽东本人都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毛泽东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导致这种立场变化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把世界看成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其中的根本问题，或者说“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毛泽东在总结展示党的政策发展的一般方向时指出：“反右必出‘左’（倾），反‘左’必出右（倾）。”因此，不管每次调整政策的时间多么短暂，采纳新措施以纠正不可避免的错误的过程总是需要的，总是持续的。

从另一种非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可以把毛泽东观点上的侧重变化视为一系列矛盾因素之间动态关系的结果。这些矛盾因素，时而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时而另一个方面占优势。各种因素的变化程度，与社会趋势的“科学分析”联系得不够紧密，而其他如对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的一般心境和他的同事的评价等，常常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用来表明截然不同的政策的合理性。况且，毛泽东承认别人也许会选择他的著作的不同部分来论证相互冲突的立场的可能性：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

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sup>2</sup>

所以，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中的矛盾倾向，不论是来自毛泽东对特定形势的尖锐分析，来自他当时的个人成见，抑或来自其他人应用他的思想来解决当前问题的努力，在解释变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都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因此，有必要比较具体地考察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中的矛盾方面，既包括一些特殊的矛盾范畴，也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在1949—1965年间的演化。

### 第一节 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关于历史过程中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的作用问题——是经济基础决定和限制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还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可以造成根本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人控制武器”和“政治挂帅”等命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根扎得尤其深。它主张，不管物质条件多么差，一旦把人的主观意志力量因素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就根本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毛泽东1955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

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sup>3</sup>

然而，坚持对政治和经济的客观状况进行现实主义的估计，并据之调整目标和方法，这一明显的告诫，又减轻了毛泽东对主观作用的信仰。不应当忘记，就革命战略而言，毛泽东认为不可能速胜。他认为，在决战时机成熟之前，必须采取灵活的、适中缓和的政策，要保存力量。<sup>4</sup>同样的现实主义也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活动中的一个经常性特征。这一特征甚至在他以加快发展速度为基本目的的时期中也呈现了出来。这样一来，在1956年初，鉴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突如其来迅猛发展的形势，毛泽东警告“‘左’倾冒险主义”，并声明：

“应当把无法做到的东西从我们的计划中去掉，使计划放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sup>5</sup>毛泽东注意到客观的限制，同时，他认为，主观因素在某种情况下能够相当大地改变物质现实。虽然这两种态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不相容性，但是，在实际上认为可以办到任何事情，同时又警告说很多事情仅仅是愿望而不能化为现实这两种态度之间，却存在深刻的冲突。

## 第二节 自发性与组织性

一旦承认毛泽东更加偏重依靠主观因素，在如何使主观因素发挥作用问题上，他的思想便清楚地带上进一步的矛盾色彩。对群众的自发创造性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强调？对党的领导给予多大程度上的强调才合适？在1955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加的一段按语中，他对群众的潜在创造力作了一个有力的说明：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sup>6</sup>

毛泽东十分相信群众。他经常说群众具有拥护社会主义的自然倾向。<sup>7</sup>他强调民主讨论，强调下放权力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便是他相信群众的体现。况且，毛泽东还流露出这样的担心，怕组织会成为对人产生强大压迫作用的东西，以致窒息了群众的创造性。<sup>8</sup>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的信任，又与他对自发行为可能导致的结局的深切忧虑相抵触。毛泽东不仅认为“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那么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sup>9</sup>他还进一步把群众看作容易接受“自发资本主义”和社会上其他“歪风”的人们。<sup>10</sup>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深刻地分析说，群众中甚至只有一小部分是“比较积极的”，而绝大多数人是处于摇摆状况中的“中间分子”。<sup>11</sup>因此，尽管担忧领导对群众的创造性会有某种潜在威胁，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毛泽东还是承认组织的主导作用。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对秩序和纪律方面大加抨击。<sup>12</sup>而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却仔细地用群众的创造性来证明和肯定组织的重要，甚至在他批评领导落后于群众时也是这么做的。<sup>13</sup>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才暂时地认为群众的自发性高于有组织的领导。接着，他又从无政府主义的边缘往回走。<sup>14</sup>但是，即使在1966年前毛泽东的思想中领导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上述两者间的矛盾也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发生反复无常的影响。



### 第三节 红 与 专

虽然毛泽东把“又红又专”——即政治上纯洁，专业上精通——作为理想干部的条件，但二者之间显然有矛盾。究竟以何者为主？毛泽东提倡“红”，并不仅仅指要求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工作高度忠诚、努力。它还要求干部排斥狭隘的业务至上论。毛泽东在评论教育时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我曾跟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sup>15</sup>

尽管毛泽东蔑视饱学之士的自命不凡，并对他们的很高社会地位表示不满，他还是承认需要先进知识，尤其需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最新知识。他还进一步指出，过分强调政治，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毛泽东看来，对政治讲个不停但缺乏政治才能的人，是不值得一提的。<sup>16</sup>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红与专两个因素保持适当平衡的问题。但是，虽然在理论上两者间的综合平衡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毛泽东的变化着的政策，表明他对红与专程度不同的关心和重视。

#### 第四节 大公无私与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对一种平均主义社会的憧憬；问题只是要在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任何既定阶段上，决定可能的或者所要求的平均主义的不同程度。毛泽东总是十分强调缩小社会里的各种差别，并且通过灌输共同富裕的思想来激励人们。也许，他更关心的是社会不平等和追求个人的或小集团的利益，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一点在1963年至1964年同苏联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毛泽东是这次论战的主要撰稿人）。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中，毛泽东把当时的苏联社会描绘成一幅灰暗的图景。他显然认为中国社会的一些倾向与这种情形有关：

绝不能设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经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统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赫鲁晓夫）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sup>17</sup>

尽管这么想，毛泽东还是认可了对不平等和自私自利所作的斗争给予的实际限制。他常常倡导对各种社会阶层特殊利益进行让步的灵活政策，并承认有必要提供物质利益以获取人民的支持。<sup>18</sup>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个人的和集体的利益都是自然的和适当的：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sup>19</sup>

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才完全抛弃这种对个性的容忍。当时，哪怕是对个人利益的最轻微的考虑，都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态度的波动，在1966年前的十几年间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毛泽东的思想中矛盾侧面的起落，在1949年以后的各个时期都呈现出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侧重点的重大变化和整个观点，都得到了展现。可以勾勒出三个主要时期，每一时期都与中国共产党政策指导上可以看到的阶段相联系。在第一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经验。1958年至1960年这个短暂的第二个时期，是同大跃进这一史无前例的发展战略紧密相联的。最后，从1961年至1965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沉思，表示了对整个党的新发展方向的犹豫不决

的探索。

## 第五节 有计划的改造（1949—195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头8年间，毛泽东的思想以乐观主义和自信为基本特征。虽然，毛泽东指出，为了防止倒退，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步骤，<sup>20</sup>但是，他却没有表示出对不可避免的向共产主义历史进军的任何怀疑。在毛泽东的眼中，事情正在基本上按照计划展开，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1955—1956年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关系模式上，因而欢呼这个运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它给中国的国内形势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sup>21</sup>

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宣称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提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而毛泽东1956年的观点也与此论的态度相去不远。诚然，后来毛泽东承认，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曾经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只剩下少数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sup>22</sup>可以肯定，对1956年末的波匈事件以及1957年春百花齐放运动中突如其来的一阵批评，作了一番思考之后，毛泽东开始日渐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上。然而，一般来说，在建国后最初8年中，毛泽东的态度是相对克制和乐观主义的。正如他于1957年所说的那样：

要使它（指社会主义制度——译者注）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

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了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sup>23</sup>

毛泽东的乐观，还进一步反映在他的如下论断上：1957年进行的运动——党的整风和反右斗争——已经取得了政治和思想战线的基本胜利。<sup>24</sup>虽然斗争也许并没有真正熄灭，但它无疑得到了控制，而且良好结局是无可怀疑的。虽然在1949—1957年间，毛泽东时常号召发挥主观力量以达到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他一般地是提倡认真看待客观的限制，注意有计划、分阶段地发展。<sup>25</sup>甚至在特别强调主观因素之时，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组织仍然明显地比群众自发性更受重视。所以，尽管毛泽东对人民的创造性有某种夸大的说法，但他实际上却倡导谨慎和注重领导方法：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

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  
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  
法……从其中（全面规划中）拟定年度规划……<sup>26</sup>

毛泽东还把技术能力摆到高度受重视的地位上。虽然在  
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对过分精心设计的教育抱有偏见，<sup>27</sup>但他  
极端重视从苏联那里学习科学和教育。<sup>28</sup>何况，在提倡大学  
中的政治教育时，毛泽东把政治教育只作为专业的常规课程  
的补充，对专家也没有表示怀疑。<sup>29</sup>最后，50年代初、中期  
的毛泽东，尽管对不平等表示关切，并急切地采取措施与之  
斗争，<sup>30</sup>但对个人与集体的合法利益（用他的术语说）也是  
关心的，并且竭力为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  
的平衡而努力。<sup>31</sup>

总之，对1949—1957年期间毛泽东言论的考察，表明毛  
泽东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虽然在某些时候，在具体问题上他  
站在众多同事中左的一方，但他决没有扮演一个激进思想家  
的角色。\*毛泽东显然认为自己在左与右两种倾向之间走着  
中间路线，<sup>32</sup>时机到来有某种需要时，就作出相对小的转变。

---

\*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例外。毛泽东逝世后，廖盖隆作  
的一个内部党史报告《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1980年10月25日）  
（英译文载于1981年11月号《问题与研究》第88页），将毛泽东“左”的思想的  
起源，追溯到他1955年所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仔细阅  
读这个时期毛泽东这个序言和其他言论，的确能体察到他向激进主义方向的一  
种微妙转变。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当毛泽东1955年年中发起加速农业合作化运  
动时，他的立场分明更加中庸（参见后文），甚至在1955年底至1956年初毛泽  
东高度乐观之际，他还继续警告“左倾机会主义”的过分行动，并且他于1956年  
春退回到一种更加强调平衡的观点上去。

## 第六节 急速的改造（1958—1960）

毛泽东极其赞同的大跃进，<sup>33</sup>标志着他的整个观点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乐观，但不再有检验苏联模式时的那种十分自信和有把握的乐观。相反，这一时期的乐观是一种远为激进主义的乐观，期望取得迅速突破和惊世骇俗的成就。1958年1月，毛泽东着重表达了这种态度：

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来看来是有希望的，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15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

……

现在群众热潮好象原子能，发出了热力。15年后，要搞4000万吨钢，5亿吨煤，40万千瓦电力……为达到这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起勇气，力争上游。<sup>34</sup>

虽然大跃进战略和人民公社带来的许多问题影响着毛泽东的乐观，但他仍对前途充满信心。根据他于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对形势所作的概括，“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sup>35</sup>

毛泽东在乐观日增的同时，对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很少去想。起初，他并没有改变他关于在政治和思想战线已取得基本胜利的判断。相反，他认为“不断革命”正迎接新的任务：“从今年（1958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sup>36</sup>只是在大跃进遇到庐山会议上党的最高层的重大反对时，毛泽东才说阶级斗争是长期

的生死搏斗过程，这一斗争将继续 20 到 50 年。同时，他说，过去没有讲过阶级斗争是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思想引起的（作者在转述毛泽东的话时有误。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不是说“过去没有讲过”阶级斗争…而是说对阶级斗争问题“过去没有讲透”。——译者注）。<sup>37</sup>这一说法表面上看不一定真实，但表明他过去没有强调这个问题。

在对大跃进的期望暗淡下去之前，毛泽东将主观因素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的，是他对中国“一穷二白”（不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科学的低水平）特点态度的变化。1956年，毛泽东将这一特点既视为一个弱点又看作一个优势：作为弱点，它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客观限制，然而它又是一种主观力量，因为人们要求改变它，并且“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sup>38</sup>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避而不谈“一穷二白”包含的一切弱点，只强调“一穷二白”积极的一面。<sup>39</sup>

根据主观力量的性质，毛泽东同样对群众的创造性空前推崇——但没有以削弱领导为代价。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农村时的讲话，可以表明这一点：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sup>40</sup>

毛泽东虽然肯定群众的巨大能量，但他仍然确定无疑地认为，在动员群众和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方面，组织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然而，这将是一种与前一时期有很大不同的组织类型。这种组织去除官僚机构，能够直接联系群众。在工作方法上，认真的计划被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的特别方法所替代。毛泽东用一个湖南民谣描述这种方法说：“草鞋无样，边打边象。”<sup>41</sup>只有那些不循先验观念行事的领导者，才能够与群众的创造性结合起来，并使之得以充分发挥。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期望红与专的结合；他抨击“空头政治家”和“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然而，他的新公式包含着强调红的重要性的明显变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思想政治工作统帅，是灵魂”<sup>42</sup>。这一态度通过贬低正规教育而得到进一步表达；1958年，他说，他再也不能忍耐怕资产阶级教授这种现象，并且宣布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内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sup>43</sup>虽然技术能力仍然必需，但毛泽东把它视为在工人和农民的常识中而非在受娇宠的大学教授的专业知识中可以找到的能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也标志着毛泽东更加强调平均主义，更加诉诸意识形态。当他的确承认个人的物质需求时，与其说是出于认识到个性的适当作用，不如说是出于纠正正在追求平均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偏向的实际需要。况且，毛泽东认为，在纠正这些过分行为之后，还要向着一个既定的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继续前进。<sup>44</sup>

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受到如下设想的激励：设想要迅速发展经济，设想完成一个由群众的创造性与大胆、灵活的领导相结合而促进的技术革命，设想构造一个以空前的速度消灭种种不公平的社会。毛泽东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平衡左和右的倾向，转而偏爱左的综合。<sup>45</sup>虽然，毛泽东把自己称为

“走中间道路者”——称之为“中左主义者”会更加确切些——但是，毛泽东不再告诉人们说，左和右具有同样的危险性，都要避免。<sup>46</sup>甚至当毛泽东在1959年底（实际上是1959年4月29日——译者注）呼吁更加现实主义之时，他的倾向仍然明显存在：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sup>47</sup>

可见，当毛泽东的设想逐步落空时，他仍然怀抱还要实现其激进目标的希望。

### 第七节 改造人的思想（1961—1965）

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早些时候百花齐放运动的缺点和不断加剧的中苏分裂，显然使毛泽东开始从灵魂深处寻找原因，开始放弃他从前的乐观态度。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将存在着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环绕这一中心概念，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具体化：

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而……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

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sup>48</sup>

在此，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结局持怀疑态度。对向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进军的信念失去了；相反，却认为倒退到修正主义是可能的，的确甚至在中国，这种情形也会出现。<sup>49</sup>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中，毛泽东的头脑中日益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他领导的革命堕落下去。可是，最初，毛泽东还认为政府的工作必须照旧进行。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工作和阶级斗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且，“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sup>50</sup>然而，鉴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性质作出的长期严重性判断，显然不能期望政府的日常事务与阶级斗争没有任何牵连。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日益重视主观因素。但是，比起大跃进时期来，他这样作是基于一种十分不同的认识。他没有忽视客观现实，相反，他强调需要加强实践以掌握这些现实。<sup>51</sup>他对主观的关切，反映了他有如下认识，即思想准备不够充足，在解决发展经济基础问题之前，有必要作出具有长远影响的努力，使上层建筑革命化。所以，毛泽东心情郁闷地考虑到个人道德的缺点，以及对社会态度作一番深刻改造的必要性：

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

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sup>52</sup>

鉴于这种观点，针对那些主管文学艺术和教育（改造个人思想的关键战线）的领导人，毛泽东这一时期所作的最尖锐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通过号召更加关心群众需要，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但他并没有对群众的创造性表示特别的信任。的确，在关系到形成人们思想态度的关键领域中，他把问题视为主要是有无足够领导的问题。<sup>53</sup>但是，尽管毛泽东承认需要加强领导，他又日益反感的是“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sup>54</sup>虽然毛泽东还没有在理论上排斥或者贬低组织的重要性，但他对“官僚主义”组织的这种厌恶情绪，已经十分强烈地流露了出来。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他关于“红与专”、平均主义和个性的两重性的评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虽然，“红与专”的目标已经得到官方的再次肯定，但是，毛泽东却日益怀疑起专家来。他把专业知识视为十分深奥难解的学科训练。这种知识对国家的进步不能作出具体的贡献。<sup>56</sup>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因为，它使年青人学习负担过重，从而使之不能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sup>56</sup>尤其有害的专业资格，会成为维护特权地位的理论基础。<sup>57</sup>除了专业知识造成的不平等外，毛泽东还不安于城乡差别、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于群隔阂会发展成为一种对抗性的阶级斗争。<sup>58</sup>

虽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既没有要求建立大跃进时期的那种激进的组织形式（以期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也没有要求最终否定个性（“文化大革命”则以否定个性为特征），但是，深深困扰着他的，是他认为的对社会公平的威胁。

总之，在大跃进后的若干年中，毛泽东是以心事重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刻困扰着他的，是革命可能夭折、堕落的可怕景象。毫无疑问，他认为主要危险来自右面，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虽然，对毛泽东来说，需要对其战斗的丑恶东西一目了然，但是，他却没有表明自己有一套打败它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似乎甚至对一些基本因素都把握不住，比如群众的潜在作用，以及日常工作混乱的可容忍程度等。这种不确定性，加上他对前途的忧心忡忡的不祥预测，也就构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背景。

## 第二章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

要想估价毛泽东变化着的思想焦点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程度，\*就要求对如下几个关键因素作一番考察：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中的权力和地位，指导毛泽东与其同事相处的行为准则，以及毛泽东与庞大机构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将探讨对“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政策冲突所作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是否具有充分的根据。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企图描绘出一幅毛泽东遭到了广泛反对的画面，但对这些材料进行一番仔细阅读，却会证实过去关于毛泽东的一致看法，即从1949年至1965年自始至终，毛泽东在领导层中的绝对权威都是稳固的。显然，毛泽东的声望有起有伏，但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说明，他的同事一贯将他看作有最后决定权的人。高层会议的报告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尽管其他人常常被称呼为类似的“少奇”或者“小平”，而毛泽东几乎总是被尊称为“毛主席”。而且，党的领导人显然重视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并

---

\*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能完全决定政治结局。因为，显然他的观点同时也是受特殊情况的影响而形成的，并且政治过程的许多方面超出了他（或任何人）的控制。这里所主张的是，一旦一种特定形势造成变革的压力时，那么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便成为导致最高层政治反应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一般地认为这种态度对他们的前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刘少奇要留给人们一种与毛泽东很亲密的印象。<sup>60</sup>彭真最初试图在处理吴晗事件——这一事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继而又企图让别人相信，他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sup>61</sup>罗瑞卿担心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会损害他的政治前程。<sup>62</sup>毛泽东让出一些具体职权，是出于自愿<sup>63</sup>（有时人们却把这些现象看作毛泽东权力下降的证明）——这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的标志。诚然，对于毛泽东的同事来说，他的权威是太显赫了。陈毅说过：没有人能够（敢于）反抗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的威望太高了。<sup>64</sup>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还表现在他能够决定性地干预和扭转政策方向。1955年，毛泽东能够加速农业合作化的例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时正值毛泽东领导革命成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还很新鲜。然而，在大跃进后的时期中，毛泽东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便有些令人惊讶了，因为据许多分析家分析，毛泽东的权力此时已经受到严重削弱。举两个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第一个例子，是讲毛泽东1962年停止了经济政策和农村政策的退却。由于毛泽东的认可，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旨在摒弃大跃进战略的各种措施。会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北京，让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应付局面。由于看到了新的、更加令人沮丧的资料和情况，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在其第一次自我批评中描写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刘少奇回忆他当时是如何到“主席所在地请求指示”。鉴于很多同志提出了“反对总路线的意见”，刘少奇说他“已经感到非常紧张”，所以，他“紧急请求主席返回北京”。<sup>65</sup>刘少奇继续说道，当毛泽东返回首都后，他介绍了扭转局势和巩固集体经

济的各项政策。刘少奇的回忆，除了表明毛泽东有能力实际上独自改变政策的方向，还十分突出地表明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连刘少奇都得向毛泽东寻求指示，并紧急要求毛泽东返京给予指示。

第二个是关于中苏冲突的例子。60年代初，中苏冲突和争端成为毛泽东注意的焦点。虽然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也许与毛泽东一样相信，苏联已经是不可靠的同盟者，并且在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征兆。但是，至少刘少奇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明显地怀疑，与俄国人搞僵关系是否明智。<sup>66</sup>然而，“文化大革命”前些年中，这种冲突日益加剧。1965年，日本共产党开始努力使这种冲突沉默下去，以便使中苏取得对付正在升级的越南战争方面的合作。1966年初，一个日共代表团访问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旨在达到上述目标。经过一番紧张磋商之后，中共领导人（不仅包括邓小平和彭真——所谓的“走资派”——而且包括周恩来和康生）同意发表一个公报，对日本人作出某些让步。当其中一位领导人把这个公报送给住在广州附近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公报后气愤地说，“你们这些北京的软骨头”。结果，公报没有发表。<sup>67</sup>

这些例子，正如将要说明的那样，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毫无节制地操纵大权，也不意味着他在出现分歧时，始终坚持按照他自己的意见行事。然而，它们的确意味着，出现他认为至关紧要的原则问题分歧时，毛泽东宁愿而且能够强制地实行自己的观点，而不管他的同志是怎样的不同意。



## 第二节 毛泽东的领导作风\*

初看起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很难与“文化大革命”中透露的材料相吻合，比如刘少奇宣称，毛泽东也是一个人，也会犯错误；<sup>67</sup>周扬反对过分宣扬“毛泽东思想”，反对将它庸俗化和过于简单化；<sup>68</sup>陈毅曾认为，领导人很少有谁没有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反对过毛泽东，这样做没什么不正常和不合适的地方。<sup>69</sup>尽管无可否认，许多人不赞同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认为毛泽东应该象任何其他人一样，受到党章的约束。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本人的言论表明他十分赞同上述观点：

去年（1961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sup>70</sup>

---

\* 下面的叙述，并没有完全使人们注意到，从大约1958年至1959年间，尤其是从彭德怀因其在庐山会议上发表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而遭罢黜时起，毛泽东的民主领导作风受到的侵蚀。我在《中国的政治与清洗：1950—1965年间的整顿与党的规范的偏狭》（M·E·夏普出版公司，1979年版）一书中，以很大篇幅分析了这一过程。后来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官方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这个期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北京周报》1981年第27期）。但必须强调指出，1958—1965年间毛泽东的专断倾向，由于他时而努力再次肯定传统的民主实践，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减轻。

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sup>71</sup>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sup>72</sup>

这些话以及其他言论表明，毛泽东已经具有强调民主准则的领导作风。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这并不妨碍他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实行自己的主张。但它的确表明，毛泽东征求坦率意见，鼓励党内辩论，也愿意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别人的观点和主张。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的同事们也恰恰期望他这么做。但必须指出，这种作风对于维护毛泽东的威望极其重要。毛泽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人们的忠诚，因为他的同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期望自己不因坦陈心迹而被打入政治冷宫。正如陈毅所言，毛泽东宽容、大度，不打击报复那些过去曾经错误地整过自己的人，这些使主席得到人们莫大的尊敬。<sup>73</sup>

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初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个性化和通俗化的热烈辩论，便需要加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有力地指出，是林彪而非毛泽东本人，是主张“毛泽东主义”的人们的主要支持者和倡导者。正是林彪，提出了诸如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等概

念，把毛泽东描写成“天才”，并广泛发行载有毛泽东语录的小红书。<sup>74</sup>毛泽东最后明确反对林彪的大部分发明固然重要，<sup>75</sup>而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党的领导人可以依据毛泽东长期的领导作风和他当前的言论，来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sup>76</sup>当然，这牵涉到重新肯定他们作为党的领导人的自身地位，而这正是毛泽东始终认可的事情。

但是，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状况不满的增长，他对自己的长期合作的同志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sup>77</sup>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毛泽东的理论主张曾经多么鲜明，<sup>78</sup>他现在显然开始把对他的思想和个人的口头拥护的热情程度，作为检验是否在政治上忠诚于自己的试金石。有些人在1965—1966年通过了这个标准的检验，但事实最终证明这种检验是错误的、靠不住的。毫无疑问，当时许多没有通过这种检验的人，事实证明也是弄错了。

### 第三节 毛泽东与刘少奇

从40年代到1965年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观察。当然，两人有许多差异，不仅表现在特殊政策上，而且反映在整个思维上。把两人各自的观点方法描述成毛（和刘）的不同思维方式，这是不可靠的作法。然而，说毛更沉迷于阶级斗争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更加持一种神秘化的群众观点，而刘少奇更加关注于组织细节，则是合理的作法。总的来讲，与刘相比，毛有更多的哲学爱好——更加注重反映事物的终极性质。但是，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至少在60年代初期毛越来越沉迷于阶级斗争之前，这些便是两人差异的主要方面，一般地说，这是小范围内的差异。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那样，直到1959年初，毛还把纪律和组织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考虑，十分注意群众创造性的限度，并且对阶级斗争抱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两人间这种细微的差别包含着将来不可避免冲突的种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是变化了的情况和由此引起的毛的思想的演变，才造成了毛反对刘的条件。

没有什么能比40年代初期毛刘之间建立的亲密工作关系，以及50年代（尤其是1959年任命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把刘作为毛的接班人的安排，更能清楚地表明毛刘之间的和谐关系。毛确实说过刘是他的继承人，<sup>79</sup>但很难拿出确切的证据说明这个选择只是他个人的意思。<sup>\*</sup>然而，假使在中共领导人中存在其他野心勃勃的人，那么毛不可能不会任命另外一个人，或者（这也许更容易些）不作任何有关接班人的预先安排。毛尊重刘的鲜明证据便是，在重要文件《工作方法60条》中，他照录下刘关于组织规则的观点（在组织方面刘被公认为权威）。《工作方法60条》是毛泽东于大跃进开始发动时起草的一个文件。<sup>80</sup>况且，在管理中国这一重大工作中毛和刘起了互相补足的作用。1961年，刘在谈植树造林活动时提出：

毛主席本人只关注国家大事。他提出把全国变成大园林的建议也就足够了。他没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sup>81</sup>

---

<sup>\*</sup> 我认为，一方面刘是毛的个人选择，同时最高领导层也一致地接受了这种选择。毛以后的领导也许不可避免地是更加集体性的领导，但这并不会（参看下文）消除可能出现的人事变动。我相信，如果毛在1965—1966年之前逝世的话，这种人事的变动并不必然导致在接班问题上的尖锐斗争。参看本书第二和第三编的进一步讨论。

虽然毛有时腾出一只手放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同时刘在政策制定上也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但是，毛规定目标而刘去把这些目标转化为行动这样的模式，却与许多实际情况相吻合。这种安排赋予刘以大量的权力，但也包含着潜在的危险：如果毛提出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么，刘首先就要承担责任。<sup>82</sup>

关于毛不喜欢刘的开始时间，有若干种说法。根据毛本人的说法，那是在1965年1月。当时，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上发生了许多分歧，由此毛认识到他对刘和其他人的信任是错误的。<sup>83</sup>然而，其他说法认为，1962年经济和农村政策方面的退却期间，毛对刘的活动很不安，<sup>84</sup>并且在1962—1965年内，他的许多话经常闪现出对整个官僚机构工作情况的不满来。因而，从毛对刘的态度只是在1965年初才强化这一意义上说，没有理由对毛的说法发生疑问，因为他的观点自1962年以后就一直在发生变化。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要强调刘不是官僚机构的化身。还有其他在台上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以及大量的官僚和地方的利益，它们与刘作为政治家的利益很少有共同之处。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两种极其重要而又密切关联的趋向，毛从政府操作方面的不断撤出，以及相对自治性的官僚角色的增长。毛总是把大量的操作问题交给他的合作者去办。自从大跃进运动之后，他经常不在北京，而让刘和其他领导人负责召集重要的党的会议和执行政策。所以，毛日益脱离信息来源，日益不能影响重要的决策。正是这样，使他开始对忽视他的人产生不满情绪。邓小平认为他自己最严重的错误便是“不能及时地向毛主席汇报”，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林彪却经常及时向毛汇报，以求得毛的指示。<sup>85</sup>这几乎不是巧合。

60年代初期所牵涉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缺乏联系交流的问题。毛泽东摆脱日常事务，就是为了让党的主要领导人发展他们自身的权力，并为毛去世后的接班作准备。<sup>86</sup>毛似乎安排刘居于尤其显赫的位置上。但是，一旦毛泽东逝世，在最高领导位置方面并没有不可更改的安排。党的领导人中并没有基于一种共同的官僚理论观点而形成的稳固的“反毛”集团。但是，在党的领导人中存在着争取最高地位的潜在竞争对手。况且，只要毛活着，那么，主席的支持便仍然是一种重大的政治资本。这在林彪与罗瑞卿的冲突中表现得很明显。“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试图把这一冲突描绘成两条互相对立的军事路线的斗争。当然，这两人之间确实明显地存在着重要的分歧，但有证据表明，自信心同其他任何因素一样，是造成两人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由于身体欠佳，林彪很少抛头露面，而罗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却实际上执掌大量军权。然而，林是罗的上级，并且不时地发出罗不赞成的指示。罗对他的权力受限制不满，并寻求晋升的机会。据说，在1964年，罗试图迫使林放弃国防部长职务。然而，林得到毛的信任，于1965年1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据传，罗当时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他）”。<sup>87</sup>虽然罗的这个决心持续时间并不长，而且他与林的冲突再度爆发，但整个事件表明了毛的合作者，互相共事时对权力的考虑占有重要的份量。

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和彭真都是“走资派”的说法中，可以作出类似的推论。刘在自我批评中讨论了他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错误。他提到，1963年9月对这一运动的指示——“后10条”——是根据彭真对毛的一个报

告（一种明显的争取毛的支持的努力）而作出的。一年后，刘认为这个文件作用不好，于是起草了“修正的后10条”。<sup>88</sup>虽然这两个文件都在后来被宣布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文件，但二者在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处理问题的措施上，互相却有着微妙的差别。这无可怀疑地反映了两者的差异，也反映了从1963年9月至1964年9月间可以利用的信息，因而可以说，这也涉及了二人的冲突的意志。至少，这个事实表明了所谓的“反毛”营垒内存在着重要分歧。

大跃进后一段时期的不同趋向不仅反映了雄心勃勃的人们的竞争，而且反映了复杂的官僚机构的长足增长。这些机构的不同部门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如同毛在1962年抱怨不已的那样：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

……<sup>89</sup>

“独立王国”现象——牺牲整体利益，追求各自部门的利益——并不新鲜。按照毛的说法，1949年“我们进城”不久就出现了这种趋势。<sup>90</sup>但是，他在60年代初期才开始更加

频繁地谈到这个话题。除了政府复杂度不断增大这一实际倾向而外，这一问题的严重化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因素是，在毛离开北京期间，没有哪位党的领导人行使同样的最终决定权，因而各位领导人都想在自己控制的部门中推行自己的领导权。<sup>91</sup>另一个因素是，尽管在大跃进运动之后采取了某些重新集中权力的措施，但是，很大程度上的行政权力下放仍然继续存在着，而且各地领导人抓住机会试行他们自己制定的政策。<sup>92</sup>最后一个因素是，领导集团不能形成一种新的意见统一局面，以及不能清晰地规定国家新的发展方向，也为各部门领导人提供了追求他们个人的目标的广泛余地。于是导致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整个政府机关不仅怠于响应毛的号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刘的控制。



### 第三章 冲突模式

在描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政策冲突的发展之前，通过对两个例子的研究来考察一下“两条路线斗争”概念，将是大有裨益的。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问题(1952—1955)

1952—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的争论，被某些分析家当作“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早期证明：毛泽东通过群众动员来谋求迅速的发展，谨慎的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和工作机构则强调有秩序的发展，以毛泽东获得省级领导人的支持从而击败他的反对者而告终。尽管毛泽东1955年7月讲话确实“解决了过去三年的争论”，<sup>93</sup>但那个争论的性质并不象“两条路线”模式所说的那么清晰。

争论的问题是，工业化的速度、技术改造（机械化）与机构改革（完全集体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粮食的供应与控制的问题等。而主要问题则是所能要求的合作化速度问题。从1952年到1955年初，合作化的速度曾经多次加快和放慢。显然，发展速度的这种变化，是与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相联系的。但是，它与毛泽东于1952年制定的渐进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指导方针也是一致的——必须避免左的和右的偏向。<sup>94</sup>在1955年初，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当时又到了巩固的时候，因而暂时停止发展新的合作社。不仅如此，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解散大批新建立的合作

社的提案。<sup>65</sup> 中央的这种谨慎，在省级领导机关的言行中得到了反映。<sup>66</sup> 不久，毛泽东就出来干预了。

毛泽东不仅仅要求更快地发展合作社，他还提出了为达到这一目标应该采用的具体措施。肯尼思·沃克中肯地说过：“毛泽东决没有采取一种极端的姿态，而是提出了一个经过认真论证的谨慎政策，来进行农业的组织改造……”<sup>67</sup> 毛泽东虽然宣称“被胜利所吓住”的右倾错误是主要的危险，可同时还告诫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左的倾向。他的方法的实质，就是认为要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首先将农民组织进互助组，然后进入个人占有土地而由集体管理的初级社，接着进入高级社即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就发展速度而言，毛泽东的计划并不激进。1954年秋，党通过了一个将初级社由10万个增加到60万个的政策计划。这一计划在1955年初便被超额完成了。1955年7月，毛泽东提出将当时已经建立的65万合作社的数目，经过更长的一段时间即到1956年10月，再翻上一番。<sup>68</sup> 所以，虽然毛泽东要求来一个大发展，但他的许多同事却提倡更慢一点发展，以致于毛泽东只能在过去发展速度的范围之内规定新的任务。

最后，在执行毛泽东的号召的过程中，党的机关既超出了他的目标，又向左改变了他的政策。从毛泽东讲话之时到1955年底，中国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中央制定目标，省里超过这些目标；中央向上修改它的指标，省里再次超额完成中央的指标。到了这一年末，毛泽东原来提出的目标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规定到1958年春实现50%的农户进入合作社，发展为于1956年底将70—80%的农户纳入合作社。这些目标的完成，意味着抛弃了毛泽东循序渐进的政策。有1/4以上的农户没有经过互助组阶段就直接进入合作社，并且出

现了迅速跨过初级社的广泛趋势。尽管这一结果有悖于毛泽东的指示，但他显然对此不无喜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集体化的加速是动员群众政策的胜利。对于这一胜利，党的机构与毛泽东一样有功劳。<sup>99</sup>

农业合作化这个例子说明了如下几点。首先，激进的动员群众与保守的党的官僚机构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概念，并不比50年代初，毛泽东和党努力避免右倾保守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政策成为在两个极端之间确定适当位置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发展速度——程度问题——而不是根本道路、方法问题。其次，虽然毛泽东在1955年年中的确站到了他的一些高级同事的左边，但党的机构不动声色地迅速作出反应，执行的方针甚至更左一点。再次，虽然人们也许倾向于认为，作出这种反应的主要是省级领导人，而非更保守的中央官员。但在事实上，省级领导人当时执行的是巩固政策。显然，各级领导人出于信念或者策略考虑，都会转变立场的。<sup>100</sup> 不管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何种分歧，它们并没有反映出互相对立的观点。

## 第二节 农业机械化战略（1958—1966）\*

“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出版物刊载的一系列文章都叙述了关于农业机械化政策上的“两条路线斗争”。<sup>101</sup> 虽然，这种斗争据说追溯到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但其最重要的

\*以下文字写出几年后，关于农业机械化政策的重要专著发表了：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所著《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依萨克：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虽然在各点上采用了一种变化了的“两条路线斗争”方法（见此书第183、210页），但斯塔维斯的认真考证，支持了本书的观点。中心的一点就是，对于1966年前的农业机械化，斯塔维斯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之间在此问题上的具体政策冲突。

阶段是从大跃进发动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大搞农业机械化的号召，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泽东倡导的战略，侧重于发展农业合作社（后来为农村公社）可以买得起和管理使用的小型简单机械。据说其他党的领导人则不同意这一计划。他们不传达毛泽东的成都会议上的指示达7年之久。中国的一位计划工作主要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所强调的机械化，作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指导方针是不完整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对毛泽东的方针的漫不经心的贯彻——用“形‘左’而实右”的手段，目的在于败坏毛泽东的思想的声誉。党内主管农业的领导人不顾地方情况普及简单机械，造成了大量经济损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一些领导人为了削减国家的投资，急切地将对拖拉机的管理权移交给公社，而公社却没作好任何接收拖拉机管理工作的准备。接着，他们就不管此事，极少提供资金，撤消主管这项工作的各种高级部门，而且既不开会也不下达指示。结果，公社管理使用的机械遭到了严重损坏。

接着，据说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领导人利用1961—1962年的混乱局面，来改变毛泽东的政策，恢复中央对农业机械的控制。□□□起草了一个文件，将拖拉机收归国家管理。其他地方开展的项目，比如工具研究机构的工作，作为总的紧缩的一部分而停止。1964年，□□□起草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计划没有论述机械化，并减少对农业机械工业的投资。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和反对这个草案计划。同时，刘少奇和其他人提出的政策，重视发展大型复杂的机械（包括从外国进口的机械），重视依靠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而不是农民搞发明，以及重视国家级和省级现代研究组织机构。然而，刘少奇

的主要计划，是搞农业机械托拉斯和“一百大县”计划。通过托拉斯，刘少奇一方面试图不让地方党委插手管理，从而加强中央控制；另一方面，试图用强调以利润率作为成功指标和标志的经济方法，取代行政管理方法。“一百大县”计划，试图在10年间由国家集中地向100到200个选定县投资搞机械化，然后再将新的资金投到其他地区。这一计划，是旨在加强中央控制、消除地方单位的自主性的另一个步骤。

据说，在此时期，毛泽东始终对农业机械化深感兴趣，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技术革新的重大政策”。但是，除了毛泽东对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反对以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并没有指出毛泽东采取了什么具体的措施。总之，他主要关心的，似乎是使机械化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足够的资金、材料。1966年2月，毛泽东却采取了一个具体的方针，他反对“一百大县”计划，命令发表湖北省政府扶植的一个模范大队的成绩。湖北的计划强调通过调动地方的资金和资源手段，大规模地搞机械化。毛泽东通过这一行动清楚地表明，他赞成地方自力更生，反对中央控制政策。

以上论述可以使人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会有十分不同的立场。因此，一位在1958—1960年间犯了左倾错误的人，到了1961年以后，又会被指控犯了右倾的错误。此外，毛泽东的“反对者”采取的不同立场，互相之间很不相同，同时又在所包含的内容要素上与毛泽东所表达的思想一致。例如，薄一波1959年说毛泽东的建议是“不完整的”，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只有通过电气化、化肥化和机械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薄一波主张国家对农业有更大的投资，反对由工业独用国家投资的意

见，这一立场与毛泽东强调农业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当薄一波后来要求削减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时，显然与刘少奇有分歧（刘少奇认为机械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紧迫的任务”）。但这种态度与毛泽东的看法互相吻合。党的负责人之间的分歧，也表现在湖北提倡分权的计划上。湖北计划与省级领导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农业机械化例子中引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关于论证的方法——关于对大跃进以后一个时期学术分析中广泛运用的一种方法。在缺乏有关毛泽东的具体政策立场方面材料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发表的观点，实际上被当作大跃进以后整个时期的思想。因此，“两条路线斗争”，就成为1961—1965年间各位党的领导人确定的具体政策，与毛泽东1958年的思想、方针之间的斗争。既然其他领导人在1958年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难道毛泽东反而就没有这种灵活性了吗？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的设想的某些方面在1966年重新提出，表明毛泽东非常容易接受这些概念。但这并不表明，他正在倡导的政策是以大跃进时期的想法作基础的。如果他是以此作为基础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只有薄一波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例外）中没有有关1966年2月以前在具体政策建议上发生冲突的资料。总之，60年代初农业机械化问题上的“毛泽东的路线”，与其说是当时的真实思想，不如说是过去思想的幽灵。

以上的研究，不仅指出了“两条路线斗争”概念的缺陷，而且反映出1949—1965年间政策冲突的变化着的模式。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一变化着的模式，作一个更加详尽的考察。

### 第三节 对苏联模式的一致赞赏（1949—1957）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关于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只有一个榜样——苏联。虽然中国人在一些重要方面对苏联模式加以变通，但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在制度变革和经济战略方面的先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sup>102</sup>当然，这样做并没有消除政策分歧，但它把争论限制在如何更好地执行大家一致同意的计划问题上。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应当用多快的速度完成一项计划，苏联经验对于中国有什么具体的教益。但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就不会使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受到影响吗？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只要权力关系得到很好地限定，那么夸大政策上的分歧便不会得到什么结果。

农业合作化问题，是重大对立观点得到展开的最早的主要问题之一。<sup>103</sup>如同前述，在这个问题上三年的争论，集中于如何在左的和右的偏向之间划出一条合适路线的问题之上。当1955年采取的较左的方针导致迅速发展时，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在生产战线推动更大的突破。<sup>104</sup>然而到了1956年年中，当时的要求是收缩。这一决定无疑引起了关于如何处理生产冒进期间出现的不平衡的严重争论。这个决定显然使毛泽东感到不快。1958年，毛泽东说：

1956年吹掉了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关于农业发展）。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

中间大。1956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sup>105</sup>

毛泽东显然对1956年事情的变化颇感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收缩措施违背了他的意志。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那样，1956年毛泽东不象后来那么有信心领导他手下的计划工作领导人。据他自己承认，在他不太懂的领域中，他就听从计划工作负责人的意见。<sup>106</sup>不管怎么说，毛泽东1956年的主要宣言即他的四月讲话《论十大关系》，强调的是平衡和中庸，因而与更为谨慎的经济方针的精神是吻合的。

这一时期重大分歧的最后一个来源，是百花齐放运动。这一试验遭到了来自俄国人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反对。<sup>107</sup>毛泽东企图让知识分子参与党的整风，既是对重要机关利益的挑战，也是对苏联经验的背离。百花齐放运动的试验，可以视为针对苏联模式的不足，而走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的最初努力之一。虽然百花齐放政策被适时地遏止住，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领导层的不和，但是，它所产生的出乎预料的后果，表明了忽视苏联经验的危险性。

#### 第四节 中国发展模式问题（1958—1960）

发动一场大跃进运动，是为了开创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一条不援任何先例的道路。<sup>\*</sup>在这种情况下，尖锐的分

<sup>\*</sup> 当1957年底一系列要求改变发展战略的压力积聚起来时，大跃进就应运而生。最重要的是已日益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于中国的条件；百花齐放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尖锐猛烈的批评，表明他们不太可靠；尤其是经济操作指导方面显得懒懒散散，缺乏生气，在中国的农业指导方面，这种无精打采的指导就更加突出。



歧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毛泽东是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sup>108</sup>分歧首先出现在大跃进战略的形成阶段，所进行的争论不仅涉及这一战略的细节，还涉及人们基本上反对如此激进的方针。最高层即政治局常委层的反对于1957年底出现，来自党的最著名经济专家陈云。陈云主张以实行物质刺激政策来取得更多的平衡，同时使经济发展速度低一些。不久，陈云便失去了他的主要实际职务。<sup>109</sup>在省级领导层，许多领导人显然认为1956年的谨慎的措施，要比已提出来的新政策，更加适合于当时出现的形势，于是开始了一场重要的省级领导整顿。<sup>110</sup>

但是，尽管从一开始就遇到强烈的反对，毛泽东在党的机构中还是有着强大的支持者。刘少奇是大跃进政策的特别积极的提倡者，并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对大跃进战略作了公开的批准。<sup>111</sup>在省级领导层，尽管有怀疑者，许多领导人还是热情地支持甚至帮助形成这一新的战略，也许是考虑到这一战略的分权措施会提高自己的权力。<sup>112</sup>的确，整个党的机器都运转起来，积极地推行大跃进政策，结果使“极左”行为充分展开。

随着1958年大部分时间的流逝，以及新政策的缺点日渐明显，进一步分歧的阶段到来了。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整套政策调整措施，以对付正在冒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主持了这些会议，并在制定改善形势的措施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起初，人们没有意

识到在所作的让步退却中包含着失败；相反，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似乎把这些看作巩固伟大胜利所必经的过程。然而，到了1959年春，由于看到了问题很多、很严重，领导层便不那么乐观了，分歧也加大了。有些人认为，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另一些则批评毛泽东作出太多的让步退却——这样一来，便为毛泽东错误地把自己描绘为“走中间道路者”提供了某种凭据。<sup>118</sup>那些认为退得还不够的人，是最明显的持不同意见者。他们不那么明确地对整个大跃进纲领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种情况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中的政治局内暴露出来，彭德怀公开发表了反对的观点。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对彭德怀进行反击，罢免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然而意味深长地是，庐山会议批准的许多措施，与彭德怀批评意见的许多内容相吻合。<sup>119</sup>此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余领导人批准另外的退却措施，以竭力补救大跃进的方针政策造成的过失。

### 第五节 探索新道路（1961—1965）

尽管官方文件还坚持说大跃进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到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大跃进政策实际上已被抛弃。1961年和1962年间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策方向。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明确认可了许多这种意义深远的措施，批准了刘少奇的报告（这一报告承认犯了重大错误），并且他本人也承认“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犯了不少错误。”<sup>120</sup>毛泽东无疑不高兴采取这些办法，但他显然鉴于恶化着的经济形势，认为别无选择。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哪些是可能的或者必要的还没有把握；

(1960年，埃德加·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sup>116</sup>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到了1962年夏季，毛泽东开始要求终止从1月份开始实施的进一步退却。然而，当时所批准的政策，保留了许多过去实行的退却措施，尤其是对工人、农民的物质奖励形式。<sup>117</sup>所以，虽然毛泽东阻止了政策的继续变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提出了改变1962年中共整套温和纲领政策的建议和计划。毛泽东尽管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但他没能指出将这一口号应用到许多党的政策上的具体办法。

在随后的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的问题使毛泽东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当毛泽东谈到这些问题时，其话语总是或者说得很概括和不易实行，<sup>118</sup>或者说得含糊和带有试探性。尽管经常提出这个问题，而毛泽东并没有拟出解决它的详尽方案，只不过要求研究这一问题和采取某种措施。到了1965年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才表明了他的解决方式。他表示自己极其重视在最高领导层进行政治清洗，并向他的同事发问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sup>119</sup>在这几年里，毛泽东所做

的，顶多就是认定问题性质，以及促使其他党的领导人做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工作。他指出了方向，但对怎样达到他规定的目标，却几乎没有给予具体的指点。

毛泽东的含糊其词，给其他党的领导人带来了问题，同时也创造了机会。这些人有极大的余地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毛泽东的模棱两可态度总是个问题，因为他仍然在政治天平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想要取悦于毛泽东的领导人，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去博得他的欢心。所以罗瑞卿才抱怨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容易理解”。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触。<sup>120</sup>

事实上，毛泽东说出的许多他所关心的事，确实得到了他的合作者和党的机关的热烈响应。例如，对农村卫生的强调。<sup>121</sup>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做得更努力，工人、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sup>122</sup>在毛泽东批评得更尖刻的文学领域，1964—1965年间开展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化运动。<sup>123</sup>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使他寝食不安的是革命面临夭折、堕落的危险。对此，人们却漫不经心，反应并不强烈。确实，他在官僚机构面前，似乎感到虚弱无力。在他眼里，党的机关忽视他，或者不执行他的指示。在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话时，他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学习年限太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也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作敌人看待，进行突然袭击。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认为它是好的。现在还要改革，还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人就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

显然有不同意见存在。无疑，有人认为毛泽东关心的事情是重要的，但他的建议明确起来时，又不切实际。另外一些人也许认为毛泽东生活在过去，虽然在政治上看有必要记住他的善意，但是走向未来的道路与毛泽东设想的大为不同。与毛泽东的对抗，不仅采取公开分歧的形式，而且更多地是采用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即口喊毛泽东的口号，但追求相反的目标。然而，在毛泽东常常不能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建议的情况下，甚至最坚定的“毛主义者”也难以使这位主席满意。

尽管存在许多分歧的观点，但无法表明存在着两条泾渭分明的对立路线之间的斗争。对于党的机关及其负责人的工作情况，最好看作好坏无常。在毛泽东表示关心的许多问题上，人们采取了重要措施；在另一些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上，人们似乎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落实。能够截然分列为两队的政治人物是不存在的，相反，存在的只是各种观点。毛泽东所关心的只有一种倾向（尽管它极其重要）。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走资派”才意识到，他们曾经“宣扬”过一条“反对毛泽东”的路线。

## 结 论

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政治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对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令人激动的解释，但它并没有为分析政治斗争的实际发展过程，提供真正锋利的工具。这一观点，不仅把复杂的部门利益和政策立场过分地简单化了，而且严重地低估了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其他政治

领导人的团结。毛泽东的同事有自己的个人发展欲望和思想，这使他们成为潜在的竞争者，并使他们具有不同的立场。至于毛泽东，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获得了辉煌成功的革命战略的创造者，毛泽东的地位远远地高于他的同事们，尽管他明智地培养民主的领导作风。毛泽东的地位是那么崇高，只要他在世，不管他如何超脱日常工作，也不管他的立场是多么模棱两可，他仍然是其他所有人都必须顺应的人物。只有这样一位人物，才可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

## 注 释

1. 《对一封信的评论》（1959年7月26日），转引自《中国法律和政府》1968年12月号，第51页。
2.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转引自《问题与研究》1973年1月号，第96页。
3.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6年），转引自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纽约：弗利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社，1969年）第351页。
4.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此文载于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77—225页有关毛泽东反对“三次‘左’倾路线”的叙述。
5.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载陈志让编《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1页。
6. 《毛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118—119页（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7. 例子参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转引自由罗伯特·R·鲍伊和费正清作序的《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96页。
8. 这一点，在如下告诫中明确地表达出来，上级工作组在指导群众运动

中只起支持作用，并不能代替基层干部去领导，因为后者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参见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21—322页。

9.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8页。
10. 例子参见毛泽东会见安德烈·马尔罗时的谈话，转引自陈志让编《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英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林提斯—豪尔出版公司，1969年）第121—123页。毛泽东在会见时说：“我们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11. 参见《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原始出处1943年6月4日《解放日报》（转引自施拉姆《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党》第179页）。
12. 施拉姆《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党》第178—179页。
13.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党的领导干部没有跟上群众，而只是继续规定本书下文引证的小心谨慎的措施。
14. 左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43页）中，毛泽东指出，通过组织渠道发出的指示不能激起多少反响，而乱哄哄的红卫兵运动都迫使人们重视起他希望解决的许多问题。但在1967年2月，毛泽东却指责取消“领导”的提议为“极端无政府主义”和“最反动”。参见《毛主席第3次接见张春桥和姚文元时的谈话》，载《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49826期，第44页。
15. 《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1965年12月21日），载《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105页。
16. 参见毛泽东《工作方法60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第22条，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64—65页。
17. 《北京周报》，1964年7月17日，第21页。
18. 例子参见：《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年）第181—189页。

- 19.《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72页。
- 20.毛泽东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警告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转引自《时代背景》第897期，第38页。
- 21.参见毛泽东所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转引自《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118页；他对同书的按语，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22—323页；以及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这篇讲话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第7页。
- 22.《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52029期，第22页。
- 2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2—3、25页。
- 24.毛泽东在《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1957年11月17日）中表述了这一观点，转引自《时代背景》第891期，第26页；在《工作方法60条》的引言中也有同样观点。只是在1962年，他才坦率地说，1957年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工作作得很不够。参见《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 25.1955年7月毛泽东号召加快发展合作化时说，“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26.《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27.参见《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载《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70页。
- 28.参见《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载《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119—120页。
- 2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转引自《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286页。
- 30.毛泽东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一个主要前提是，不这样做



的话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就会发展开来。参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31. 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论述了统筹兼顾国家、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三者利益问题。
32. 例子参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转引自《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56页。
33. 参见毛泽东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对有关大跃进的批评作出反应：“……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转引自《彭德怀案件：1959—1968》（香港：联合研究院，1968年）第25页。
34.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转引自《中国法律和政府》，1968年12月号，第10、12页。
35.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转引自《彭德怀案件》第30页。
36. 《工作方法60条》第21条，英译文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理论》，《时代背景》第46期（1971年）第227页。
37.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转引自《中国法律和政府》1968年12月号，第74页。1962年，毛泽东指出，许多高级干部对他关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感到惊讶。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默认，他在大跃进时期思想上并没有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参见《1962年8月6日的讲话》（即毛泽东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52029期，第19页。
38. 《论十大关系》，第83—84页。从1958年6月1日《红旗》上引用的话，比他1956年的原话更生动地表述了毛泽东的意思，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2页。
39.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参阅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第91页中的讨论。
40. 《红旗》1958年第10期，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352—353页。

- 41.《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英译文见《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第226页。参阅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31页的论述。
- 42.《工作方法60条》第22条，英译文见同上书第228页。
- 4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49826期，第47页；《在八大二次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载《时代背景》第888期，第9页。
- 44.参见《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 45.关于经济战略上的这一转变，参阅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76—90、101—104页。
- 46.参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对他本人的描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会见库维·德·默维尔时，的确使用“中左主义”来形容自己；参见罗斯·特里尔《八亿，现实的中国》（波上顿：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2年）第68页。
- 47.《致生产队长的信》（1959年11月29日），转引自《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9页。
- 48.《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中国法律和政府》1968年12月号，第86—87页。
- 49.参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9月），转引自《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102页。
- 50.《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这里使用的“阶级斗争”概念，尚有某种混淆。他最初指出其异于工作的不同性质时，使用的是一种广义概念——“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当讲到不要妨碍工作时，他又指的是公安部门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非常狭窄的用法。
- 5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52029期，第13—14页。
- 52.参见安德烈·马尔罗引用的毛泽东1965年的谈话。《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121、123页。

53. 例子参见《与几内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1965年8月8日），转引自《时代背景》第888期，第15页。
54. 《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1964年6月27日），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97页。
55. 例子参见《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21—23页。
56. 例子参见《关于学校的课程和考试》（1964年3月10日），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97页。
57. 毛泽东在《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摘要》中，举例说教师利用其地位不给学生印讲义，以维护传统的讲授方式，掩盖自己有限的水平。因为，如果进行讨论式授课，势必暴露他们的学识浅薄。
58. 参见《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
59. 参见《新时代的狂人》，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02期，第8页。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经修改发表的刘少奇《怎样做一个好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企图贬低毛泽东），实际上增补了毛主席的话。
60. 参见《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转引自《问题与研究》1970年7月号，第88页；另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107页。
61. 参见《井冈山》和《广东文艺战报》，1967年9月5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46期，第4页。
62. 例如，关于1959年由刘少奇取代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一事，毛泽东是于1957年底提出他要退出此职的，当时大跃进正处于酝酿之际。参见《工作方法60条》第60条。
63. 《象我这样的外交部长》，载《事实与特写》，1968年3月20日（转引自洛厄尔·迪特默《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的下台》，《时代背景》1973年1月号，第8页）。

- 64.《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3日),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52期,第23页。
- 65.参见《吴冷西的交代》,英译文载《中国法律和政府》1969年12月号,第78—79页。
- 66.参见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战略的争论,1965—1966》,载《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第68—71页。
- 67.新华社北京1967年9月23日电,转引自《时代背景》第843期,第5页。
- 68.《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46期,第4—6页。
- 69.《陈毅言论集》,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36期,第29页。
- 70.《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50792期,第44—45页。
- 71.《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会上的插话指示》(1958年6月23日),载《中国法律和政府》1968年12月号,第15页。
- 7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1962年1月30日),转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即席讲话和书信:1956—1971》(哈蒙斯沃斯: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74年)第164—165页。
- 73.《文革风云》1967年第4期,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35期,第10页。
- 74.参见《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转引自《问题与研究》1969年8月号,第88—89页。
- 75.林彪叛逃摔死前夕,毛泽东在同各地领导人谈话时抨击了“顶峰”论和“天才”论。参见《毛泽东视察途中与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转引自《问题与研究》1972年9月号,第67—68页。
- 76.有关上述引语的补充材料,参见《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52029期,第9页。
- 77.随着“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不断展开,毛泽东对一些人的评论常常流露出带有轻蔑性的愤怒和对这些人的动机和个性的怀疑。

- 例子参见《在中央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转引自《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93—94页。
78. 毛泽东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表明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很不安。
79. 参见他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的谈话。1961年10月17日《南华早报》对这次会见作了报道。
80. 《工作方法60条》引言。虽然第23条（据说是由刘少奇撰写的）论述规章制度，并被引为刘少奇倾心于秩序的证，但仔细读一下这一条的内容，却使人产生一种不同的印象。事实上，刘少奇很强调规则的暂时性和依照由群众主动性造成的新形势修改和取消规则的必要性。的确，群众被“鼓励……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同时，毛与刘之间的观点有很大的一致性。
81. 1967年6月14日《黑龙江日报》（引自邹说《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季刊》第38期（1969年），第75页）。
82.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在她1967年4月“第一次受审讯”时说：“主席在很多事情上信任刘少奇，有问题时让他去处理。”《对扒手王光美的三次审讯》，转引自《时代背景》第348期，第11页。
83.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转引自《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96页。
84. 毛泽东1966年8月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117页。在这篇大字报中，毛泽东引证1962年的“右倾”和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指导上的分歧，说明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专政”。
85.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3日），转引自《中国法律和政府》1970年12月号，第283、289页。
86. 参见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转引自《时代背景》第651期，第6页。
87.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88.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3日），转引自《问题与研究》1970年6月号，第95—96页。

89. 《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90. 《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载《毛泽东，伟人生活观察》第95页。
91. 参见邓小平的《自我批评》，另参见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2. 例子参见1967年1月14日《陶铸是华南的赫鲁晓夫》文章中，对陶铸在广东所进行的农村试验作的批判，转引自《时代背景》第824期，第12—13、16—17页。
93. 1955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陈毅的这段话（转引自《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3页）。
94. 《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转引自《时代背景》第897期，第30页。
95.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3日），转引自《问题与研究》1970年6月号，第94页；肯尼思·R·沃克《集体化运动回顾：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第21、29页。
96.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中国的省级政治：主题及其变化》，载林德贝克《革命社会的管理》第140—142页。
97. 沃克《集体化运动回顾》第30页。
98.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99. 泰韦斯《中国的省级政治》第142—143页及沃克《集体化运动回顾》第34—43页。
100. 除了地方官员以外，很多经济战线的中央领导人也宣布放弃他们的错误观点，并热情地赞同毛泽东1955年秋提出的设想。参见沃克《中国集体化运动回顾》第33页。
101. 以下基于1967年8—9月和1968年9月《农业机械技术》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参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09、610、613、630、633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共产党中国农业机械化问题上的斗争》，《时代背景》，1968年10月1日。
102.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

- 务》第52029期，第13页。
- 10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英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第237页。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打国民党和土改时比较团结，而在合作化运动中则出现了不少分歧。
- 104.在1955年12月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毛泽东宣称生产上的“右倾保守主义”是党面临的主要危险。
- 105.《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 106.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共产党中国的20年：一个周期》，《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第60页。
- 107.在《致王稼祥的信》（1959年8月1日）转引自《〈中国法律和政府〉1968年12月号，第53页》中，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和“党内的怀疑派”反对百花齐放、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所有中国的创新。
- 10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109.参见舒尔曼《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95—208页。
- 110.参见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1957—1958年省级领导人的清洗》，《中国季刊》第27期（1966年），第16—19、28—29页。
- 111.参见刘少奇《目前形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1958年5月5日），转引自《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16—438页；同上注。
- 112.参见泰韦斯在《中国的省级政治》第130、140页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讨论。
- 113.据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李井泉攻击毛泽东1958年4月底的信。此信告诫省级领导人在工作中更现实主义些。李攻击此信标志着退却和保守主义。成都电台，1968年4月8日。
- 114.参见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共产党中国领导清洗的过程》，《中国季刊》第41期（1970年），第126—129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论照片》（《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第98—99页），提供证据说，在其他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是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
- 115.《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联合出版研究服

务》第52029期，第12、14页。毛泽东谈到过失问题，并承认错误地对待了一些干部，也适当地道了歉（同上，第3页）。这表明了如下事实：刘少奇在同一个会上的讲话，“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对毛泽东的主要罪证——即刘少奇责备大跃进的失败主要由人祸造成，并要求为1959年罢官的人进行广泛的平反——这固然是事实，但并没有反映刘少奇与毛泽东当时的立场有何实质分歧。

116.《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7.参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

118.例如，毛泽东号召把学校的课程砍掉一半，所有医生除刚毕业的一些外都派到农村里去。《关于教育问题的春节指示》（1964年<sup>2</sup>月13日），载《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93页；以及《对卫生工作的指示》，载同上书第101页。

119.《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同上书第102页。

120.《33个主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1968年3月，载《时代背景》第874期，第19、42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他的支持者都声明他的观点常常被误解。例子参见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和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载《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49826期，第17页）。

121.参见1966年2月5日《黑龙江中医药》，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96期，第17页。

122.参见唐纳德·J·芒罗《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当前的反知识分子运动展望》，《时事舞台》，1966年6月1日，第14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一位目击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叙述》（纽约：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出版公司，1969年）第114页。

123.参见芒罗《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124.《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另参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 第二编

### 领袖的合法性

---

将近40年，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领导人。正如经常说但又几乎没有加以分析过的那样，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具有超凡魅力的性质。不过，要想充分地说明毛泽东权威的特征和根源，马克斯·韦伯关于法定—理性的以及传统的权威类型的一些观点也应当加以参考。事实上，毛泽东同时运用了这三种类型的权威来巩固他的领导。可是，由于若干因素在某些阶段中加强了超凡的魅力，而在其他阶段里却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超凡的魅力，因此，毛泽东权威的类型在不同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相同的合法性的因素还一直明显地存在。邓小平作为党的新的合法领袖没有被称为是超凡魅力型的领导者，他还非常强调法定—理性的原则，但实际上，他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类型。

无论从政治理论分析角度还是从政治生活本身来看，合法性都具有模糊性。尽管如此，合法性还是至关重要的。正象韦伯早就指出过的那样，服从可以来源于许多方面：“从简单的习惯到最纯粹的

利益方面的理性考虑”。但可靠的服从制度通常需要在合法性中增加信念的因素。<sup>1</sup>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命令至少要部分地出自于相信这些命令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正合适的。用韦伯的话说，不服从“将与责任感不相容”。<sup>2</sup>关键在于发布命令者的合法性权威，而不在于命令本身；彼得·布劳指出：“权威与劝导是不同的，权威是要人们中止他们自己原来具有的判断，而去接受一位公认的领导人的判断，即使这种判断并没有被人们信服是正确的。”<sup>3</sup>因此，虽然权威在大多数政治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必须将其同压力、政治协商、建立同盟、政治妥协这些政治过程的特征区别开来。正如布劳所说，在权威关系盛行的地方，下级接受上级的命令并按照命令行事。而在政治关系中，有关党派进行磋商，并且达成反映出他们相应实力的契约，或者在行动上作为一个整体结成联盟去击败竞争对手。前一种情形，体现了对无可争议的力量对比的确认；而在后一种情形中，中心问题是谋求支持。<sup>4</sup>

运用权威与寻求政治支持，二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方面是没有关系的。每个政治家都在寻求支持以便能够获得领导地位，而且假使寻求支持的过程是遵循一种公认的合法性原则的，那么成功的竞争者就成为合法的领导者，被赋予正式的权力。（如同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要撤消对这样一位领导人的支持，并使之重新失去合法性，在共产党国家是很难办到的。）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地位的合法性不会自动转变为具有无限权力的权威；特别是在法定一理性的和传统的范围内，领导者只能在限定的幅度内发布权威性的命令。地位的合法性是权威的先决条件，但不能确保权

威的实现。地位也许能也许不能转变成巨大的权力。然而，在共产主义的体制下，即使有种种限制，仍然存在着真正权威逐渐增长的可能性。

做出若干更进一步的区分，对于本编的展开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核心问题与其说是领导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合法性。二者显然密切相关，但经过具体分析，又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互区别。正如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即使领导层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也不会对体制的合法性产生多大影响。不过，在另一种情况下，特别是在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元勋领导的情况下，制度的合法性和领导的合法性已经变得很难分辨清楚了。其次，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独具特色），中国近800人的统治者之间的差异，<sup>5</sup>广大党员和行政人员以及人民大众之间的差异等等，对于我们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不同的“选区”，<sup>6</sup>对于领导者都有某种不同的权威关系。例如（正象后文所讨论的那样），精心培植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更多地是来自于人民大众和一般官员强烈的合法性观念，而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高级同事。实际上，查默斯·约翰逊已经用韦伯的“专制政治”概念刻画了毛泽东的统治——即利用超凡魅力来吸引人民大众并战胜竞争对手。<sup>7</sup>

然而，这里讨论的重点是高层人物如何看待领导的合法性。<sup>8</sup>由于毛泽东的高级同僚们接受了领导合法性的概念（这是列宁主义体制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他们将其视为一种信念。与约翰逊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阶层承认毛泽东的合法性（虽然在毛泽东晚年生涯中，绝对权威并不是必须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

于毛是否掌握了广大群众。实际上，毛泽东在其最后20年间犯的错误，严重地损害了制度的合法性和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广大群众的利益。同时，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疑问，即在仅有毛泽东对群众的吸引力而无高层领导认可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各种重要关头是否仍能占据优势地位。但由于高级领导人自愿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因而不曾发生危及毛泽东的合法性地位的问题。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为了取得领导地位而诉诸群众的情况是不存在的。<sup>9</sup>因此，邓小平以及未来的领导者，其合法性一定是来自上层。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限定在纯理论的范围内。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要想系统地采访高级领导人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大致地推测各级领导的个人抱负、顾虑或责任感，并以此来解释其对上级的服从。同时，任何一个政界人物对于一位领导人合法性的信念的“难得而又简单的构成”，<sup>10</sup>几乎都不会比通过直观得到的信息显得更为重要。<sup>11</sup>不过，扩大对中国共产党活着的政界人物本身的了解，将为调查研究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应用这些材料结合有关中国传统的文献和苏联的实践来说明权威的类型是可能的。

## 第一章 合法性的基础

权威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并不意味着反映了全部的真实情况。韦伯不仅认识到纯粹的典型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而且他还进一步强调了各种类型的不稳定性（特别是超凡魅力型和法定—理性型），它们具有相互转变的趋势。<sup>12</sup> 尽管有这样的不稳定性，但在中国共产党内，超凡魅力型、传统型和法定—理性型这三种权威的基本类型，还是能够很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对于领导者来说，通过个人崇拜是可以人为地造就出超凡魅力型权威的。<sup>13</sup> 另外，政治领导者们常常在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的基础上，宣布这种合法性。而民族主义对合法性也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无须争辩的，<sup>14</sup> 因此，在做任何全面的分析之前，都应考虑到民族主义的因素。现将权威合法性的主要排列如下：

1. 超凡魅力型
  - a. 革命的
  - b. 个人崇拜
  - c. 根据业绩
  - d. 民族主义
2. 法定—理性型
3. 传统型

### 第一节 超凡魅力型权威

根据韦伯的理论，超凡魅力型领导人“具有特殊的品

质，使他超出一般人之上，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超人，或者至少具有非凡的特殊才能。”<sup>16</sup>超凡魅力的纯粹形式仅仅在危机时期才会出现，这位不寻常的人物能在复杂的形势下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些特殊的才能被认识之后，其他人开始带着崇敬的心情服从超凡魅力型人物的领导。然而，这种局面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当危机一旦过去，“超凡魅力的常规”出现之后，这种权威关系的体系便开始向传统型或法定—理性型的方向发展。那种最初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特点（缺乏等级制度，否定规则，批判过去，不重视经济），很快地让位给更加制度化的结构特征，而超凡魅力本身则以“遗传魅力”或“官方魅力”等形式，变得有些非个人化了。<sup>18</sup>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虽然一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个人权威，但是，纯粹的、不受约束的超凡魅力却不存在。列宁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列宁并没有宣称自己一贯正确，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也一再明确地强调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实践中，列宁却常常违反常规，以推行正确的方针。<sup>17</sup>此外，在列宁众多追随者中，有一种直感，认为列宁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因此愿意追随其行动。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M·N·波柯洛夫斯基总结了他追随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的经验：

首先，他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非凡能力，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是迷信的感情。以前，在一些实际问题上，我常常采取一种与他不同的意见，但每一次都以我的意见失败的结局而告终，当这种情况重复了大约7次以后，我便停止了与列宁争辩，而无条件地服从他，

即使有时逻辑告诉我应当采取另一种行动。从此以后，我确信，列宁具有非凡的理解事物的能力，他能洞察世间的一切。<sup>18</sup>

当然，这远没有反映出那时的全面情况，特别是没有反映出1917年以前一个时期的情况。那时，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中，有很多派别在各种主要问题上，激烈地反对他，有时甚至通过投票来压倒他。即使在列宁的意见占优势时，也常常出现由于拖延持久的争论而影响了对他的意见的执行。<sup>19</sup>尽管存在以上的情况，但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列宁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通常是经过多次争论之后，开始不断地占上风，这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人，象波柯洛夫斯基一样，逐步停止了同列宁的判断相对抗，因为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常常证明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sup>20</sup>这时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仍有一些人在反对列宁，因此还不能确定无疑地说，超凡魅力型权威已经形成。不过，超凡魅力型权威就是建立在这种不断胜利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毛泽东来讲，要想具有这样的超凡魅力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不同于列宁。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创始人，而他只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众多的职业革命家之一。毛泽东在30年代初期政治生涯中的盛衰是众所周知的，而在长征期间，只是由于他在党内的竞争对手较其他时期弱一些，才使得他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开始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sup>21</sup>这种情况所以得以出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毛泽东的同事们，开始认识到了他的“特殊才能”。

这些“特殊才能”，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定义为超凡魅力的客观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富于想象的洞察力。<sup>22</sup>至少，毛泽东的那些亲密助手承认毛的这种实际能力。毛泽东的确具有政治魅力，值得他的同事们敬佩。这种魅力之一是他的超然态度。卢西恩·派伊的文章曾经写道，长征之后“人们开始了解了毛泽东，在他那超然的态度中蕴藏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sup>23</sup>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家，毛泽东的超然态度给其他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以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毛做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具有巨大的意志力。亨利·基辛格会见过年老体弱时的毛泽东，他写到：或许除了查尔斯·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位伟人，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sup>24</sup>但是，超然的风度、意志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品质，诸如冷静和无所畏惧等等，其本身还不足以获得超凡魅力型的领导。要想获得这样的领导，还得象列宁那样，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获得成功。毛泽东获得并巩固了他的这种领导地位决不是偶然的。在30年代后期，他的游击战方针和“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增长。尽管毛泽东以外的一些因素也帮了他的大忙（例如，美国卷入对日战争，国民党的无能等等），但在12年间（1935年起），深深地打上了毛的印记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毕竟导致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胜利，这使毛泽东的形象无可争议地与超凡魅力型的革命领袖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同事们对毛的“特殊才能”的肯定程度还是不应过份夸大。众所周知，在中共的领导圈子内部，毛泽东并没有被认为是天生的辩证法能手，而且他做为行政管理者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sup>25</sup>邓小平在1978年评价



毛泽东时，仅认为他是“三七开”。<sup>26</sup>这种评价使人不难相信，与毛共事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们都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毛的“特殊才能”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毛的超凡魅力不复存在，因为毛的超凡魅力不是体现在参与日常事物的管理，而是体现在大的革命方略上的。

此外，还有几个有意义的问题。首先，尽管韦伯的理论认为，纯粹的超凡魅力型领导人需要得到反复的印证，一旦这位领导人不再能提供成功的答案，那么这种非凡魅力就将消失。<sup>27</sup>但实际上，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是如此的伟大，以致于毛虽然在社会主义时期犯了一些重要错误，但他的非凡魅力仍然没有失去。由于毛泽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和取得的成就，因此，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人的终生信仰。<sup>28</sup>

最后，已经得到印证的革命胜利同接下来的“革命”任务相结合——即社会主义的实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毛泽东对确定这些任务有着特殊的权威。正象前面曾提到的那样，<sup>28</sup>毛泽东经常把一些专门的、日常的事务——诸如经济计划等等让给其他人负责，而他则保留对革命总的方向上的指导权威。而到了60年代中期，领导层中他的很多同事都因为忽视了革命事业而丧失了他们的合法性。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层人物由于毛泽东早年的成功，长时期地向毛泽东的权威让步。甚至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10年中，虽然高层领导人中的多数并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1949年的胜利给毛带来的超凡魅力使得这些人不能采取行动来反对毛。

## 第二节 个人崇拜

如果真正的“特殊才能”（列宁和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发挥过这种作用）是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基础，那么这样的权威常常被人为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媒介试图塑造一个受人崇敬并有众多追随者的罕见的人物形象。

这个人物将被描绘为具有“非凡的能力”。典型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在塑造虚构的才能，并常常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气氛。如果说列宁在世的时候曾公开地反对过个人崇拜的话，那么他的继承人们却竞相把他们去世的领袖塑造成一个受人崇拜的偶像。而毛泽东则早在40年代，就被刻意塑造为具有超凡魅力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sup>30</sup>，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大救星的形象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华国锋和苏联的后期领袖们虽然缺少以上的特征，但他们也同样倾向于赞赏个人崇拜。<sup>31</sup>不过，个人崇拜最为典型的例子还应该是斯大林。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特点是利用崇拜旨在建立苏联独裁者的合法性。而歌功颂德、改写历史以及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同样存在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中。<sup>32</sup>和毛泽东一样，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在他战胜党内反对派之后才开始的。那时，斯大林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还不能自称具有列宁那样的“特殊才能”，同时他也没有列宁那样的威望。不过，斯大林通过种种方法开始培植起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首先，他主要是在公众舆论和广大党员中间施加影响。在这些人中，斯大林较为容易获得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形象。进而，这一切又变成了斯大林抑制反对派的政治因素。怎样才能使人信服，罢免“我们全部胜利的组织和和

领导者”<sup>33</sup>的职务是有道理的呢？也许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宣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高层领导人所接受。但在30年代，斯大林通过残酷的清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斯大林的革命伙伴——那些阅历丰富并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大部遭到了清洗，他们的位置被那些较为年轻的人所取代，这些人都要表现出崇拜斯大林才能在他的周围工作。要想全面地概括斯大林制造的恐怖气氛以及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的真正贡献是很困难的。此外，在苏联高层领导中，为树立斯大林的神秘形象而出力的追随者的数目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甚至反对人为地搞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的死表示了很大的遗憾：

多少年来，宣传机构一直极力吹嘘斯大林是天才，是人民的朋友和父亲，是我们生命的保卫者，“斯大林使我们取得了对敌人的胜利。”可是突然之间，斯大林不在了。正如我所说的，这是极大的震动。不仅对于人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我们，对领导核心的其他人，即曾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多年的人也是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他的死感到悲痛。我为他叹息。我真挚地流下了眼泪。<sup>34</sup>

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人为的个人崇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对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著名谈话中提到，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sup>35</sup>但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内，个人崇拜对于合法性来说，不象苏联那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个人崇拜在毛泽东的同事中也不大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在中国社会内为毛泽东创造的巨大的政治声望，与斯

大林在苏联的情景一样，具有抑制反对派的政治效果。实际上，前文已经指出了，后文将要进一步讨论<sup>86</sup>个人崇拜本身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在高级领导人中，许多人对毛泽东的特殊地位并不表示异议，但却反对搞过分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不同于苏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早些时候的历史中，党内重要决策的制定者们同毛泽东打交道时，或多或少地与他是平等的关系，而且他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是有职有权的。即使毛泽东以他的天赋和成就赢得了他们的忠诚时，与他长期共事的同伴也不大可能相信那种超天才的说法。<sup>87</sup>

### 第三节 业绩标准

正如T·H·里格比所观察到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有代表性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们总是要制定达到目标或完成任务的方针。这种体制的内部生活是由具体的任务和专门的目标控制着的。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真正合法性可以从这些目标和任务中了解到。里格比把共产主义国家说成是“目标—理性体制”。在这些国家中，合法性是得到承认的，但承认的程度则是根据公布的目标完成的情况来决定的。最高的目标是“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有很大的余地，允许后来的领导人填入更多的内容。不管怎样，一定的社会政治形式（如：集体所有制农业、国家所有制工业）和向更高的经济、文化水准进步的总趋势，是包含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总目标之中的。<sup>88</sup>既然这些目标的许多特定的内容是可以衡量的，那么合法性就依赖于向这些已公布的目标迈进时所取得的进展。例如：对一些具体任务的执行情况。

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中，业绩在某种意义上与超凡魅

力型的领导有一定的联系，“特殊才能”要体现在坚持既定的目标并为完成任务提供具体的领导方法。例如：个人崇拜要求在党的成就和领袖谋略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sup>39</sup>然而，功绩与超凡魅力之间的关系是有争议的。就象早就争论过的那样，超凡魅力最有可能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而不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的。<sup>40</sup>特别是一旦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以后，建设工作一般都不大轰轰烈烈，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专业技术。这种建设工作需要更多的具体方法而不是伟大的战略。这种状况最容易影响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存在，除非超凡魅力型领袖还有其他存在的理由。接下来我们需要分析讨论的是，在某种情况下，毛泽东超凡的革命魅力由于1949年后政策的胜利而进一步增强，这些成就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他具有“特殊”的洞察力的声望，而另一方面，他的失误仅仅是削弱了这一声望而不会摧毁这一声望。

业绩还与那些缺少特殊才能的共产主义领袖们的合法性有关。这里关键的因素是积累足够的政治支持以便提出领导权的要求。一旦这种领导确立起来，接下来的成功业绩将加强这种支持并巩固领导地位的合法观念。而另一方面，不断的失误将削弱已经确立起来的领袖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支持力量。也许赫鲁晓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他在内政、外交方面制定了许多“轻率的方案”，终于引起了高级领导层的一致反对，使他不得不下台了事。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领导人的政绩不单取决于取得了多少成功，如果他执行了不被接受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已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1966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走资派”一直是主要的批判对象。由于大批

判风气的影响（这一点后文将继续讨论），大批上层人物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或是抨击他们的革命品德，或是批判1966年以前存在的体制的合法性。事实上，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些事件表明，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其合法性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些斗争对于体制的运行具有不利的影响。革命的价值观念同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的特点。而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里，现实工作的成就更多地成为领导合法性的因素之一。

#### 第四节 民族主义的作用

民族主义常常被一些终身制的领袖们有效地利用，以支持他们的政策，巩固他们的地位。就象中国的现代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民族主义常常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性质。但也有例外，如当前的伊朗，其领导人沉迷于传统并利用传统来增强他们的合法性。虽然很多民族主义领导人是具有特殊才能的领袖，但大多数不具备特殊才能的领导人也巧妙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

民族主义与传统型和超凡魅力型权威有一定的关系。在民族自豪感和伟大传统之间有一条天然的纽带。一个民族的领袖能够把自己同历史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等同起来，比如斯大林就采用了许多沙皇式的专制方法。即使在中国，虽然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许多传统，诸如“封建”、“剥削”等等，但在党的官员和民众当中对民族的历史的确存在着一种自豪感。简单地说，现代的民族国家都是根植于过去的传统之中的，而民族主义利用过去的象征获得了极大的支持。

然而，这里讨论的目的是要找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与超凡魅力型权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杰出领袖很难同民族的大救星区分开来。近代外国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屈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立，而后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的“特殊才能”一经发现就解决了民族的和革命的危机。而且，追求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是为了使中国“繁荣富强”。<sup>41</sup>毛泽东通过制定明确的中国战略进一步发展了民族主义的成份；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要有的放矢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sup>42</sup>最重要的是，革命的成功造就了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民族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权威。实际上，中国的广大民众更容易把毛泽东看成是得胜的民族英雄，而不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sup>43</sup>而且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邓小平总结了多年的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个中国人知道，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sup>44</sup>

总之，1949年的巨大胜利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的超凡魅力达到了顶点。毛泽东的同事们，作为革命的创业者，他们认识到了毛在全盘战略方面的“特殊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同对毛的“特殊才能”的信任结合起来；做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感情为毛所吸引，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使得民族复兴成为可能，实际上，毛泽东同这个民族是融为一体的。

### 第五节 法定—理性型权威

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而单从理论上讲，法定—理性的权威与超凡魅力的权威是不能相容的。根据韦伯的观点，法

定一理性的权威“依赖于对标准的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任，同时也依赖于在这种规则下发出指令”。<sup>44</sup>“这些规则是早就制定好的，它不是对某个具体人的忠诚，而是对“法律”的忠诚；在某个人发布指令的范围内，与其说是这个人的才能起作用，不如说是政府机构的职能在已被接受的规则下起作用。而且，对于掌权的官员的任何忠诚都是严格地限定在规则规定的管辖范围之内的。相反，对于一个超凡魅力型的领袖来说，其权威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法定一理性权威的理想类型是经过委任的官僚机构，根据等级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具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并按照严密的程序工作，而且机构中的职员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然而，这样的理性的结构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这种结构也常常同超凡魅力的或是传统的政治权威发生关系。实际上，官僚行政机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创造了这些规则的权威的限制，官员们必须服从于他。按照韦伯的理论，这样的领导人及其部属在符合规章的制度下，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的官员，因为他们的工作范围没有严格的限定，同时也缺乏专业技巧。<sup>45</sup>不过，扩大韦伯的概念，这样的领导也可以被认为具有法定一理性的权威（根据既定的程序选举产生的）。<sup>47</sup>总之，基于法定一理性的原则，一位领导人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定的选举程序的基础上的，即使这种选举是由神秘的“群众意志”所决定的。

共产主义的政体有许多韦伯所定义的法定一理性权威制度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法规和宪法的存在以及各级专门的行政机构控制着全部政治生活。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讲，这种政体并不是建立在法定一理性的权威基础之上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很多方面的正式文件同现实很少有什么联系。更确切地说，这种体制下的领袖们并没有准备严格地遵



守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包括他们以真诚的态度制定的法律。一方面，在法定一理性和革命思想以及要完成既定目标的压力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在不断地清除法律上的障碍（即他们已认识到可能会妨碍他们实现某个重要目标的障碍）。<sup>48</sup>况且，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论，传统的观念与其说是希望健全好的法律不如说是希望建立好人政府，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法治的力量。

尽管如此，在讨论中国的法定一理性型权威的可能性之前，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的特殊规则是很必要的。中国的体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领导人的地位没有严格地限定在法定一理性的原则之内。在毛泽东生前，党的主席这一职位被认为是超过所有其他领导职位的，而且毛泽东实际掌握的权力要比任何规定所赋予他的权力都大。从1945年到1977年的5个党章对主席这一职务的权限未加说明，而最近的1982年的党章废除了主席这一职位。<sup>49</sup>那么毛泽东的特殊权力是怎样得到的呢？1943年，党的政治局做出决定，授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中的最后决定权。显然，这个决定是对毛泽东“特殊才能”非常信任的反映，而不是毛担任什么职务的必然结果。<sup>50</sup>在毛泽东以后的年代里，邓小平在主席这个职位没有取消之前虽然没有这个头衔，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却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规则对于领导人的限制是更有意义的。<sup>51</sup>这些规则建立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理基础之上，而且已经形成了重要的法定的文件，并在党的重要声明中反复强调。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特别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些组织原则（作为巩固毛的领导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相关的原则是：少

数人保留意见的权利和集体领导。从理论上讲，根据少数人保留意见的权利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种明显的特权，即他们可以在党内的适当范围内进行争辩并坚持他们的观点，而不必担心受到靠边站或解除职务的惩罚。此外，即使某个人处在少数地位，只要他履行多数人的决议，那么他就有权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并有可能在以后党的会议上得到拥护。<sup>52</sup>不过，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在“保留意见”的权利和需要严格执行决议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持续不断的怀疑会削弱已经得到批准的政策。况且，坚持公认的正确路线肯定会同主张少数人的权利发生根本的冲突。<sup>53</sup>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些时期里，少数人的权利经常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的尊重和鼓励，以便使一种方针政策能够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必要的讨论。对于领导人来说，这一原则的实质是很清楚的：他必须容许他的同事们提出批评意见，即使这种对政策的批评意见是尖锐的或是涉及到他本人。

当然，集体领导的原则规定，对于领导人来说是更为基本的限制。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形成了决议，从逻辑上讲，处于少数地位的领导人也必须服从。例如，在延安时期，刘少奇曾经说过，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但他也服从全党。不过，刘同时又说，毛主席代表了真理，所以我们服从他。<sup>54</sup>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有时领导人要接受反对他的优先权的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要控制多数。就象列宁，他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服从多数，而在大的问题上，即使他面临着特别顽固的反对意见，甚至有下台的危险，他也毫不退让，而是同反对意见激烈辩论，以达到坚持他的意见的目的。<sup>55</sup>毛泽东也具有列宁的部分特

点，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清楚地相信，正确的意见能够压倒任何程序上的考虑。

无论怎样，集体领导在中国的实践中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法定—理性概念，即使是在最好的时期里也是如此。这不单纯是由于毛泽东在危机关头常常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忽视其他多数人的意见，而且也由于对集体领导的原则缺乏严密的规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曾简单地把集体领导原则解释为：假如每个人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将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sup>56</sup>此外，当正式的文件强调集体领导必须同首长负责制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象主席这一职位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几乎没有正规的参照系数来确定个人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sup>57</sup>所有采用集体领导原则的体制，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集体领导的原则不仅容易受到超凡魅力型权威的破坏，而且其本身也反映出更多的要求一致的传统观念。

从法定—理性的角度看，一个更基本的缺陷是，现存的程序上的弊病同政治生活中的权力竞争经常扭曲在一起。现存的领导阶层没有一个正常的调整机制：虽然正式文件规定，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进行选举，但实际上这种程序仅仅是认可一下在别的地方早已形成的决定而已。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撤换一个现任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其他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屡见不鲜的。正如苏联赫鲁晓夫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机制的缺陷使得撤换一个失去领导层信任的领导者的活动成为可能。但情况也不总是这样，华国锋的例子就是另外一种情况。<sup>58</sup>不过，从法定—理性的观点来看，如果没有明确严密的撤换规则，那么领导人的任何更替都是大可怀疑的。

总之，虽然中国缺乏一种法定—理性的体制，但高级领导层已经很严肃地制定出了一系列正式的党的准则，作为这种体制和其领导人的指导方针。多年以来，毛泽东曾经是这些准则的坚决倡导者（虽然他有时在实践中违反这些准则）。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决定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在既定的程序之上优先考虑。从高层领导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这些准则的尊重或不尊重将会增加或损坏他的威信，尽管他的超凡魅力不会因此而丧失殆尽。不管怎样，毛泽东在其任职的最后10年里，对于合法性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导致了在毛死后中国又重新强调法定—理性的原则，即使这种强调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实行。

#### 第六节 传统型权威

传统从概念上理解介于超凡魅力和法定—理性之间。按照韦伯的观点，传统的权威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仰之上：“权力的尊严是从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并将永远存在的”。<sup>10</sup> 被赋予权威的领导者是在那些具有传统身份的人中间选择出来的，而其他人的服从是由于领导者掌握着传统的公认的职位。同时，传统的权威通常同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物有一定的关系，但又明显地区别于超凡魅力型的领导，因为传统对于领导者来说有一定限制。传统的王位之所以得到其他人的服从，仅仅是因为这种传统的等级地位是长久不变的；而超过了传统的界限，危及到统治者的地位，通常被认为是“犯上”和“造反”。在传统的法规限制统治者自由行动的同时，他的个人权威（不同于法定—理性体制下的官员）也包含有许多未加明确的特权。在他可以随意管辖的范围内，它具有选择的权力。从这种传统的权威体制到另一种传统的

权威体制，随意行动范围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差别也是非常之大的。此外，当任何违反传统界限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则取决于其他人对领导者忠诚的程度。<sup>60</sup>

在韦伯的论著中，他注意到，那种认为中国皇帝的个人品质将决定国家的幸福安宁的观念，常常给中国的皇帝罩上了一层超凡魅力的光环。<sup>61</sup>特别是朝代的创建人往往具有超凡魅力，在传统文化中他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不过，这样的超凡魅力型人物，通常在王朝建立以后就被传统化了。无论怎样，王朝创建者可能具有的“特殊才能”已经和所谓“天”联系在一起，并以世袭的形式传给继承人，由此在位的皇帝都具有了想象中的才能。这种局限性是帝制的标志，当然，最为人所知的有关“天”的意志的观念也包括在内。如果一个皇帝实行暴政进行统治，那么从理论上讲，他的臣民们有责任起来反抗<sup>62</sup>并废黜他，因为他没有真正贯彻“天”的意志。不过，更为重要也是我们这里更为关心的中心问题，是有关传统观念中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朝廷的官员对皇位要表示忠诚，这种忠诚仅限于对皇帝本人，或者是仅限于对皇帝一家；以正统的新儒学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从效忠原来的朝廷转向另一个朝廷更为耻辱的了<sup>63</sup>（在朝廷内部，这种效忠可以转移给合法的继承人。长期以来，这种皇位的继承形式都是传给皇帝及其配偶的长子；不过，在清王朝，也由皇帝指定继承人的另外一种尝试。<sup>64</sup>）。然而，服从受到伦理观念的制约。朝廷官员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也根据传统的对与错的是非观念行事。一个好的皇帝会注意大臣们的忠告，并且有广泛征求意

见的习惯，从而接受朝廷官员们明显一致的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大臣察觉到皇帝的不明智或有不恰当的行为时，儒家的传统观念是鼓励这个大臣讲出来，并反对皇帝的举止行为。根据传统，正直是一个官员卓越的品德，是远远胜过单纯的效忠的。如果皇帝严重地坚持错误并拒绝倾听大臣们的忠告，那么，孟子认为，这时的大臣们有责任通过辞职或引退来解除同皇帝的辅佐关系，极端的情况则是废黜皇帝。<sup>65</sup>

虽然这样的伦理观念在经典的传统中得到很大的支持，但过份地强调它们将使我们误入歧途。首先，儒家的伦理观念同朝廷的正式规定是相矛盾的。早在汉朝初期，朝廷就强调，政治权威要集中于一人之手，即皇帝手中。<sup>66</sup>到了明清时期，这种集权制已发展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况且，即使儒家的伦理得到了心照不宣的承认，也无法有效地束缚皇位的权威。尽管孟子主张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废黜皇帝，但一般的传统更强调一种较为消极的方式，即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去批评一个犯了错误的皇帝，用孔夫子的话说，下这样决心的大臣要随时准备献身。<sup>67</sup>这种号召包含着为政治权威，甚至是为一个犯错误的皇帝殉葬的意思。的确，大臣们可以对皇帝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但他们必须面对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严厉报复。对于那些为朝廷服务的大臣们来说，造反并不是他们真正的选择；任何与皇权对抗的挑战都必然是来自朝廷之外。实际上，帝制在很大的程度上包含有韦伯所说的随心所欲的成份，尽管全部的伦理观念对统治者和大臣们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大臣们能够对皇帝的意见表示异议，甚至辞职，但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做更多的事。

1949年以后的中国，这种传统伦理观与权威关系的全部

实质是什么？一些分析家指出，在许多方面，传统价值观念仍然深深地留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许中国政治领导人自己的言行最为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例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传统伦理观念至少部分地支配了彭德怀的思想（后文还要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彭在回答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评论（张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时指出：“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而厉害。”<sup>68</sup>此外，毛泽东本人在谈到对他的个人崇拜时说，这种崇拜可能由于3000多年的传统习惯而被扩大。用毛泽东的继承人的话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深受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sup>69</sup>在毛泽东死后，虽然努力树立只有一点威信的华国锋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他却是毛泽东临终前以个人权威选择的接班人，这也表明，根据传统的观念判断合法性在中国人看来是很重要的。

由此可见，封建帝制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权威关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传统的忠于皇帝的观念，特别是忠于各朝代缔造者的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高级领导层的基础；甚至在毛泽东死后也抵消了对他更为严厉的批评。这至少是由于人们对前辈和各朝代的创建者的巨大业绩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犯错误的注意。况且，象个人崇拜这样的观念也可能束缚领导阶层中任何想要反对毛泽东的人。正如毛泽东死后一些分析家曾指出过的那样，保守的农民意识对权威的崇拜心理起到了巩固毛泽东统治的作用。<sup>70</sup>除了对“皇帝”的忠诚以外，传统观念还引起了人们对“皇帝”正直行为的期望。当毛泽东在他的领导阶层中辜负了这种期望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些不愿意合作的基础，虽然还没有公开地反对他。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的年代里，这些帝制传统的因素促

使领导人总结经验，注意倾听忠诚的官员们的意见，这对领导者的权威起到了有力的限制作用。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对韦伯有关传统权威概念的应用并没有完全概括近现代传统的重要意义。至少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后的60多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传统。1980年，当各项组织原则在《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得到系统地重申时，这一举动被当做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而倍受欢迎，<sup>71</sup>虽然这些准则从法定—理性的角度看还有些疏漏。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还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在威望和资历基础上的个人影响往往比正式的位置更具合法性<sup>72</sup>——在党内，这种威望来自于参加革命运动。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历史中，威望和资历在党内的权威关系中一直都是关键性的因素。同时，就象以上所讨论过的那样，毛泽东的地位已超出了传统的惯例，并在很大程度上笼罩着超凡魅力的光环。而在毛泽东死后，任何一个合法性领导的竞争者都不可避免地缺少这种超凡魅力，因此也就更需要党内有足够的资历来保障他的地位牢固可靠。



## 第二章 毛泽东权威的变化特征

(1949—19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做为领袖的合法性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是没有异议的（而他的威信出现严重问题仅仅是发生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过，在1949年以后的所有时期中，这种权威的基础毕竟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下面按4个时期加以分析：（1）1949—1958年，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得到完全巩固的时期；（2）1959—1965年，毛泽东的行为在高级官员中引起一些保留意见，但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3）1966—1971年，毛泽东运用他的超凡魅力淡化法制的作用，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4）1972—1976年，出现了毛泽东权威的有限挑战。

要想充分理解这样变化的态势，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种体制和领导者的合法性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sup>73</sup>在享受了最初10年的高度合法性之后，这种体制遭到了一系列的打击，引起了社会主要群体的失望，以至于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众多因素，其中包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已经取得政权的正统意识，得到民众承认的生活水准的逐渐提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为重要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为新的体制和它的创建者赢得了实质性的权威。大跃进失败以后出现的经济危机是第一个重大的挫折，这个挫折动摇了农民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任。<sup>74</sup>更为严重的危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

“革命”造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不满，其中包括经常遭受严重打击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劳动面临着极为贫困的生活条件的城镇知识青年以及其他的一般党员和政府官员，他们不理解本单位内部出现的那种相互斗争的关系，对林彪问题也感到困惑。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这种积累起来的对合法性的侵蚀，终于引发了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城市的大规模抗议，这使毛泽东的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真正的自发的政治抗议的直接打击。<sup>76</sup>

### 第一节 1949—1958：全面加强

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在高层中的个人权威由于以上讨论的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共同起作用而被加强。当然，这一时期的开始，由于革命的胜利给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毛扮演了一个“非凡”的战略家的角色，为共产主义和民族的胜利和解放指明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使经济迅速增长，这些成就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权威。在第一个5年计划（1953—1957）期间，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提前完成，而且经济以6%~8%这样令人敬佩的速度向前发展（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成就后来导致了戏剧般的“大跃进”。

毛泽东的权威得到加强不仅仅是由于新体制的全部成就，而且也是由于他所特有的政治创造力。同时，在这一时期里，他做为一致公认的领袖参与制定了所有的大政方针，并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的声望。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在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打消了很多高级干部的疑虑。抗美援朝运动

的全部价值在于，它使人民振作起了建设新中国的精神，并使中国做为一股重要的势力加入到国际政治中去。<sup>76</sup>此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sup>77</sup>毛泽东在1955年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合作化的结果比政府官员制定的预定目标要快得多。然而，1956—1957年进行的百花齐放方针的试验，很可能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中的最大失算。不过，他通过及时发动反右运动，对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给予了猛烈的打击，恢复了自己在国内领导层的威信。<sup>78</sup>最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问题上的决断似乎也被认为是首创性的。到了1958年底，尽管大跃进的种种缺点开始暴露出来，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出现的仍然是经济的空前增长。<sup>79</sup>

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一个颇有影响的方面是个人崇拜。总的说来是极力扩大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在最初的几年里出现了大量文章赞颂这位党中央主席多方面的才能。<sup>80</sup>而且，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们宣称，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sup>81</sup>然而到了1956年，个人崇拜陷入了困境，最引人注意的是新党章中删掉了“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尽管有许多矛盾的说法，但这不应该被认为是毛的彻底失败。显然这是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赫鲁晓夫发动的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而引起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气候的影响，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参与了做出这样的决定。<sup>82</sup>不管怎样，到了1958年又出现了新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公开赞颂，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从法定—理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权威也是非常之高的。<sup>83</sup>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党内高级领导层在苏联模式的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当然这种一致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是不断地调节方针政

策方面的一些争论的结果。而毛泽东总的说来在其中起到了某种平衡的作用，既批评“右”的也批评“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少数人的意见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贯彻，不过也有某些偶然和暂时的例外情况。<sup>84</sup> 最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57年下半年，基本上没有出现因为政策意见上的不同而导致清洗运动。<sup>85</sup> 同时，对不同意见的宽容态度鼓励了争论，集体领导显然也是成功的。毛泽东还带头革新政策，实行了诸如百花齐放这样的方针，这表明毛泽东是能够控制多数的。而且，关于大跃进的战略，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那时这些准则已经开始遭到破坏，清洗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已深入到了省地一级，而集体领导的共同基础也由于在苏联模式问题上的明显意见分歧而被削弱。<sup>86</sup> 总之，尽管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因素，但全面地看，毛泽东统治的“法定”基础由于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发展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最后，在1949—1958年的整个时期里，传统的因素使毛泽东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总设计师，毛泽东获得了超凡魅力型的权威，这是对一个新政权的创始者的回报。况且，毛泽东提倡的许多正式的党内准则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法定—理性的合法地位；他倡导的广泛协商的制度以及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风格，恰好与传统观念中的开明皇帝的一些做法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最初时期里，传统的因素与法定—理性的因素一样增强了毛泽东合法地位的重要基础。

## 第二节 1959—1965：游离于法定— 理性型与传统型之间

除了大跃进失败以外，毛泽东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另一个重要事件，即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影响。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如何解决大跃进中不断暴露出的问题而召开的。<sup>87</sup>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特别是当彭德怀批评了大跃进的一些做法之后，他对彭德怀的猛烈攻击，不仅严重地违背了党的准则，还从传统观念的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庐山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由于忽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在他的同事中已经引起了不满。1959年初，毛泽东深深介入大跃进的具体事情，他发出的许多指示和文件都没有很好地在政治局内部讨论。这年4月，据说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的“长官意志”。不久，张闻天也在一封信中说要反对“个人专断”的作风，此外，在庐山张闻天还抱怨说，政治局会议规模大，时间短，缺乏充分的集体讨论。<sup>88</sup>

毛泽东违背了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同时，他也破坏了少数人保留意见的权利。其实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走极端。这种批评不仅不能被认为是对毛泽东的个人攻击（见后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了这位主席在几个月前的号召，即要及时揭露经济工作中的缺点。<sup>89</sup>最重要的是，彭德怀做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就党的方针政策问题发表不同看法，完全是应有的正当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内，一些具有法定—理性观点的人流露出了一种情绪，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是不公正的，彭只不过是运用了他的合法权利而已。甚至在反对彭德怀观点的“左派”中，也有人对彭德怀所受到的处理感到怀疑。例如

李井泉（他在庐山会议上曾与彭德怀争论过，而在早些时候他甚至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态度也有些保守），据说他在庐山会议之后曾惊叫道：“彭德怀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但他只不过是说了几句错话，而且他的确没有利用我们的缺点来反对我们的意思。”<sup>90</sup>

庐山会议的某些情况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有点类似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之间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不仅没有暗中攻击新中国的创建者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在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中所采用的批评方式与其说是平等的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向一位皇帝请愿：“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sup>91</sup>结果毛泽东却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这同历史上一些正直的大臣被免职的情形十分相似。同时汤姆·费希尔具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1959—1962年期间，吴晗所写的关于明朝大臣海瑞的剧本其真正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不管这个剧本在当时是否被理解为是对毛泽东的攻击，<sup>92</sup>但至少在一些中国领导人看来，彭德怀和海瑞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sup>93</sup>这种相似之处不仅表现在同是一个正直的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表现在，虽然这个官员有责任提出不同意见，但他仍需要接受皇帝的裁决。海瑞除了接受皇帝的旨意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彭德怀除了接受毛泽东的裁决之外，仅仅能够恳求让他回乡种地。

解除彭德怀的职务得到了毛泽东在高级领导层内的同事们支持，尽管这种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也引起过他们的担心。将近20年后，叶剑英回忆：

刚开始，我，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总理都觉得彭德怀说的对，但后来，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发了一个指示，并且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并站到毛主席一边来批评彭德怀……”<sup>94</sup>

对毛泽东的这种妥协举动可以看做是政治上的精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划了这样一条界线：或者是彭德怀，或者是我。而在任何政治风浪中，只要站在毛泽东的路线一边就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况且，即使是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能够顶得住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反对毛泽东，但是怎样才能消除长期以来广大的公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从这种角度来看，同领袖直接冲突所潜藏的不稳定性与领袖对组织原则的损害比起来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然而过分地强调在正式的决议中毛泽东所获得的支持也是片面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毛泽东的权威是早已被承认了的。服从，这是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基本要求，但不是超凡魅力的权威继续获得成功的基础。正象叶剑英的回忆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所极力推行的“大跃进”政策在当时就引起过很大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的怀疑。“大跃进”的失误和毛泽东早些时候所实行的“百花齐放”方针的失败加在一起，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做为党的主席的威信，因为主席应当是能够及时解决当前困难的人。不过，毛泽东的这些失误同他在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功绩比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不管毛泽东1959年在经济方针和组织原则方面回犯有多么大的错误，他的同事们都不会因此把他的名字同党和国家分开。

60年代初期，当严重的经济危机终于被认识到的时候，基本政策开始有了改变，伴随这一过程出现的是恢复党内各

项准则的努力，而且毛泽东也重新以公正的领袖的形象出现。毛泽东不仅重新倡导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反复号召他的同事们不要有顾虑，要行使少数人的权利，说出不同意见。<sup>95</sup>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令人困惑的个人崇拜的热度也升高了。由于林彪竭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其他领导人也开始过分地强调毛泽东说过的话。而毛泽东本人则是一个典型的充满矛盾的人。据说1961年毛泽东曾支持中共中央宣传部禁止把他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提的做法，并且在3年以后，他又称赞了刘少奇不赞成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话当作教条”的做法。<sup>96</sup>但毛泽东又默许了林彪的许多耸人听闻的奉承，其中包括把乒乓球比赛获得冠军也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还称赞一个运动员的讲话“充满了唯物辩证法”。<sup>97</sup>这样一来，高级领导层在复活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出现了裂痕。不过从整个情况来看，任何形式的崇拜，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都不大会增加毛泽东权威的份量。

这一时期对法定一理性和传统的最大尊重体现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在1959年初，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协商，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这一职务，他做为公认的接班人的地位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愈明显。<sup>98</sup>由于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选择，因此他的上任兼有世袭的超凡魅力，<sup>99</sup>和传统的帝王传位这两种因素。不管怎样，接班人的安排问题至少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了，而在那以前很久刘少奇在党内就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因此，刘的上任无疑是经过了广泛的协商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传统，刘少奇做为主要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也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接班人。最后，刘少奇1959年的任命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的，并且为他提供



了重要的工作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选中了的恰当的接班人，而且也是一个“合法”的接班人。

不过，尽管刘少奇的法定职务是经过大家一致同意才任命的，但接踵而来的事件表明，刘少奇的地位仍然要依赖于那位神圣领袖的恩赐。就毛泽东本人而论，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威信比起1949年建国前后要低得多。毛泽东的超凡魅力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成功以及唤起了民族希望这两个方面，但近年所发生的事件仅仅给这种超凡魅力增加了有限的一点光彩。如果说大跃进的失败曾使毛泽东的威信有所损失的话，那么1962—1965年的经济复苏，又使他的威信有所回升。不过，正象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些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大都是毛泽东的同事们制定的。<sup>100</sup>个人崇拜的复活并没有使毛泽东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威信得到提高，反而提供了一个争论的焦点。传统的忠于皇帝的观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支持和巩固毛泽东地位的作用，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公正地对待彭德怀从而使这种支持大打折扣。虽然官方的一些规则仍然在艰难地发挥作用，但毛泽东权威的法定—理性基础却由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专断作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 第三节 1966—1971：法治遭到破坏 超凡魅力大显其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一系列问题上的失误导致了对法定—理性原则的大破坏。到了1966年8月召开中央全会时，法定程序的无能为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这次全会批准大规模地改组领导班子，并且承认了由

“革命师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sup>101</sup>随着运动的展开，一场横扫一切的斗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各项准则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之下，也不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只要是反对过毛泽东，就会被上纲为反毛泽东思想并被判定为有罪。这样一来，毛泽东曾经接受过的多数人的不同意见，以及持不同看法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统统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这种新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于超凡魅力型权威的领导。林彪曾在这个8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就这一点告诫他的同事们：我们必须以毛主席为轴心，要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每一件事情……。林彪还说，在处理问题时，主席善于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他的许多战略意图我们是很难了解的。因此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绝对的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sup>102</sup>这一要求引起了连锁反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加剧，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与此同时，不停地宣传“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主席的天才与受到歪曲的革命历史相结合，实际上是抹煞了其他大多数革命领导人的贡献，这种做法在高级干部中是很难提高毛泽东的威信。毫无疑问，个人崇拜只能在感情容易激动的红卫兵组织中扩大毛泽东的权威。的确，这种人为造成的超凡魅力在普通人中日益成为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但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当“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破坏被认清以后，毛泽东的权威在公众的心目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sup>103</sup>不过，同传统观念紧密相连的崇拜仍然支撑着这种权威。“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唯一的决策人，这类似于开国皇帝的做法，而且毛做为一个“公正”的领袖同“腐败”的官员们做斗争同旧时代的统治

者的做法也是相同的。更确切地说，毛的形象与传统观念中的伟大帝王的形象是相称的。<sup>104</sup>这样一来，这种奇特的被夸大的革命超凡魅力同个人崇拜中的传统因素就融合在一起，指导着中国人民。

与此同时，对林彪的个人崇拜也搞起来了，但对林彪的个人崇拜同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不能分割的。林彪的革命功绩被吹到吓人的程度，但他最主要的“特殊才能”是做“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sup>105</sup>同刘少奇一样，林彪也是毛泽东个人挑选的——但没有象前一个接班人那样经过广泛的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少奇做为接班人出现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而林彪则是在1966年8月中央全会上突然被挑出来做为毛泽东的新的接班人。接下来的一系列努力就是为林彪的地位提供一个合法的装饰，这种做法同法定一理性的原则相距甚远。1969年的党章不仅明确写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副主席，而且还称他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sup>106</sup>这样从超凡魅力的领袖那里取得的合法外衣就穿在了林彪身上。很清楚，任何来自副主席这一职位的权威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不具备实际的内容。

权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使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直接攻击所有党政机关（解放军只有部分的例外<sup>107</sup>）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什么毛泽东的主要批判对象<sup>108</sup>不做任何抵抗就缴械投降？而高级干部的大多数又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呢？1967年2月，毛泽东的一些同僚开始厌恶“文化大革命”并公开要求制止“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不人道的做法，他们的这些活动被定为“二月逆流”。那时，一些重要

的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国务院副总理，对批判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的做法感到惊愕。他们激愤地认为，这些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是有功之臣，现在却遭受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当众羞辱，这是不能容忍的。谭震林曾气愤地说：我不该跟毛主席40多年……。但是，这些老资格的干部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的决定，而政治局的权力也被成立不久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其中是主要角色）所接管。在要求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呼声高涨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就象在1959年曾经做过的那样，再一次提出两种选择，或是服从他的意志，或是同他直接较量。这样，多数老革命家只好屈服。<sup>109</sup>

毫无疑问，有多种因素限制了人们的斗争。担心直接攻击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会严重损害国家制度的心态起到了某种束缚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尽管有红卫兵的野蛮行为出现，但在领导圈子内部，人们还是相信或者至少说是希望毛泽东对老同志的处理能限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sup>110</sup>其他的因素还包括这样的事实：刚开始时，人们对这场运动要历时多久还不清楚，还有毛泽东同林彪结盟所形成的一种潜在的武力威胁以及人们对扩大事态的恐惧等等。当然，象在庐山时一样，各种利害关系的考虑也显然包括在内。当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是尽了自己的义务。毛泽东建立在1949年革命和民族主义胜利基础上的超凡魅力又重新出现了。然而，这时的超凡魅力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毛泽东的行为直接背离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这场新的运动对国家的职能所造成的损害很快就明朗化了。严重的经济

滑坡，国防能力削弱以及广泛的社会倾轧，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这就是由一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伟大舵手的毛泽东所治理的国家。然而，对毛泽东这位超凡魅力的领袖的支持仍然存在。例如许世友在1971年曾表示过：我不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我将全力以赴去北京保护你。<sup>111</sup>这种个人权威能够抵挡住这样一个巨大的失控运动的考验，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领导的1949年革命胜利所形成的深远影响，仍然存留在这些领导干部的记忆之中（他们曾与毛泽东有过共同的经历）。

虽然毛泽东获胜了，但他建立在超凡魅力基础上的革命资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相对减少了。1968年以后，为恢复外表上的稳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可能使毛泽东的威信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林彪事件的发生给了毛泽东又一次的严重打击。不管那种企图直接加害于主席的说法是否属实，冷酷的政治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的“最好的学生”，他个人挑选的接班人，即使不是一个十足的恶棍的话，至少也是一个极不恰当的人选。<sup>112</sup>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谄媚者的空话面前表现出了某种政治上的“天真”。

#### 第四节 1972—1976：对领袖的传统性抵制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政治生活才从林彪事件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然而到了1973年，党的旧的路线的执行者和主要的批评者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又一次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并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被称作“四人帮”的这些人 and 比较务实的官员们之间的斗争既包含有一些个人恩怨也包含有大的思想见解上的不同。各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这种斗争的冲

击波。而毛泽东在这一斗争中无疑始终是一个关键人物，尽管他这时的影响比起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毛泽东的健康逐渐恶化。到了1972年，毛泽东的语言表达已极为困难，这一点已得到尼克松的证实，而到了1976年，他几乎只能发出一连串单音节的咕哝声。<sup>113</sup>另外，毛泽东既不能够也不愿意在各派斗争势力之间进行果断的选择，虽然这可以被理解为他故意超脱于两派（以及高层中的各种中间势力）之上以便加重他说话的份量。但是，在如此激烈的派别斗争中，他的这种做法只能进一步冲淡他的影响。

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明确支持过两个主要的斗争派别中的任何一方，但所有的资料都表明，他和激进派的关系似乎更近一些。虽然毛泽东对周恩来周围的人<sup>114</sup>所提出的稳健政策和现代化的方针曾经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激进派的一系列主张在毛泽东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在1973—1976年期间，毛泽东新发表的语录大都是鼓励“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平均主义主张的。例如1973年毛曾号召要敢于“反潮流”，1975年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八级工资制，1976年又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sup>115</sup>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周恩来在197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时却不得不从毛泽东在1964年曾赞同过的概念中去寻找根据。而且，毛泽东没有出席全国人大这一事实或许是表达了他对此并不热心的真意。实际上，他在此后不久就发动了一场反对在工资和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这些并不是四届人大所部署的任务——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优先考虑的问题与周恩来等人是大有出入的。<sup>116</sup>

无论毛泽东对新的“四个现代化”的设想抱何种态度，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有意义的是这个计划是在没有毛泽东的权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毛泽东这时正在提倡猛批“资产阶级法权”）。从形式上看，“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是合理合法的：这个计划在1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批准，而且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方案随后在许多专门机构参与的会议上制定出来。但是这种政治形势的出现，从传统的角度进行说明可能更好一些。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些年里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一直是不可捉摸的。他们长期以来是一种共存的关系，而且相互合作，相互依赖，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很明显。1972—1975年期间，在某些领域，这种合作关系仍然继续存在，对外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sup>117</sup>然而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一些重要的国内政策方面，两人无疑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使人吃不准的是毛泽东和这位总理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毛泽东去世后，有些人认为周恩来很象一个不敢反抗皇帝的“封建宰相”。<sup>118</sup>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肯定周恩来，例如廖盖隆在他所作的党内报告中说：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周恩来同志取得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就着手恢复党的固有传统，解放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落实的还是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开始是允许他这样做的，后来就不高兴了，因为他还在有系统地恢复他原来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就

批判了“右倾回潮”，后来又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斗争。<sup>119</sup>

这两种说法可能并不矛盾。做为一个忠诚的“大臣”，周恩来从来没有直接反对过毛泽东，但他利用了毛泽东讲话前后矛盾的特点以及毛对局势控制能力的下降来推行自己的方针。也有可能是周恩来利用得到的机会试图制定一个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发展规划。就毛泽东而言，他之所以看到了令人不愉快的政策而没有公开批判周恩来是因为他顾忌这种批判将导致的政治后果。<sup>120</sup>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周恩来的一些做法，也许还有感谢周恩来这些年来对他的忠诚和服务这样的因素。

无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怎样微妙，周恩来的个人威信对于他在1975年能够提出搞“四个现代化”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的个人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传统因素的基础之上的。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传统，周恩来做为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而且他的领导风格也非常引人注目。在毛泽东死后不久出现的一个小小的对周恩来的崇拜浪潮中，这位“敬爱”的总理被描绘成具有所有的儒家美德：正直、稳健、高尚而且态度慈祥。<sup>121</sup>其中具特殊意义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老干部的功绩。甚至在1977年初，在当时“文化大革命”仍然受到官方肯定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就受到了热烈的赞颂：

1967年，林彪、陈伯达、江青伙同他们伸向外事口的黑手，抛出了所谓“7月动荡，8月大乱，9月夺权”的行动计划，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一时越刮越烈。8月



11日，他们策动一些人开了批判陈毅同志的大会。会议进行中，他们违背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对这个大会所作的指示，搞突然袭击，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总理寸步不让。为了揭露敌人，教育少数受蒙蔽的群众，周总理愤然退场，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离开会场。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8月28日，竟指使一伙人围攻周总理，使周总理连续18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他们还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愤怒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敬爱的周总理砥柱中流，击风搏浪，使林彪、陈伯达、江青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sup>122</sup>

周恩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但他对于领袖也好对于他的同事和下级也好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在70年代，这种个人威信帮助他在缺乏毛的明确支持，甚至毛在当时仍是最高决策者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大略。

周恩来个人威信的重大意义在他1976年1月去世时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时不仅“四个现代化”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毛泽东显然认为这个计划走的太远了），<sup>123</sup>而且周恩来精心安排的继任人也马上失宠了。1975年1月，由于周恩来健康状况恶化，邓小平曾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同时邓还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尽管周

恩来曾给邓小平的任命披上了法定—理性的外衣，但在他死后，邓小平还是被剥夺了权力并再次遭到宣传媒介的严厉批判。这一切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毛对邓小平的结论是，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sup>124</sup>这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邓小平的法定地位都要首先取决于毛泽东。毫无疑问，当初在周恩来的极力主张下，毛泽东不仅曾经批准过邓小平在1973年复职，而且也批准过四届人大对邓小平的人事安排，让邓小平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sup>125</sup>

虽然周恩来的个人威信不再能够保护“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但传统的影响仍然起到了减弱毛泽东的权威这样的作用。在周恩来逝世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虽然能够把邓小平从当时的领导岗位上拿下来，并任命了华国锋当代总理，但他既没有取消邓小平的头衔，也没有任命华国锋为正式的总理。<sup>126</sup>据报道，政治局的一些重要成员，例如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消极对抗“批邓”。<sup>127</sup>只是在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人民群众的抗议浪潮震动了领导阶层），华国锋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理，同时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然而，阻力依然存在。尽管毛泽东一再指示批邓，但还是允许他保留党籍，而且邓小平的亲信也没有完全遭到清洗。<sup>128</sup>据说许世友在天安门事件后曾伴随邓小平去中国南方，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曾会见过许多领导人，随着毛泽东死期的临近，这些领导人开始酝酿同“四人帮”做最后的摊牌，<sup>129</sup>但这些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准备对垂死的领袖本人采取行动。

毛泽东的权威由于各种因素已经被削弱了。除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之外，他的政治裁决显然受到了不少高级官员的抵制；这些官员认清了毛泽东正在推行的是一条严重损害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路线，就转而拥护另外一条与之明显不同

的路线，曾经盛行一时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一时期也有些衰落，但正如我们以前曾提到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崇拜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圈子内都不会起主要的作用。况且，这些高级领导人已认清了违反法治所带来的危险和痛苦，并开始寻求恢复法定的程序。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君臣之间应维持适当关系的传统观念曾被周恩来亲手加强，并在周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使政治局委员们犹豫不决。总之，毛泽东的权威仍然存在——这足以把一个有权势的人拉下马并继续损害中国经过批准的合法政策。战胜封建主义取得的革命成功和战胜帝国主义取得的民族胜利（与建立一个新中国产生共鸣）仍然保留着强大的影响力（尽管文革10年很快就被认为是“十年浩劫”）。这种影响力足以维持毛泽东的地位直到他去世，并使他的意见成为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在他的最后10年里，这种影响力不再能够使他的同僚们完全听命于他，并防止他的同僚们策划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

### 第三章 新一代领导人对合法性的追求

到了毛泽东逝世之时，共产党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50年代末开始，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任就出现了动摇，特别是1966—1976年的动乱不仅使许多社会团体对党和政府信任受到很大的削弱，而且在众多的普通党员和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信任危机。虽然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尽了一定的努力来恢复社会秩序，提倡“安定团结”，并在高级干部中缓和矛盾，但在80年代初，官方所说的信仰、信任危机还是不断增长。<sup>130</sup>

这些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毛泽东时代信仰的幻灭而引起的，1976年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也招致了不少的怀疑。在社会上以及党政机关中那些忠实于毛泽东理论的人看来，新领导所实行的政策常常具有“修正主义”之嫌。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远远偏离了毛泽东主义的经验，而且人们对新领导的信任也由于毛泽东以后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出现了动摇。随着中国同外部世界接触的扩大，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干部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生活条件有了了解，而且还认识到了台湾等地区的生活水平也远在他们之上。不过，危害最大的因素还是党政机关中出现了腐败现象，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在1966—1976年这段时间里，正常的组织原则遭到了破坏，这就给腐败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个因素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遭受迫害的干部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捞取好处以便得到补偿。结果，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越来越公开化了，一些要求入党的人甚至受到讥讽，党政机关中也出现了那种只图个人享乐的剥削阶级观点，而且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日益增多。由于腐败现象的进一步扩大，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同样深深地渗透到党政机关。其结果是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邓小平曾带着怀恋的口吻谈到：“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sup>181</sup>但这种早年的合法性基础并没有很快地得到恢复。

毛泽东逝世以后的形势，在高层领导内部产生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威问题。因为这个高级领导层对使他们成为主要受益者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在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之内，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四人帮”，并且重新强调“安定团结”，在领导层内部清除了障碍。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些领导成员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sup>182</sup>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迹象表明，这个领导层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会委员缺少足够的权威去做出决定。这个领导层内的成员大都认为，正是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恢复了国家的重要机构，所以，他们就应该成为主要的领导者，而做为领导者就应该拥有权威，并且他们的地位就应该是合法的。

### 第一节 华国锋的继承权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逮捕之后，华国锋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毫无疑问这是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出

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决定是与整个高级领导层迫切的政治需要相一致的。一般来说，一个已故的领袖通常会对他的继承者们产生一种推动力，促使他们在国内外的公众面前以通力合作、团结一致的面貌出现。这种推动力在毛泽东逝世的一个月之后（与“四人帮”的最后斗争结束时），显得更加突出。华国锋在当时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既可以为70年代中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国家行政官员所接受，也可以为象他本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坐“火箭”提升起来的新干部们所接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的任命适应了政策连续性的需要。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个政权所宣称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而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有助于加强这种合法性。虽然在饱受10年倾轧斗争之苦的主要社会成员的眼里，把华国锋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是否有重要价值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这种联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些人对毛泽东依然十分尊重。此外，在毛泽东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华国锋曾被中央委员会正式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这就进一步使他成为当然的法定候选人。出于稳定大局和连续性的考虑，高级领导层在选举华国锋为新的党中央主席的时候采取了与之合作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彻底地承认了华国锋的合法性，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华国锋当初被选为接班人的怀疑已经烟消云散。

当初对华国锋的任命还有许多疑问。显然这个任命是在1976年4月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决定的（那时邓小平被正式免职）。华国锋不仅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而且被选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由于这个职位以前从未设置过，因此华的地位明显地超出了其他政治局成员，并以接班人的面

貌出现。那么是谁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没有召开，但这个决定却是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名义出现的，这个决议说华国锋的任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全体一致同意的。<sup>133</sup>这就掩盖了其他几种可能性。最有可能的是，毛泽东果断地选择了华国锋，而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所带来的压力下同意了这一选择。<sup>134</sup>不大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毛泽东选择了另外什么人<sup>135</sup>，但受到政治局的反对之后又提出了华国锋这样的人选（华在1975年贯彻执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up>136</sup>）。实际上这个决定是一个折衷的方案，在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对提升华国锋这样有经验的官员感到可以接受的同时，毛泽东既达到了清除邓小平的目的，又确定了过去一贯支持他本人方针的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sup>137</sup>不管真实情况如何，4月对华国锋的任命，通过毛泽东的提议赋予了华国锋以世袭的继承人的地位，同时又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决议的认可使其获得了法定一理性的合法地位。但是无论怎样，这个任命的基础也是不够稳固的。因为病危之中的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还无人知晓，而且他此时是否还能做出理智的判断也是大可怀疑的。<sup>138</sup>另一方面，这个任命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没有正式召开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因此其合法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虽然华国锋作为主席的地位通过1976年10月另一个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得到了法定的承认（这就再一次对前一个决议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但巩固他做为领袖的合法性的最初努力依然要靠超凡魅力和传统观念。这里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尤为重要的。从全局出发，无论对于华国锋还是对这个政权都需要继续大力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此，新的

领导班子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悼念毛泽东的大厅里宣布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sup>139</sup>而从华国锋个人的角度来看，重点是要强调他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而且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他。毛泽东生前对华国锋的评价“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被广泛地宣传报道，<sup>140</sup>毛泽东写这句话的草书副本和两个人在一起的画像也到处散发。此外，华国锋的“特殊才能”也受到重视，他被颂扬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是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且，在1977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华国锋通过正式的选举终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定—理性的支持，叶剑英还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21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sup>141</sup>

这些宣传形成了对华国锋的小小的个人崇拜，一直持续到1978年。进一步分析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的内容是很重要的。颂扬华国锋的词句在许多方面更象对死后的周恩来的一些赞颂，而不是象对毛泽东的那种更高规格的歌颂。华国锋被描绘成具有忠诚、无私、胸怀坦荡、谦虚谨慎等等美德，而这几乎全是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讲话中所使用过的颂词。<sup>142</sup>尽管做了这样的宣传，但实际上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在他的同事们中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而且华国锋最紧迫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扩大他的权威以巩固他做为党中央主席的地位。

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往往把毛泽东的愿望同华国锋的地位以及其他新领导人的地位做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由此认为这是合法的。但这种宣传却很难使高层领导者信服。虽然有些领导人把毛泽东的意愿看做是合法性的因素，<sup>143</sup>但更多的领导人，甚至有一些坚决忠于毛泽东的领导人也不能接受



毛泽东晚年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1977年2月，有的政治局委员就强调指出：

我们有……党章也有宪法，它们明确地规定了选举党中央主席的程序……华国锋同志担任这一职务……事先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只能被认为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安排，同时这也是反对……“四人帮”斗争的一个产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能够接受这一点。我们不应过分地强调对华国锋的任命……是建立毛主席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的基础之上的。无论这句话多么吸引人，也至多是反映毛主席个人的意见，不能被看做是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愿望。<sup>144</sup>

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表明华国锋做为领袖的合法性还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其中除了毛泽东的特殊权力以及缺少适当的法定程序这个中心问题之外，还暗含着如此强调毛泽东的批准所反映出的个人崇拜问题。如果象以上所讨论的那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高级干部中已很少有市场，并有不同意见出现，那么对华国锋的小小崇拜在高级干部中也不会发挥很大作用，即使在那些真诚地称赞他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的干部中间也是如此。1981年，当华国锋终于从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时候，高级领导人中对这种个人崇拜的不满，集中地反映在他们对华国锋1976—1978年的行为的批评之中。然而在当初，这个问题看起来还不太明朗，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还很少有人

明确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尖锐意见。<sup>146</sup>的确，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推动了这种个人崇拜。华国锋虽然对树立自己的个人形象有明显的兴趣（并采取与毛泽东一样的方式），但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可靠的论据可以说明，是华国锋本人独自发动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由于意识到把华国锋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有些其他高级领导人也参与了对华国锋的颂扬。无论怎样，从华国锋的角度来看，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并不是为了说服高级干部们承认他的合法地位，而是为了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对于稳定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越多，把华国锋撤换掉而对社会稳定又不构成威胁看起来就越难办到。不过，虽然利用了（或者说是允许利用了）个人崇拜，但华国锋的地位在公众心目中仍然是脆弱的。

从许世友和韦国清的陈述中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高级干部都认为1976年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种情绪导致了抵制毛泽东生前的愿望，以及在毛泽东死后不久就在党的正式会议之外同“四人帮”直接摊牌。“四人帮”倒台以后，对邓小平受迫害一案，只是给他平反，恢复了工作，并没有赋予他做为领袖的地位。然而，广泛的社会舆论则认为，邓当初曾被慎重地安排接替了周恩来的位置（后来甚至接替了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这种安排是合法的。相形之下，华国锋就显得有篡位之嫌。<sup>147</sup>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邓小平的真诚信任从一开始就威胁着华国锋的地位。

在高级领导层内，经过了前10年的目无法纪的激变之后，新的领导班子不仅在全社会而且也在党内重点强调合法性的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以前那种诸如动用公安机关来

处理党内纪律问题的违法行为已被禁止，同时还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类的专门机构。<sup>147</sup>进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弃的党的各项准则得到全面的恢复，其重点是加强党内民主。197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保留少数人意见的原则，并且号召党员们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代表大会还进一步保证党员有批评党的领导人的权利，以及一旦决议做出之后党员有保留意见的权利。代表大会规定所有的决议必须由集体决定，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倾向。<sup>148</sup>这样一来，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初期，尽管还存在着个人崇拜的现象，但对领导人权力的法定一理性限制，也已经开始得到重申。对华国锋的过分宣传，作为稳定大局、寻求支持的一种策略也许可以被接受，但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他们并不打算承认任何形式的权威，因为1966—1976年这10年中的个人权威曾使他们深受其害。

回顾华国锋被誉为“英明领袖”的时期，华国锋显然代表了一些高级干部的利益，而且承认华的地位对于许多其他领导干部来讲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权宜之计。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高级领导层内，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并不是无可争辩的，更不必说华在处理国家大事方面的权威了。其他领导人不仅反对天才的提法，而且由于他们有了毛泽东时代的体验，若是让他们再次向这种权威让步，将会使他们感到厌恶。虽然从全局的利益考虑，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得到了默认，但这种人为的崇拜也同样引起了忧虑。传统观念支持了华国锋也限制了华国锋。在高级领导层中，他得到一定的支持，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许多高级干部认为，在“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去世不久，就立刻清除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这

对毛泽东的声望说来是一种莫大的侮辱。<sup>149</sup>不过，与此同时华国锋也受到这些传统因素的制约，这种观念要求协商一致。华国锋还同样受到要求集体领导这样的法定一理性原则的限制，虽然这个原则还不太完善，当然，华国锋也从这些传统因素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在1977年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华国锋作为经过选举的领袖，这时已没有任何疑问了，而且他也有了一定的作为主席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还不足以做出重大的决策，但至少对于保护他的地位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特别是由于还没有建立起任何明确的撤换党中央主席的程序，任何反对华国锋的行动，虽然从政治上看并不是极为困难的，但却会使合法性原则陷入困境。

总之，各种合法性的原则虽然包含有支持华国锋领袖地位的成分，但也同样存在着相反的因素，削弱了他的地位。然而，对华国锋的地位构成威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邓小平1977年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并重新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邓小平重返政治局，华国锋作为领袖的正式地位很快就由于邓小平以事实上的领袖身份出现而蒙上了阴影。华国锋在高级领导层努力寻求支持以维持他的地位，但他失败了（最后一编将详细分析这一情况）。与此同时，以及在华以后的时期里，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

## 第二节 卓越的邓小平

当邓小平做了必要的自我批评之后（这种自我批评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安抚反对他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当适当地维护毛主席名誉的人），<sup>150</sup>他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被选举掌握了他在周恩来去世后所失去的全部权力。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在新的四个现

代化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了。甚至在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还未停止的时候，根据一些观察家得到的有关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人们看到华国锋对邓小平这位老同事采取了一种谦恭的态度。<sup>151</sup> 后来，当华国锋从主席这一职位上被撤换下来时，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都希望邓小平承担这一最高职务。<sup>152</sup>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曾正确地总结了邓小平自1977年复职以来的实际领导地位：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四位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剑英、小平、先念和陈云同志，尤其是小平同志。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甚至连外国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他们也用另外的方式，称他为“总设计师”，但不管称他为什么，其意思是一样的。<sup>153</sup>

高级领导层接受邓小平作为主要决策人的基础是什么？显然，邓小平的地位依赖于整个领导层内的多数人的联盟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年代里，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开创新时代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专横的领袖，而邓小平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位领袖。对邓小平的这种支持直到现在依然存在，但如果邓小平的政策失败，或者过分地损害了高级领导层的利益，那么这种支持就可能消失。这种广泛的支持一旦形成，就使邓小平在履行其领导责任时，具有合法的权力去处理重大事情、调解争端并指出总的前进方向。由于高层领导人非常希望稳定，以及缺乏正常的更换领导人的调节机

制，使得对邓小平合法性的支持不容易取消。对邓小平合法性的承认，与其说是承认他的权威性的命令，不如说是承认他的地位和作用。早在邓小平复职之前，集体领导的原则就得到了重申，邓小平复职之后又坚决地支持了这一原则，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够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邓小平领导的时期，不仅明显地强调了重大决策应当经过充分讨论才能决定，而且规定如有不同意见“就采取慎重态度，往往暂时不作决定”。<sup>164</su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或是其他领导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发布指示。不管怎样强调集体领导，为了保持这种体制的运转，领导者的决定权还是要行使的。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邓小平拥有很多得到认可的这样的权力。<sup>165</sup>不过，就总的情况来说，邓小平必须以策略的、劝说的方式（或者采取妥协的方法）来取得优势，而不能直接采取命令的方式——这一问题将在最后的总结中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显然，邓小平从其值得尊敬的功绩中取得了政治支持以及合法性的承认——他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巨大的才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这种才能被讽刺性地称为“活的百科全书”<sup>166</sup>）。但这也只能部分地解释邓小平做为领袖而被接受的原因。无论邓小平的声望或实际才能究竟怎样，从韦伯的观点来看，他还不能产生真正的超凡魅力，因为邓小平在以前的革命斗争中还只是一个配角。况且，从法定—理性的角度考虑，虽然邓小平后来担任了特殊角色（例如他成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做为主持全面工作的领袖，他还缺少一个正式的头衔。而且个人崇拜已被大大地限制了。

关键在于传统因素方面的影响。首先，正如早已指出过的那样，邓小平被看做是周恩来的合法继承人。1975年，由

周恩来提议对邓小平的正式任命，显然得到了党和政府中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广泛支持。毛泽东去世后墙上的标语无疑深刻地反映了高级领导层的观点，即认为邓小平在捍卫周恩来的路线方面是一个英雄人物，甚至是“活着的周恩来”。<sup>157</sup>但是，更引人注意的还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虽然毛泽东曾两次罢免邓小平，但邓小平的支持者们却能够指出毛泽东在1973年曾赞成邓小平恢复工作。而且当1980年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起诉时，曾指控“四人帮”在1974年企图阻挠毛主席批准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sup>158</sup>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被称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同志”的那一小批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位幸存者，具有着无可置疑的威信。<sup>159</sup>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地位和资历——这是传统的合法性和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邓小平在毛泽东生前就已取得了极高的地位；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现在，他的这种地位随时可以转变为得到承认的正式的领袖地位。

对邓小平的支持的传统色彩，由于高层领导人赋予邓小平领袖地位的特点而显得更加突出。直到1966年以前，正式的权力与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个人影响一直是重叠在一起的。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们具有革命家的地位和身份，而占据着这个政权的主要位置。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种传统和法定—理性模式的发展。当时，大批素有威望的干部被降职或者是被彻底罢官，许多高级职务由那些原来地位很低的人来接替。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甚至在局势已经恢复之后，仍有许多享有威望的老干部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不过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况且，在打倒了“四人帮”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个高级干部

阶层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更新领导班子。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不能用1976年末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政治利益来解释。这些幸存的政治局成员有理由害怕邓小平复出，而不是欢迎他。<sup>100</sup>与此同时，在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中央委员会中无疑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利益同邓小平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恢复邓小平职务所产生的效果，不过是反映了政治局的政治需要，即政治局想确保从那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老干部们那里得到支持；而中央委员会里的大多数成员对邓小平的复出，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sup>101</sup>那些有影响的老干部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已有很高职务和地位），看做是使中国恢复固有的发展道路的样板。因此，他们对邓小平的支持，既反映了高级领导人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尊重，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传统和历史上的等级观念。

### 第三节 向法定一理性过渡的不确定性

虽然邓小平的杰出作用必须用传统的因素加以解释，但邓本人却非常重视法定一理性原则的完善，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和加强党的稳定性。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在分析毛泽东的随意行为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封建意识以及缺乏法治传统等方面。而且，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套准则，但中国官方对此的正式评价却是：“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sup>102</sup>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极力主张必须把过去过分依赖于个人的情况转变为依赖制度和程序：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163</sup>

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8年，邓小平采取了几个重大的步骤来削弱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那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崇拜。步骤之一，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命题。经过全国性的大讨论，到了年底，对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完全停止了。<sup>164</sup>在以后的4年里，法治的问题一再被重申并且有所加强。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体制同真正的法定一理性体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现行体制所固有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邓小平的努力遇到了阻力。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对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看出来。这三个主要

问题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国新宪法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某些新规定。

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对毛泽东的不同看法既反映了对毛泽东晚年有关政策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每个评价者的不同的政治生涯。无论对毛泽东采取无限忠于是的态度还是采取怨恨否定的态度都与每个人从革命斗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有关。直到1981年6月，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才最终产生。这个官方评价积极肯定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sup>165</sup>这样的评价既包含有多方面平衡的因素，也反映了根本的合法性的需要。在1981年，社会公众已不再对毛泽东表示特别的崇敬，<sup>166</sup>但大多数高级干部仍以怀念毛泽东为荣。

实际上，毛泽东在其个人专断的年代里所形成的权威，在他死后仍然起到了某种继续维护他的名誉的作用，尽管这种权威被攻击为封建的个人迷信。此外，传统的因素对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谭震林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指出，任何对毛泽东的过分攻击都是极不严肃的……也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sup>167</sup>羞辱前辈，尤其是羞辱开国之君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念在中国领导人的多次讲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反复强调，对待毛主席决不采取苏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的做法。许世友在三中全会上表明了同样的看法：〔我将第一个起来反对效仿〕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遗体从红场迁走，拿去喂狗的做法，也决不同意象赫鲁晓夫那样去

污骂一个死者，或者是散布对一个死者的个人仇恨……<sup>168</sup>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绝大多数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心目中，毛泽东仍然代表着他们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和国家的形象。例如黄克诚，这位因在庐山会议上支持了彭德怀而受到毛泽东不公正待遇的老干部曾讲了这样一个有说服力观点：多年来，毛主席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他的丑化和歪曲，最终只能导致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丑化和歪曲……<sup>169</sup>尽管中国现任的领导人试图尽量缩小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并且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这些领导人决不会将毛泽东同中国革命的历史割裂开来。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但他们还是肯定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sup>170</sup>。这种心照不宣的看法是他们接受毛泽东权威的基础，也是毛泽东巩固其权威的基础。由于1949年的革命胜利，使得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合法的领袖。

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决议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对华国锋的接班安排上。甚至在这个决议还在起草的过程中，就有人在1980年9月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这种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封建式的。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华国锋在履行领袖职责中存在的不足，并且批评他刚上任时进行的个人崇拜宣传。到了11月，政治局对华国锋的压力增加了，华国锋因此提出了辞呈，并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职务。虽然邓小平当时几乎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但他还是主动拒绝了这一职务，并提名他的长期下属胡耀邦担任这一职务。毫无疑问，邓小平选择胡耀邦是为了让胡继承他的事业。这种提议显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几

天以后“所有的人最后都同意了”<sup>171</sup>（党中央主席这一职位虽然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取消了，但胡耀邦作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保持其最高领导职位）。

虽然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封建方式以及华国锋搞的个人崇拜受到了批评，但要撤换华国锋并让胡耀邦来接替他，从法定—理性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要在有实权的中央政治局内部（而不是中央委员会）贯彻撤换华国锋职务的决定，从程序上讲那些失宠的政治局成员也应该参与意见。<sup>172</sup>而且由于强调法定—理性原则，在没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前，从名义上讲，华国锋还仍然是党中央主席，当然华国锋这时已没有什么实权了。<sup>173</sup>1981年6月，中央委员会终于做出决定，正式解除了华国锋的主席职务，但并没有把他驱逐出中央机构。

邓小平是出于要选择—一个忠实的接班人以便能够将他的路线贯彻到底这一目的而力主胡耀邦当选的。但高级领导层显然是很勉强地接受了胡耀邦，这不仅表明胡耀邦的政治力量还很薄弱，而且还引出了胡的合法性的问题。据报道，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胡耀邦当选所采取的消极态度，不仅仅是因为对华国锋的同情，他们对胡耀邦的主张也有疑问。还有一些人暗自将胡耀邦的功绩同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所立下的功绩相比较，并且担心邓小平在党内形成他自己的派系。<sup>174</sup>邓小平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赞成他的提议。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的当选一方面有点象刘少奇，另一方面又有点象华国锋。就刘少奇的情况而言，他既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也是高级领导层一致拥护并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接班人。考察一下军队高级干部对选举新党中央主席所抱的态

度，很能启发人们的思路。据报道，他们宁愿拥护邓小平做党中央主席是由于邓的资历深，而他们当初同意华国锋当主席则是由于华同毛泽东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sup>175</sup>但是，如果按传统的观念行事将引起不安定的后果，那么他们终究还是要支持邓小平的选择。胡耀邦的当选就是对一个领袖人物的特殊让步，这位领袖人物具有公认的地位并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做出努力。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1982年，这些努力产生了初步成果，出现了一个新的党章和一部新的宪法。不过，从法定一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成果却是模棱两可的。只要考察一下其中一些重要条款的实施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重要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权力过分集中；结束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建立监察和制约机构。

当然，强调集体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始终一贯的执行。新的法律文件虽然再次强调了集体领导的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条款上并没有制定充分的保障措施。更为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一些人事安排也没有完全体现这一原则。

自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着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已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sup>176</sup>，并且开始劝说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实行的情况与当初的提议比起来，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例如，邓小平

在1980年8月曾宣称：“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sup>177</sup>然而在新党章尚未公布之时，就已有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那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表了一番真实的讲话：

在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核心中，必须有一批经验丰富、见识深广、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局势、并由于他们的卓越贡献而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的老同志，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成熟和稳定，保证老同志对于中青年同志的“传帮带”和新老干部的顺利交接，也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现实情况，是同我们党建党初期根本不同的。这样的众望所归的熟练的领导人的产生，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中，不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次党章修改过程中，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不对领导人的任期作严格的限制，对各人的工作任期因人而异……<sup>178</sup>

由于结束领导人的任期要根据资历、威信以及信仰来决定，这就表明党的命运胜过了任何程序上的考虑。

同样，邓小平要求建立检查和制约机制的设想也未能完全实现。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国务院也要考虑设立相应的机构。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sup>179</sup>两年以后，邓小平提到的这几个机构在新党章中被肯定下来，但其作用与邓小平的初衷已有所不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被直接置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而中央顾问委员会则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并且也要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提出建议，接受咨询”等等，而不是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发挥某种指导和监督的作用。<sup>180</sup>新建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法定一理性作用远远没有超过其传统的政治作用。随着大批年迈的高级领导干部退休，一种超过法定权限的非正式的影响开始出现了。象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干部，虽然放弃了政治局委员甚至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进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个革命家的威望。在这种新老交替的初始阶段，他们幕后的声音远比他们在正式的机构（中顾委）办公桌上做出的决定更有影响。

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一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象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么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最重要的是，象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况且，曾经饱受这位领袖晚年个人专断之苦的现任领导核心正在做出努力以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发生。这种情况和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某些相似之处，随着赫鲁晓夫具有某些个人色彩的领导结束之后，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之后，苏联也开始强调集体领导，即在高级领导层内进行广泛的协商。<sup>181</sup>就象赫鲁晓夫的情况一样，邓小平的情况表明，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所要考虑的问题仍然

是要做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对领袖的这些限制一方面来自于政治上的精心考虑，另一方面来自于法定—理性的条文和特殊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在行动上也受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传统有关联的那些原则的限制。与此同时，他的领导地位也由于这些因素而具备了合法性。在当今的中国，高级领导层内的这种领袖的合法性已经明显地从以超凡魅力型的基础转向以法定—理性型和传统型相结合的一种混合型为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传统给这一基础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随着这些开创革命的一代人相继去世，这种混合型将不可避免的再来一次变革。

## 注 释

1. 马克斯·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塔尔科特·帕森斯为该书作序（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年），第324—325页。
2. 同上，第124页。
3. 转引自约翰逊，《权威的性质变化和轨迹》，第44页。
4. 见里格比写的序言，第7—8页。
5. 同上，第3页。
6. 这一术语引自奥克森伯格，《政治领袖》，第98页。
7. 见《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载《遭遇》，1976年12月号。
8. 见《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24—325、327、341、360页。
9. 这并不排斥暂时地利用特殊的社会力量。例如1978年的“民主墙”事件，就是邓小平争取公众对他的支持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主要是得到了高级领导层的基本承认。
10. 《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82页。
11. 参见后文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讨论。
12. 《社会和经济组织》，第68、363、382页。



13. 参见里格比：《一种概念方式》，第15—16页。
14. 对这一问题具有说服力的阐述见约翰逊所著《权威的性质变化和轨迹》。
15. 《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58页。
16. 同上，第65—67、359页。
17. 格雷姆·吉尔的手稿《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修养及领导特征》（未发表），讨论了列宁喜欢打破常规的习惯。
18. 引自贝特伦·D·沃尔弗：《三个开创革命的人：传记与历史》，第411页。
19. 参见吉尔手稿中的讨论。
20. 见亚当·B·尤莱姆：《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主义胜利的思想政治史》，第470页。
21. 毛泽东确立其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的时间尚不精确，官方的说法是在1935年1月。但根据实际情况看，这个时间为时尚早。因为遵义会议之后，充其量只能说，毛泽东与张闻天共同分享领导权。较有说服力的日期应该是1938年下半年，这时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战胜了王明。到了1943年，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优势才彻底确立起来。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颂扬毛的理论贡献，并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见雷蒙·F·威里：《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中国理论研究，193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8章。
22. 见《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59页。
23. 见《毛泽东：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第23—24、34、35页。
24. 见《白宫岁月》，第1058页。
25. 见《符拉弟米洛夫日记》，第58—59、68页；以及派伊：《毛泽东》，第55—57、235—236页。
26. 见1978年12月11日《纽约时报》。
27. 见《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60页。
28. 有关超凡魅力的作用的代表着，见马丁·斯宾塞所著《什么是超凡魅力》，载《不列颠社会学杂志》，1973年9月。

29. 见前文，第28、37页（英文版，下同——译者注）。
30. 早在1942—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就曾使用过这类的术语；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企鹅出版社，1967年），第233页。
31. 有关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情况见里格比：《一种概念方式》，第15—16页，有关华国锋的情况见后文第79页。
32. 有关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作用的讨论见格雷姆·吉尔所写《个人权力与集体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中个人的合法性》一文，载《共产党国家中的合法性》一书。
33. 引自1939年12月21日《真理报》。
34. 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4年），第193页。
35.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05页。
36. 见前文第26，27页及后文第67—68、69、80—81页。
37. 不过，在讨论中共高层领导圈内个人崇拜的合法性作用的时候，还应考虑到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候补委员的情况。由于他们长期受到关于毛泽东的“特殊才能”的宣传的影响，从而认定毛泽东是一个罕见的人物，由此逐渐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情。
38. 参见里格比：《一种概念方式》，第18页；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5、50、185页。
39. 见吉尔：《个人的统治》，第99—100页。
40. 斯大林的情况是一个例外，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斯大林获真正的超凡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模式——一项创造性的历史成就。大多数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基本上是踩着斯大林的脚印走（尽管也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这样一来，这些领导人也就缺少斯大林那种处理危急的创新意识。况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完成既定的目标，将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和理性而不是超凡魅力。
41. 同样，发展经济的成功业绩将会得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支持

反过来又提高了取得这样成就的领袖人物的合法性。

42.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的讲演中曾说过类似的话，参见：《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1944》（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1页。
  43. 参见王光五：《中国人》，载威尔逊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289页。
  44. 参见1978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
  45. 参见《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28页。
  46. 同上，第329、392页。
  47. 韦伯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含糊的。
  48. 参见里格比：《一种概念方式》，第11—13页。
  49. 参见中共不同的党章中有关组织原则和中央机构部分的阐述：  
《刘少奇著作选，1945—1957》（香港：联合研究院，1969年），第103—108页；《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卷，第151—157页；《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69年），第119—123页；《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年），第67—71页；《中国季刊》第72期（1977年），第922—923页；有关取消党中央主席职位的决定，参见《北京周报》第39期（1982年），第17页。
- 中国1975和1978年的宪法还规定中共中央主席拥有武装力量总司令那样重大的权力，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年），第22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50. 参见廖盖隆在党内的报告：《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1980年10月25日），第2部分，载《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
  51. 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进一步分析，见泰韦斯：《政治与清洗》。
  52. 参见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的有关论述，载《毛泽东的中国》

- 第241页；《中国法律和政府》（1972年），第39页；《刘少奇著作选，1945—1957》，第57—58页。
53. 参见《毛泽东的中国》，第236页。
54. 参见《中国法律和政府》（1972年），第45页。
55. 参见尤莱坞；《布尔什维克》，第360、465页。
56. 见前文第26页（再次强调）。
57. 有关苏联的情况参见格雷姆·吉尔所写《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对苏联领导体制的影响》载《大不列颠政治科学杂志》，1980年4月号，第176—179页。
58. 当然，华国锋的问题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他在去职时并不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59. 《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41页。
60. 同上，第60—61、328、341—342页。
61. 同上，第360页。
62. 虽然这种行为常被说成是“正义的反抗”，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责任。参见王光伍，《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公正与职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63. 参见王光伍所写《关于孔子效忠的论述》，载阿瑟·F·赖特和丹尼斯·特威切特所编《孔子的人格》（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64. 参见哈洛德·L·凯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乾隆时代的想象与现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2章。
65. 有关对帝制权威的限制问题在弗兰克林·W·霍恩著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一书中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华盛顿：公众事业出版社，1965年），第3章。
66. 参见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版，哈佛大学出版社），第57页。
67. 引自霍恩：《中国的政治传统》，第65页。
68. 引自《时代背景》第851期，第30页。
69. 参见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70页，以及《北京周报》（1981

年)，第37期，第18页。

70. 参见奥克森伯格：《政治领袖》，第99页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所写《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周期》，载《中国季刊》，第87期（1981年），第433页。
71. 参见《北京周报》，1980年第14期，第2, 11—20页。
72.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所写《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对“四人帮”倒台的理论分析》，载《世界政治》，1978年10月号，第29页。
73. 下面一段大部分引自迈克尔·亚胡达的观点。
74. 有关农民不满的报道参见切斯特·程：《中国红军的方针》，第13, 190—191页。
75. 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参见《北京周报》（1976年）第15期，第4—7页。
76. 参见《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7—258页。
77. 见前文第32—34页。
78. 见泰韦斯：《政治与清洗》，第6—7章。
79. 参见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公报中的说法，引自《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85页。
80. 这些言论收集在吉尔所编著的《个人的统治》一书第99—100页。
81. 例如刘少奇1951年在北京发表的讲话中就有这样的颂词，参见《刘少奇著作选，1945—1957》，第253页。
82. 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100—102页（英文版，下同——译者注）。
83. “法定一理性”原则开始受到破坏是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这时政治争论（和组织问题一起）卷入在省一级开展的清洗运动之中，毛泽东停止参加政治局例会，见泰韦斯：《政治与清洗》，第8章，以及廖盖隆在党内的报告，第2部分。而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则是毛泽东破坏党的原则最明显的例子。
84. 最为重要的例外是薄一波因为税收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而失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第二年又恢复了工作，还有邓子恢，因为农业合作化问题导致了他在1955年下半年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参见泰韦斯：

- 《政治与清洗》，第114—115、344页；以及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18—19页。
85. 在此之前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清洗是1954—1955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但这与政策争论没有必然的联系。参见泰韦斯：《政治与清洗》，第5章。
86. 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86—90、241—249页。
87. 对庐山会议进展情况的详细分析见泰韦斯：《政治与清洗》，第9章。
88. 参见《时代背景》第851期，第13页；以及《彭德怀案件》，第36页。
89. 参见《毛泽东思想杂集》，载《联合出版研究服务》第61269期，第176、180—181页。
90. 引自《中国省级广播电台新闻》，第223期，第9页。
91. 《时代背景》，第851期，第19页。
92. 参见汤姆·费希尔：《吴晗与海瑞罢官》，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第7期（1982年）；也见泰韦斯：《政治与清洗》，第476—479页。
93.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62、69页。
94. 参见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载《问题与研究》，1980年5月号，第77页。
95. 参见《毛泽东思想杂集》，第359页；以及前文第26页。
96. 参见《北京周报》，第9期（1981年），第14页。
97. 《毛泽东论文：选集和书目提要》，第98、99页。
98. 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153—155页。
99. 在这里和后文我用了较为熟悉的术语“遗传的超凡魅力”而更为准确的术语是“指定的超凡魅力”，参见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第365页。
100. 不管怎样，毛泽东对恢复国民经济的贡献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是得

到承认的，参见廖盖隆在党内的报告《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载《党史探索》一书。此外，这个报告也表明了民族主义在紧要关头支持毛泽东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中苏关系破裂时获得提高。

101. 参见爱德华·E·赖斯：《毛泽东的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251—254页。
102. 参见《问题与研究》1972年2月，第106页。
103. 与此相同的见解见奥克森伯格：《政治领袖》，第99页。
104. 见王光伍：《中国人》，第294—295页。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些意味深长的反传统的事例，例如青年学生当众使政府官员出丑。
105. 见《时代背景》第894期中提到的一本小册子：《毛主席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同志》。
106.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13页。
107.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有很多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清洗，而且军队在国防方面的作用也因维持国内秩序而受到削弱。
108. 有关刘少奇的情况见迪特默：《刘少奇》，第94，114—117页。
109. 参见《北京周报》第37期（1981年），第21页；廖盖隆在党内做的报告《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第1部分；迪特默：《刘少奇》，第153—155页。迪特默认为，毛泽东也曾做过一些让步以纠正运动过火的情况，但对主要人物的斗争没有停止，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状况没有因此而改变。
110.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毅曾在几个场合说过毛泽东曾经以很大的肚量处理对立面，参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35期，第12、14页。这种信任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在运动期间，毛泽东的确干预过对一些老同志的错误做法。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80年），第19页。
111. 参见《许世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78年12月），载《问题与研究》，198

- 年5月号，第79页。
112. 这种评价不是简单地根据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他总是挥舞着语录本高喊万岁），而且也参照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行为。
113. 见1977年5月13日《纽约时报》。
114. 虽然邓小平在1976年因为把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与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等同起来而遭到攻击，但这些指示的存在本身也表明了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排斥务实派的一些主张。见《中国新闻分析》，第1032期（1976年），第6页。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曾赞成过涉及到国家重要岗位的一些人事安排。
115.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8页；《北京周报》，第14期（1975年）第7—8页，第19期（1976年），第16页。
116. 见肯尼思·利伯索尔所写《1975年的中国：国内政治背景》，载《共产主义问题》，1975年5—6月号，第6—9页。
117. 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88—1089页。
118.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他的观点常被外国首脑看成是他和毛的一致意见。参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72页。
119. 见廖盖隆在党内的报告《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载《党史探索》，第337—338页；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评价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北京周报》（1981年）第27期，第22—23页。决议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问题非常慎重，在承认两人有所不同的同时，也指出批林批孔时对周恩来的攻击是江青等人搞的阴谋，而毛泽东曾批评过他们。
120. 据说，毛泽东1976年在谈到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时，曾说过反周民必反。
121. 参见福克斯·巴特费尔德的文章，载1976年11月18日以及1977年1月8日《纽约时报》。



122. 新华社北京1977年1月8日消息,载1977年1月10日《人民日报》;也见罗瑞卿谈周恩来保护贺龙的情况,载《北京周报》,1978年第11期,第30页。
123. 实际上,在周恩来病重的最后阶段,即1975年末,这种攻击就已开始了。见《中国新闻分析》,第1028期(1976年),第2—7页。
124. 参见《北京周报》(1976年),第23期,第16页。
125. 参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73—374页、391—392页;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3页。
126. 当然,也有可能是毛泽东这时并不急于让邓小平免职。参见《问题与研究》,1977年8月号,第66页。
127. 参见1976年11月8日《纽约时报》,第18页。
128. 参见《中国新闻分析》,第1039期(1976年),第1—2页;第1054期(1976年),第2页。
129. 参见《张平化对文化战线干部的讲话》(1978年7月23日),载《问题与研究》,1978年12月号,第93—94页。
130. 见艾伦·P·L·刘:《中国大陆的政治衰退:信仰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82年8月号。
131.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2. 也许在高层领导人中,陈永贵就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位农民干部于197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工作。参见陈永贵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载《问题与研究》,1980年5月号,第82—84页。
133. 参见《北京周报》,第15期(1976年),第3页。
134. 华国锋后来对他在4月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早些时候被任命为代总理做出的解释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参见《北京周报》第42期(1979年),第9页。这同后来攻击华国锋的提升具有封建色彩是相一致的。
135. 据香港的一些报道,“四人帮”曾经说过,毛泽东临终前有让江

青当党中央主席，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的意向。

136. 参见1977年1月8日《纽约时报》；《问题与研究》，1981年7月，第28页；以及肯尼思·利伯索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政策》，载《共产主义问题》，1978年5—6月号，第8页。
137. 例如华国锋早在50年代就大力推行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参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文化大革命前华国锋在湖南的经历，1949—1966》，载《中国季刊》，第69期（1977年），第12—16页；以及《问题与研究》1976年3月号，第81页。
138. 实际上，在毛泽东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高层领导人接近毛泽东已经受到严格限制。尚不清楚毛泽东通过什么渠道转达了他对华国锋的信任。有报道说，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那句话：“你办事，我放心”，也是在毛泽东去世后，由华国锋自己说出来的。参见《问题与研究》，1978年6月号，第35页。
139. 参见《北京周报》，第42期（1976年），第3—4页。
140. 参见《北京周报》，第45期（1976年），第5—6页。
141. 参见《北京周报》，第35期（1977年），第11页，第36期（1977年），第24页。
142. 参见1976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时候，华曾说他的资历不够，马列主义水平也很低，但毛泽东一再说这正是他选择华国锋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人有自知之明，不吹牛……这样就能不断进步”。参见1976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143. 这些人主要是指以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他们认为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并且还因此而反对邓小平复出。参见《汪东兴的自我批评》，载《问题与研究》，1980年10月号，第90—97页。
144. 参见《关于当前一些问题的几点建议》，第77—78页；虽然这个文件以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的名义签署，但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两个机关的领导人（均是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145. 当华国锋的主席职务被撤换之后，官方的宣传说，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批评过“两个凡是”的观点，但我在1978年以前一直没有发现邓小平或是其他领导人有直接反对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的言论。
146. 虽然我还没有发现在高层领导中有这种看法的直接证据，但1977年1月在北京一些墙上出现的标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这或许也反映了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看法。参见《中国法律和政府》，1977年春季号，第69—72页。
147. 见利伯索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政策》，载《共产主义问题》，1978年5—6月号，第4页；亦参见《北京周报》，第35期（1977年），第12页。
148. 参见《北京周报》，第35期（1977年），第55页；第36期（1977年），第27、33页。
149. 有关一些高层领导人关注毛泽东名誉的情况参见注释143。
150. 参见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载《问题与研究》，第74—78页。这篇讲话还附有早些时候写给中央的一封承认错误的信。
151. 参见1978年3月6日《洛杉矶时报》，第3页；1978年9月17日，第11页；以及1978年3月9日《纽约时报》。
152. 参见《胡耀邦同志在全体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载《问题与研究》，1981年12月号，第75页。
153. 当然，当初谁也不可能知道，邓小平一返回政治局，整个形势就变了样。作为政治家，他的影响在明显地扩大，而且无论是外国观察家还是中国人提供的材料都说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出色地履行了一个领袖的职责。而三中全会现在被认为是纠正华国锋的“左”倾错误、实行正确方针的一个分水岭。参见1978年6月1日《纽约时报》，第8页；利伯索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政策》，载《共产主义问题》，1978年5月号，第10页。
154. 参见王任重：《统一思想，认真整顿党风》中关于中央书记处

- 作用的阐述，载《红旗》，1982年第5期，第4页；以及迈克尔·阿克森伯格：《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81年的总结》，载《中国季刊》，第90期（1982年），第175页。
155. 例如1981年7月邓小平要求对作家采取强硬路线，结果很快就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还采取了其它方式）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参见1981年10月1日《争鸣》，1981年10月28日《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1页。
156. 参见《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选辑》（1967年4月），载《中国大陆杂志选》，第651期，第5页。
157. 引自1977年1月北京街头墙上的标语，参见《中国法律和政府》，1977年春季号，第69—72页；以及1978年11月出现的标语，参见英国广播电台：《世界广播摘要：远东部分》，1978年11月22日。
158. 参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香港大公报，1980年11月），第9—10页。
159. 这一小批幸存的领导人包括陈云和彭真，其中陈云从1962年起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彭真自“文化大革命”起再也没有露面，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
160. 参见后文关于1973年政治局选举的叙述，到1976年末，这批人中只有11人幸存或未遭清洗，这11人中7人（包括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德生和陈永贵）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们有理由担心邓小平的复出。其中有几人还在汪东兴的带领下积极反对邓小平。
161. 1973年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大约40%的成员是“群众代表”，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参见托马斯·W·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载《亚洲观察》，1974年1月，第3页。
162.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63.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载《问题与研究》，1981年3月号，第93—94页。这篇讲话还

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

164. 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情况，参见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以来的中国——方针与认识论》，载《中国季刊》，第80期（1979年）。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威的限制情况，参见《北京周报》，第52期（1978年），第16页；以及《中国新闻分析》，第1146期（1979年），第6页，及第1153期（1979年），第3页。
165. 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采取的这种积极的正面的结论，是中央高层领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事先已确定好的。
166. 例如，1982年2月《争鸣》的一篇评论说：“群众……已从个人迷信中清醒过来……。”
167. 参见谭震林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载《问题与研究》，1980年5月号，第80—81页。
168. 参见许世友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169. 参见《北京周报》，第17期（1981年），第22页。
170. 参见胡耀邦1981年7月1日的讲话，载《北京周报》，第28期（1981年），第12页。
171. 参见1981年2月1日《争鸣》和1981年6月26日《明报》的报道。
172. 据说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和另一个候补委员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参见1981年2月1日出版的《争鸣》。
173. 见《悉尼先驱晨报》1981年2月14日的报道。
174. 参见1981年5月16日《展望》（香港）和1981年7月6日《争鸣》，以及1981年12月1日《争鸣》。一些干部在华国锋被迫辞职时，私下里对邓小平抱怨的消息，是以前驻在北京的一些人提供的。
175. 参见1981年8月1日《争鸣》。
176. 参见关于国务院改组的报告，载《北京周报》，1982年第11期，

第5—6页。

- 177.引自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题目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178.见《北京周报》，1982年第39期，第29页；以及1982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 179.引自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并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1975—1982）。
- 180.参见《北京周报》，1982年第39期，第17页。
- 181.见杰里·F·霍夫；《勃列日涅夫时代》，载《共产主义问题》，1976年3—6月号，第3—6、13页。

### 第三编

## 毛泽东及毛以后的正统原则 和谨慎原则

---

本编旨在分析毛泽东及其以后中共政治局领导人的政治策略，<sup>1</sup>探讨毛当政的几个不同时期（既包括高层斗争相对较少的“文化大革命”前几年，也包括了1966—1976动乱的10年）中，高层领导人维护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行为方式。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政治常常就象一场生死搏斗。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就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除了几项重大改革和一些激进的政策外，政治基本上是保守的。这些改革是为了保住毛的地位和影响。当时，地位和影响迅速上升的机会极少。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却正好相反，地位和影响迅速上升的机会之门打开了，致使许多人为了升官而不择手段，大批高级领导人最初只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设法活下来，然后才能阻止“文化大革命”中戏剧性上升的人的统治。毛以后这段时期政治上变得更为谨慎，表现在为维护原有地位和夺回1966年以后失去的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清算上。政策的交替和要解决1966—1976年间的积怨，必然会产生一

个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更不稳定的局面。但是，由于对邓小平作为事实上领导人的广泛支持，使得中共上层避免了一场千钧一发的争斗。

为了考察中共许多领导人在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以下分析集中在“原则”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统方面，另一个是谨慎方面。正统原则，包括前面在清理的权威范畴下讨论的领导原则，都是官方规定的指导方针，它包括应如何指导高层政治活动以及什么活动要受到限制等。严格说来，这些原则自4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动，甚至在1966—1976年的党章里也一再得到重申。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否定了这些准则。另外，1969和197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内容同以前党章所重申的原则并不一致。毛去世后，为恢复党的一贯原则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表明了高层领导有力地执行了这些原则。毛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曾实际上取消了这些原则，但他的继承者们又很快接受了这些原则，并重新创造了一个为政治清算提供基础的环境。<sup>2</sup>

谨慎原则——这是一种单凭经验去做但有可能获得成功的行为规则。任何政治体制中的主要参加者的理解都是建立在经验和实践基础上的。长期以来，高级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在学习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这个原则植根于以下几个方面：即党组织的安排（中国的情况和苏联十分相似）、高层领导的特殊传统以及盛行的政治文化。然而，就已经建立的意识形态来说，谨慎原则比正统原则更容易受社会力量、意外事件以及统治者内部新的权力结构的影响而产生变化。<sup>3</sup>就1949年以后的中国来说，正统原则的命运总是一波三折。谨慎原则在“文化大革命”



的紧要关头和毛以后的过渡时期里，经受了突然的和剧烈的变化。不过，毛以后所恢复的不仅是正统原则，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政治格局中更为一般性的重要特征，以及在1966—1976年间各个政治派别所努力运用的原来政治策略的变化形式。这种恢复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中，公认的谨慎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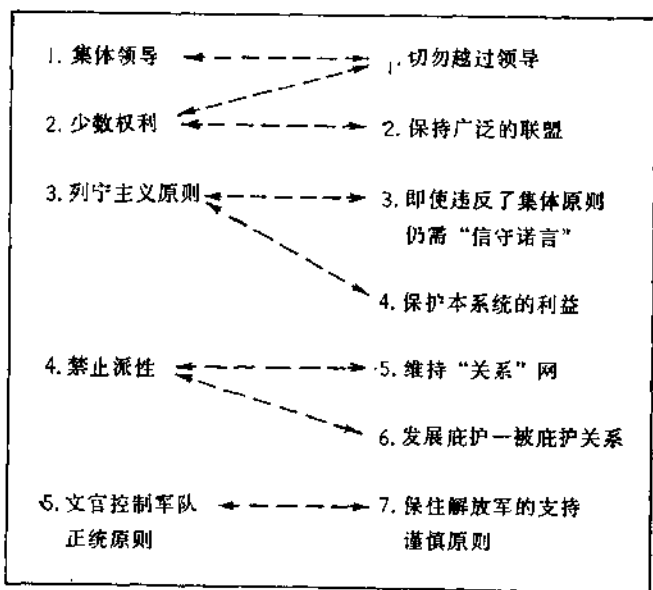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正统原则和谨慎的政治行为

除了前面谈到的集体领导和少数人的权利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行为的正统原则还包括几条相当重要的原则。<sup>4</sup>最基本的一条是列宁主义原则，它要求党员严格做到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是禁止搞“派性”，即少数人抱在一起，不经过正当途径，在党的领导层内以损害其他人利益为前提，为自己的小圈子谋求权力或好处。最后，所有共产党都宣称的基本的正统原则是：军队在组织上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sup>5</sup>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面决不允许枪指挥党。”<sup>6</sup>

根据这些原则，1949年以后，各项谨慎原则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一般来说，这些原则是与政治上成功的要求和作为整体的列宁主义体制一致的。实际上，它和所有的政治体制都一致。T·H·里格比认为要注意以下三种要求：<sup>7</sup>第一，高级政治家必须是公认的具有“信守诺言”的能力，并能运用这种能力去影响自己的命运，不论他们是否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成员、统治集团的高级官员或选举伙伴（指非马列主义国家）。实际上，要“信守”的“诺言”可能有许多。在中国，它们确实包括处理难题、提供正确的政策咨询和有效地管理大机关等方面。第二个要求是建立一个关系网，策略地安置那些认为他们的利益和政治领袖一致的积极分子，并且在发生冲突或出现危急情况时支持他（或她）。最后，里格比的第三个要求强调要有既能和政治局内的官

员，又能和自己的主要机关之外的官员结盟的能力。这里，建立在妥协、共享或者互补目的之上的政策联盟起的作用尤其重要。

考虑到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这些总原则必须是相当精炼的。此外，由于谨慎原则煞费苦心，它们和党的正统原则之间的对立很快就显现出来。下图提纲挈领地展示了对立的来源。



注：箭头线表示对立的路线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领导人最重要的谨慎原则是要保持信心。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毛活着的时候存在，在毛以后的邓小平时期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如前所述，<sup>9</sup>某个

领导人的统治或者杰出作用很显然和集体领导原则相抵触。同样，坚持己见而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在政治上是很冒险的行动。行使批评已被通过的政策的权利，不仅与在理论上必须坚持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实践上必须贯彻这一路线的要求相抵触，而且要冒与领导人和（或者）政治局相对立的危险。一个高级领导人不能永远是少数派，最起码在某些政策观点上能形成一个多数派联盟。

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是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但它和谨慎对待重要政治问题的要求并不一致。当领导成员面临在其职责范围内须“信守诺言”但又缺乏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及受到政策限制的压力时，要么屈从已通过的决定，要么断然违反之。<sup>9</sup>再者，政府的各项政策往往是一般原则，这使得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很大的自行处理权，同样这也使他们容易挨批。要是他们调整了政策，但又没能作出成绩，或者是他们的做法招来那些执行原政策的人不满的话，他们的处境会更加糟糕。这种对立还是由于高层政治家保护“他们”机关或系统的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共产主义政体中，政治局成员通常是一个系统的负责人。出于共同的利益，在这个系统里工作的官员们就为他们在政治局的人提供有力支持。过分热衷于追求本系统的利益，不仅违反了禁止藏匿国家短缺物资的特别禁令，而且也违反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必须坚决服从体现全党路线更大利益的纪律。因此，谨慎原则也有助于限制肮脏的官僚私欲的膨胀。一个高层政治家往往被认为是他那个系统的有力的保护人。在决定仕途前程方面，领袖、整个政治局和上级的提携，比机关下属的支持更为重要。<sup>10</sup>

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建立在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之上的政党和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共产党本身历史派生出来的东西

之间的联系。以前，上下级关系牢牢地连接着各个系统的统治集团。这种关系在官僚主义政治历程中得到了发展。一个政治局委员发展这种关系的有效方法，就是提拔老部下到重要部门担任关键职务。在苏联，这一直是发展个人追随者的手段，在中国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sup>11</sup>

最后，坚持党指挥枪的正统原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为保护支持者的需要，或者至少容忍军队的这种作用，也和上述正统原则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国家的文职政府，在国家有大量军队、敌对的国际环境和政令不通的情况下，都必须努力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的特点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键的政治决策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不象苏联那样，军队在沙皇军官团之外创建，很多年里一直把沙皇军官作为怀疑对象。<sup>12</sup>以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为标志的长期武装斗争，把军队置于革命的中心。这样，1949年以来，现任和退役的军队领导人作为政治局和其他党的关键部门的象征也就很自然了。<sup>13</sup>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主要是与军队领导人在整个革命领导层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情况相联系的，而与它作为高压统治的专门工具关系并不大（尽管这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是一个重要因素）。党指挥枪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接受政治局关于军事和其他政治事务的决定。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的军队领导人，由于他们的革命资历使得他们通常在更大范围的政策问题上有发言权。这些并不必然导致削弱党指挥枪的基础，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只在1967—1971年间存在过真正的威胁——一直是谨慎的政治家不容忽视的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之间的对立，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就象开始时谈到的那样，<sup>14</sup>最根本的是正统原则的相对软弱，尤其在毛不顾集体领导原则而起支配作用的时期更是如此。这个缺陷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人治比法治更重要的思想主张，也反映了中国对统治者个人素质的重视。其次，作为终身革命家和正统的约束相比，中共领导人一贯在保护革命成果上花更大的功夫。这不仅是象刘少奇那样的“组织家”的明确主张，<sup>15</sup>而且是毛以后的领导人的主张，尽管后者对恢复组织上的传统充满担心。<sup>16</sup>

权力和意见分歧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原则。除了不能建立一个确实有约束力的机构来解决领导层的分歧之外，整个正统原则系统所依据的是一个一元化政党的神话。对这些原则看法一致的程度，不会一直象40年代一度出现的大联合那样深。自从毛主席和他的同伴紧密团结，执行“正确的”政策以后，集体领导和毛的权威也就一致起来了。由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尽管对某些局部政策有看法，但仍然忠于整个“路线”，所以，他们的意见受到宽容的对待。不能严格地执行党的方针，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作作风”上的缺点造成的，而“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可以通过整风来克服。相反，派性行为则被认为是一种背叛，而不是反映体制上的问题。因此，这些正而又正的正统原则不仅是模棱两可、政治上十分脆弱的原则，而且还尤其不适应激烈斗争的时代。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能过分相信这些原则，而对谨慎原则则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

尽管如此，基本事实仍然是正统原则越强硬——也就是说对它们的实施越有力——谨慎的指导方针愈加不能被忽视

（甚至要更依赖于它）。如果能确定哪些行为模式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那么政治家们就能有信心地做出战略或战术上的选择。但当正统原则只得到象征性的遵循，或者干脆没有得到遵循时，谨慎行事的依据也相应地变得更加不确定。当我们考察了主要领导人在1949年以来的不同时期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的种种努力之后，对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之间的关系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稳定的上层政治

(1949—1965)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里，除了50年代后期开始有较严重的问题外，是一个高层领导政治相当稳定的时期。在第二编中已经谈到，<sup>17</sup>近年来正统原则渐渐受到破坏，而与此相反的不确定因素也意味着谨慎原则不再象过去那样为政治行动提供可靠的指导。1949—1965年，毛手下的22个政治局委员，只有两个被公开罢黜，一个是高岗（1954），一个是彭德怀（1959）。这个事实表明高层政治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稳定的。<sup>18</sup>尽管这一时期的最后七八年里出了问题，但仍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在提供一般性的可预见政治环境方面已深得人心。

政治的稳定及其可预见性，主要归功于毛的政治风格（这是一种和斯大林形成鲜明对比的风格）。“文化大革命”以前，毛基本上没有斯大林那种对同事的病态疑心。<sup>19</sup>与其说毛播下了互不信任和试图分而治之的种籽，不如说是创造了一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们基本上可以集体地公开地研讨问题。在毛之下，权力确实被分散了，但这种分散不是采取让政治局委员互相攻击这一手段来达到的。相反，当时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以不同形式既把毛当作唯一的崇拜偶像以支持毛的权力，同时又鼓励最高层内的合作关系。

毛对某一剧烈政治运动的赞许，又由他选定的最亲密的同伴加以鼓吹和强调。下表所列的这些人，<sup>20</sup>有自己庞大的



政治关系网，是天才的和富有成就的长期领导者，他们不同于斯大林政治局里那些资历较浅的政府官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40年代初毛创建的以他本人为核心的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关键人物。共产党领导集团无疑把各种各样的人吸收进了统一的领导班子，结果是赢得了对国民党斗争的最终胜利。尽管50年代毛在提拔邓小平和林彪的同时，<sup>21</sup>随之又把一些亲密的个人支持者选入核心领导班子内（就林彪来说，毛提拔了一个不一定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sup>22</sup>但他基本上还是乐意把重大权力交给不依靠自己的重要领导人物。主席的绝对权威从来没有受到来自这个集团内部的挑战。这种状况是由于在人们广泛了解的谨慎原则和正统原则诸因素内作出相互让步而造成的。

由此看来，高层政治家们指出了两条关键的谨慎原则：不疏远毛并在政治局内部保持关系融洽。为保持这个时期所有人员稳定，政治家们基本上是保守的：他们一般都希望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顶多想谋求权力的平缓上升，而不冒失地追求权力的急剧上升。1949年建国后不久，就有一位领导人被罢黜，他就是高岗。从中可以看到这两条关键的谨慎原则如何被违背，也表明它们和正统原则的关系是何等密切。<sup>23</sup>高岗期待毛的驾崩，并很明显地进行被禁止的派别活动，企图夺权。这显然激怒了毛，他坚决执行了正统原则。他这么做，即使不全是为了自己，至少也是为其他人着想的。同时，高的行为招来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反对，不仅包括那些个人地位受到威胁的人，而且也包括那些不愿冒险触犯正常组织纪律的人，因为这些组织纪律很适合于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政治上被罢黜的人是彭德怀，他同上面高岗的情况有些相似，但也有不同的教训。<sup>24</sup>最重要的谨慎原则即不

疏远毛，再度被违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坚持己见，对“大跃进”提出批评。就象我们所看到的，彭这样做出于包括他对“大跃进”进行了认真考察等复杂原因，但主席拒绝了彭的批评，并强行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当毛的要求和党的原则发生冲突时，其他领导人很快就领会到要小心从事。有的关键人物加入了对彭的批判（尽管他们个人意见与彭相同）。同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在上庐山之初准备对“大跃进”提意见，一旦毛表现出不能容忍批评的征兆，他们也不得不改变了态度。<sup>25</sup>

总的稳定的局面，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以谨慎为指导方针的保守行为。虽然毛确实希望他的同伴“不负众望”，但在这方面他没有任何奢望。诚然，毛以后的领导人一直抱怨整个机构如同毛时期一样，对政绩要求不够，甚至无能的官员只能因为严重地触犯刑律才会被撤职。<sup>26</sup>对高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看来有相当的管理天才），极少因为生产上的失误而遭免职。此外，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冒险改革所得到的奖励比出色的管理要少得多。总之，大多数剧烈的革新一般都来自毛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毛是必要的。但至少就一些基层官员来说，并不会因为特别积极地执行主席的指示就必定获得好处。<sup>27</sup>而高层统治集团只要下级主管官员们执行党的路线，就能使之正常升迁，而不考虑他们在执行时热情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说，下级官员也确实缺乏热情。所有幸存者中的头号人物周恩来，就因为他出色的国内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而著称于世。<sup>28</sup>

就拥护何种政策而言，也要求遵循谨慎的策略方针。禁止派性使得政策联盟只能以非公开的形式出现，并且不断变动。象庐山会议主要官员所表现的那样，最安全的方针当然

是站在毛一边。但是，由于毛的政策立场常常令人难以捉摸，而且他指望同伴们能提意见，因而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行事。这里，除了避免政治局内部过于尖锐的冲突外，谨慎的领导人力求尽可能地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正如1956年的经济紧缩一样，<sup>29</sup>鉴于赞成另外观点的领导人的联盟阵容和专业水平，毛泽东还是能接受劝说，改变自己的政策偏向。当然，持与毛泽东相反的观点立场是危险的。彭德怀对毛的大量的个人批评就是证明。但是，应该强调指出，彭德怀事件在严重性上是独一无二的，并在总体上还是承认坚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的（如果这种权利没有被过份运用的话）。因此，周恩来对“大跃进”所表现的怀疑态度就没有严重地影响到他的地位。<sup>30</sup>陈云的情况就有些不同。<sup>31</sup>

最后，建立一个支持自己的根据地也需要谨慎从事。这意味着要保护本系统的利益，但又不能做得太明显。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必须首先使毛和政治局满意。这样，当“大跃进”的各项政策严重地削弱了周的政府机构时，周就知道他必须附和毛。1956年削减军费时，解放军高级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与此相似，任何过于明显的发展或利用个人关系网的行为都有招来毛和某个政治局成员不满的危险。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反对宗派主义的原则，而且其他领导人会把任何重要人物背后过于紧密的团体视为政治上的威胁。“文化大革命”之前，党的主要领导集团由不同的革命团体——毛的长征派、刘少奇的“白区”（地下）工作者以及各个根据地和军队的领导人——所组成，他们在40年代初都经受了毛的考验。在长征派占多数时，它很好地代表了所有重要的团体。直到1965年，它们中间大致维持着平衡。<sup>32</sup>一个谨慎的政治家在安排新职务时，总会抑制天生的欲望，并考虑到其

他领导人的利益，而去平衡地安排这些职位。在这一点上，有迹象表明总书记邓小平是所有领导人中最有可能逐步掌握人事安排权的人物。但这并不是说邓小平赞成选派以前亲密的同事到各省担任省委书记。<sup>33</sup>而个别关键性职务，比如1952年任命胡耀邦为共青团书记，<sup>34</sup>从长远来说，可能比提拔一大批老同事更为重要。但在1949—1965年的条件下，这出戏还得用相当出色的技巧演下去。

这一时期基于保守的政治还进一步反映在继承人的政策上。毛出于对他死后持续稳定的考虑，50年代中期指定刘少奇为他的接班人。再晚一点，就可以看到1960年他退居“二线”，让刘和其他人主管日常工作，以此实现他的计划。<sup>35</sup>如前所述，这些对继承人的安排，并不仅仅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命令，它们还为整个政治局所接受。因为这种安排保证在毛死后把争吵减到最小程度，也因为刘显然领导了一个代表政府机构和革命人民的集体。由于毛显然维护这种安排，所以，尽管毛不可避免地支持一些下属，但其他人向刘挑战时却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事实上，正如其他的共产主义体制所表明的那样，<sup>36</sup>如果在1965—1966年前毛去世的话，这样一个结构合理的继承方案前景是不错的。<sup>37</sup>攻击刘企图在毛过世后夺权，将被看作是捣鬼行为，这也违反了禁止搞派性的纪律。只要刘本人坚持原则，政治局总体上相信他的集体领导是“不负众望”的，那么刘的地位则完全可能是牢固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凡年出现的许多征兆，预示着稳定的毛主义很快要产生震荡。不仅毛在庐山会议上以他旨在报复彭德怀的行为削弱了正统原则，而且其他人也发现按谨慎原则行事使他们违反了组织原则。彭德怀唯恐毛在

这个问题上过敏，于是在60年代初对“大跃进”的错误作了一次悄悄的回顾。这也是早期派性开始的信号，尤其是以毛的妻子江青为首的一伙激进空想家，开始在文化领域不时地进行关于“修正主义”的秘密调查活动，使得派性活动从此抬头。也许大多数不稳定因素是由毛退居“二线”的设想，由他觉察到中国革命蜕化而引起的日甚一日的忧伤，加上他对政治局同伴的某些行为第一次隐隐约约的思考所造成的。在这时，对于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测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捉摸的主席的愿望是什么。毛这时从现行政策过程中的游离、无法预见的干预和只说出含糊的关切而不道出行动计划，都使他的同伴陷入了困惑。<sup>88</sup>高层政治家采用谨慎原则的关键，仍然是获得毛的好感。但是，按照这一条原则去行事会日益困难。

### 第三章 林彪的沉浮

(1966—1971)

由于毛泽东的预言最后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得到实现，结果导致了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的解体。当派系行为从学生中的“红卫兵”到党的最高机关都变得激烈起来时，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也遭到了抨击，如列宁主义原则被指责为反映了简单地服从组织决定而不对不纯的思想进行检查的“奴隶思想”。当时，形势的发展无法预料，就象陈毅所悲叹的：人人都惶恐不安，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sup>39</sup>许多长期存在的谨慎原则不能再提供有效的指导了。在势不可挡的红卫兵的冲击下，甚至党组织中至关重要的机构也基本上被改变了，直到1967年，它们被解放军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在这动乱的年代里，政治运动的性质被改变了，它已不是由所有上层领导人发动的一场单一性质的政治运动，而是出现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对于一大批老干部来说，这是一场求生存的运动。他们竭尽全力以避免由于横遭指责而带来的屈辱，并努力在这些年来建立的个人关系网中求得庇护。另一方面，对于高层的少数人来说，这是一场攻击运动，他们声称按毛泽东思想中最革命的部分行动，用抓别人小辫子的手段，迅速地往上爬。

林彪的沉浮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层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极好的说明。林彪1966年作为毛选择的新接班人戏剧性地出现了，而更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消

失。1971年他谋杀毛未遂而逃往国外时被宣布死亡。把林彪定为继承人这种异乎寻常的选择，表明这场政治运动被改变到了何种程度。刘少奇无疑也是毛的个人选择，但一般认为，他被代表各个系统和各界人士利益的政治局所普遍接受。而林彪被政治局接受，很明显是屈从了毛个人的压力。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资历相比，很难说林彪是接班人的最佳人选。林几乎没有显示给人以他能很好地接班，能成功地领导复杂的政治系统的印象。不仅他处理军队事务的经验相当有限，而且行政能力由于屡犯错误也令人怀疑。因为这一点，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担任实权职位。由于他和罗瑞卿的意见冲突，甚至在1959年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在军队的日常事务中他似乎也很少发挥作用。的确，这也许是毛选择他的关键所在。在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林彪在60年代初所扮演的角色最接近于毛，因为他们都远离日常事务。这样就使林彪避开了有损于思想原则的困难的选择。此外，他还有目的地提出些笼统的口号。正是这些口号使林彪深得毛的偏爱。<sup>43</sup>在大部分高层领导人眼中，在许多关键性的政策问题上，林无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缺乏作为一个领导人应有的威信。1966年以后，他担任了“文化大革命”主要领导人，才对他们的基本利益构成了威胁。显然，当时林彪地位的持续上升是依靠毛的不断支持。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阶段结束，这时林彪的政治力量强大了，但同时他也处在了易遭攻击的地位。林彪力量的加强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局人选中看出来（见下表）。就两派的关系和组织上的支持而言，林彪已很好地建立起新的统治集团。然而，文官中“激进派”结盟的可能性明显地存在，他们也是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而进居高位。相

### 中共九大政治局分析

|      | 中央军委   | 各大军区       | 党和国家元老   | 激进派                                 |
|------|--|------------|--|-------------------------------------|
| 常委   | + 林彪 (VC)                                      |            | 周恩来  | 陈伯达<br>康生                           |
| 全体委员 | + 叶群 (林之妻)<br>+ 黄永胜<br>+ 吴法宪<br>+ 李作鹏<br>+ 邱会作 | 陈锡联<br>许世友 | 李先念<br>叶剑英 <sup>a</sup><br>朱德 <sup>b</sup><br>刘伯承 <sup>b</sup><br>董必武 <sup>c</sup> | • 江青 (毛之妻)<br>• 张春桥<br>• 姚文元<br>谢富治 |

+表示林彪的个人势力。

• 江青派 (“四人帮”)。

VC.表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a.叶虽然担任军职，但和周的团体紧密联合。

b.朱和刘尽管是军人，但支持老革命家。

c.董实际上已退休。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全体干部支持的背景而言，周恩来本人及以周为代表的旧路线官员的地位受到威胁，这也是新形势带来的必然结果。周在新政治局中缺少实际的支持（从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许多周所保护的亲密同僚在1966—1968年间被打倒了）。对毛来说，九大标志着一个从毁灭腐朽思想到建设一个新的纯洁的秩序的转变。林彪作为一个军人和



“文化大革命”中的投机者，比起周恩来这样老练的行政官员来说，对于制定具体计划以实施国家全部政策的工作远远不能胜任。甚至那些激进的文官也制定了各种促进“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sup>41</sup>的计划，并对应付新形势作了较好的准备。尽管林在政治局有众多的追随者，但出于他履行“破旧立新”诺言的能力有限，人们对有关林彪身体不佳并预感不可能真正成为接班人的说法一点也不感到惊奇。<sup>42</sup>

由于林依赖毛，他的困境进一步复杂化了。林需要得到毛的继续支持，这给他自己带来了一些困难的策略选择问题。一种可能的策略是，紧跟毛泽东的领导，谨慎行动，依靠政治局排位造成的强有力地位，并凭借着指定接班人的身份，控制中央机关所有最关键的部门，以应付毛去世后不可避免的争斗。但由于林彪选择了更冒险的策略，在毛仍健在时就主动扩充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因而使高层中的反对势力得到加强。新的情况有利于周恩来。林主要的风险是，他的行动肯定将与毛发生冲突。就象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需要军队的支持，林的地位才有可能迅速地上升到最高点。他当时很少公开活动，所以没有触怒脾气越来越大的毛泽东。现在，林彪却积极追求权力的扩张，就增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与毛冲突的危险。

尽管我们对林彪战略的许多具体内容仍不知晓，但其大致轮廓已基本清楚。林彪除继续获得毛的支持外，其战略的中心特征是，保护人民解放军的利益，并增强派系力量对自己的支持。1966—1968年间，林彪在这两方面花了一些力气。中共九大以后，林试图进一步用建立带有个人和政策性质的联盟来实现他的战略。林的努力充满了困难。在高层中对林彪这种活动的深深敌意严重遏制了他的战略进程，因为

实现这种目标要以小集团和政治联盟为基础。毛与林的冲突公开后，林显然加强了冒险行动。这个冲突发生在1970年8—9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会上林受到了批评。不同于以前所有政治冲突的惯例，林按照已经拟定的军事政变计划，采取了最激烈的背叛行为。<sup>43</sup>

林彪战略的核心是努力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关系网。毛后来采取的行动，说明他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林彪派系的扩张比政策问题更为严重。林彪实现自己计划的手段和步骤是，“安插”其死党到国家权力的关键部门，建立军事专政，然后在国内外众多问题上与领导层决裂。“这种渗透活动在军队最高指挥部门进展更快。林在这里已成功地安插他的老四野部队的同事把持关键位置（尤其是1968年3月清洗了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后）。九大以后，林的渗透活动继续进行，特别是林的儿子林立果，1968年10月被安插在空军司令部一个关键行政位置上。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团体。林彪的关系网从中央扩展到各地方军区中，同时也扩展到1969年后为重建党委而成立的新的地方政治机构中。在党和政府机构普遍重建的过程中，林彪主张阻止老干部们恢复工作，以便把老一辈行政官员的力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里，而把自己小集团的力量扩张到最大程度。<sup>45</sup>

总之，林的活动显然违犯了禁止派别活动的禁令。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了依靠赤裸裸的派别斗争，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作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林只能继续运用“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斗争方式，因为林就是通过大肆抵毁现存的规范，打击大批老干部而受益的。他的活动，无论如何在毛和所有领导人中产生了极不利的影 响。当毛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林发起进攻时，就是针对林的阴谋而进行的。

在林倒台后，作为这件事的深刻教训，“毛特别感到坚持反对派性原则的需要。当时，林的活动给大多数其他领导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政治局中非林彪集团的成员，其他部队的元老和毛本人都对来自林彪同伙的压力感到不满。

和林彪上述战略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保护他在军队中的组织基础。甚至在九大以前，林彪就呼吁增加国防经费，以真正保证军队的利益。<sup>47</sup>与此相关，林采取了一种外交战略，作出加强战备的姿态，以应付美国侵越和苏联屯兵北疆的威胁。军备的加强使林和周发生冲突。周从1968年底建议开展亲近美国的外交，以孤立莫斯科这个更危险的敌人。<sup>48</sup>从理论上说，林彪对军费的强调更有利于军队的利益，因为外交的缓解增加了削减军费开支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林一旦实际控制了军队，便迅速成为一个加强军备的积极倡导者。由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公开清洗，<sup>49</sup>林为了求得军队系统强有力的支持，显然要求加强军事建设而不是外交活动。同时，他否定周恩来在国防政策方面的主要思想。

但是，林彪确保军队支持的企图却被“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矛盾倾向打破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1967年军队地位提高并取代了党作为地方行政机关的核心的结果。军队的领导人迅速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和其重建的地方党委的领导。林在这方面的努力无疑赢得了许多有野心的军官的支持。但这一进程的发展却加剧了军队内部的分裂，军队没有进入施展他们自己才能的政治领域，却被毛带到了反对高级军官的斗争中。这些军队领导人关心的是军队卷入政治的价值和整体的团结精神。他们看到军队最基本的防御作用被逐渐破坏了。而且，一旦军官置于行政领

导地位，他们发现自己和前任文官处于大致相同的形势里。这些官员不仅对红卫兵的批评和其他激进因素不满，而且在九大后他们普遍同意周恩来在中央推行的谨慎的经济政策。对林彪个人来说，也许最有害的是尽管他的地位在军队各级领导中最高，但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1967年当各地军队受到在江青激进派鼓励下的狂暴的红卫兵攻击时，他对各军区司令员们没有进行保护。与此相反，周恩来不断支持各地军官，赢得了他们的感激。这样，林彪为保护个人体系基础而作出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毛在九大后重新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时，毛在军队发现了支持者。许多军人对林彪毫无感情，而仅仅是非常乐于恢复他们的正常作用。<sup>50</sup>

林彪战略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在九大以后筹划一个方案，以吸引“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中国的“军工联合企业”和毛本人。这个方案与周恩来推行的各项温和政策尖锐对立。林彪讨好激进派是以激进政策作前提的，或许更重要的是由于来自周恩来的共同威胁。这一举动成功地把陈伯达吸引到林的一边，但显然林没有向其他集团作更多的渗透。对激进派来说，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中过分行为的批评，导致了一系列不利于他们的变化：已成为权力中心的中央文革小组，到1968年底停止了它的功能，对红卫兵激进分子——“5·16集团”的调查也同时开始进行。<sup>51</sup>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危险足以把陈伯达和林彪拴在一起。一般说来，林彪显然赞成增加工业投资，周恩来则注意满足农业的需要。林政策的关键是靠类似“大跃进”的措施实现农业的增长，而不是靠周所倡导的物质刺激。结果，1970年上半年各地执行了激进的政策，要求限制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提高生产核算单

位，动员群众去实现农业的新跃进，而没有追加足够的资金。<sup>52</sup>这个计划的提出，尽管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也许更大的企图是赢得军心，但终归受损于林的“文化大革命”的“左”倾做法。<sup>53</sup>1966至1968年间，由地方军人担任的工业官员遭到了激进派的攻击，他们发现是周而不是林是一个更富同情心的同盟者。无论如何，负责地方工业的官员们要求大量增加拨款，他们已清醒地意识到上次试验过的群众动员大办农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无疑感到是周而不是林更有能力担负恢复国民经济的领导责任。

在上述分析中，对林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保住毛的支持。林的政策有把毛的思想引向偏激的作用。他攻击物质刺激，显然指望“文化大革命”取得大跃进式的辉煌成果。的确，毛的劲敌是美国，但可悲的是林没有看到，毛本人是一个辩证论者。现在毛的辩证法要求实现一个转变，转移到重视周所倡导的较谨慎的路线政策上来，虽然这个转折似乎并不是基于政策问题而发生的。意味深长的是，仅仅在1970年8—9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后，<sup>54</sup>毛才明确支持周的国内政策，并同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在这次大会上，毛完全转变了对林的态度。据毛其后说明，<sup>55</sup>他已断定林彪和陈伯达以赞成恢复国家主席、吹捧毛是“天才”为幌子发动“突然袭击”。他在会上对林彪发出过批评。毛抱怨说，他已告诉过他们6次不要提设国家主席之事，并要求停止派别的阴谋活动。毛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林彪一伙的动机是，如果毛推辞，林可得到国家主席的位置，并且加强林作为“天才”接班人的地位。<sup>56</sup>毛的强烈反应确实使林和陈感到震惊，他们希望最坏的结果是乐于接受赞颂的毛仅仅轻视这件事。1966—1968年间毛接受了林对他的歌功颂德。他们肯定认为毛后来否认自己是

“天才”，不过是一种托词。但是，对于毛来说，也许联系到林的派系活动，联系到林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带来的动乱，以及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袭击”，正好增加了他对自己新选定的接班人的明显怀疑。

庐山会议后，林彪的地位变得更加危险了。他的极左主义的农业政策遭到的抵制和周的温和政策的胜利，不久就变得清楚了。毛采取了几项组织措施削弱了林对军队指挥系统的控制以及他在上层的地位。虽然不能很明显地肯定毛最初打算如何处理林彪，但林已开始加紧了秘密活动。他日益增强的冒险行为很快导致了1971年3月军事政变计划的拟定。最后，当林在9月初间知毛打算进一步追究此事，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策划了一个流产的暗杀阴谋，并且在失败后企图逃走。<sup>67</sup>最终，林的失败不仅仅由于他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健全的所有正统原则（尽管这一点不可小看），而且还因为他试图嘲弄的谨慎原则被这场把他推到权力顶峰的运动所严重地破坏了。关键的一点是林没有坚决满足基本的要求，即保持毛对他的支持。

## 第四章 “两条路线斗争”

(1972/73—1976)

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动荡以后，一个中国共产党极不愿面对的政治难题，以及使周恩来温和经济政策日益加强的趋势出现了。到1973年初林彪倒台以后，各方面的工作以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为特征。<sup>58</sup>这种两极化的问题正是由“文化大革命”本身引起的。从1973年开始，激进派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以江青为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以前旧路线回潮。他们没有看错，“文革”以前旧路线的许多政策为行政官员们所拥护。江的“四人帮”<sup>59</sup>既推行他们最得意的“改革”，强调平均主义价值观和大锅饭的重要性，又反复地攻击政府关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同时，尽管在激进派的火力之下，老保守派偶尔也作些让步，但他们仍坚持不懈地为现代化目标奋进，并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管理机构的控制。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策分歧构成了1966—1968年的苦涩回忆。1976年1月周去世不久，刚复职的邓小平又被罢免，而“四人帮”则在同年9月毛去世后不久即被无情地粉碎。

1973年8月中共十大所选举的政治局（见下表）尽管有所低估旧路线官员们的全面优势，而夸大激进派在高层的总体力量，但还是平衡了各方面的力量。在职务的任命上呈现了

### 中共十大政治局分析

|       | 保守派   | 各大军区                           | 激进派                            | 其他  |
|-------|---|--------------------------------|--------------------------------|---|
| 政治局常委 | 周恩来 (vc)<br>邓小平 (vc)a<br>叶剑英 (vc)b<br>朱德 <sup>b</sup><br>董必武 <sup>b</sup> |                                | • 王洪文 (vc)<br>康生 (vc)<br>• 张春桥 |   |
| 全体成员  | 李先念<br>刘伯承 <sup>b</sup>   | 李德生 <sup>c</sup><br>陈锡联<br>许世友 | • 江青<br>• 姚文元                  | 华国锋 <sup>d</sup><br>纪登奎 <sup>d</sup><br>韦国清 <sup>e</sup><br>吴德 <sup>e</sup><br>汪东兴 <sup>f</sup><br>陈永贵 <sup>g</sup> |

VC,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四人帮”成员。

a. 进入十大中央委员会, 1974年1月进入政治局, 1975年1月提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

b. 指尽管是军人, 但退休后仍支持老革命家。

c. 1974年1月从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降下来。

d. 中央各部部长, 原为地方党委领导人。

e. 地方党委领导人。

f. 中央警卫部队首长。

g. 以前是农民干部。



一幅更精确的画面。不仅新任省委书记大多数是由复职的官员担任，包括“文革”以前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新一届国务院有60%多的部长职位掌握在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手中，这些人都有在1966年以前中央政府各部工作的经验。相反，激进派只有张春桥当选为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及少数几个激进派成员得到加官晋级。这个权力结构不仅反映了老革命家深信激进的空想家们缺乏“履行”关于实现现代化“诺言”的能力，而且这个安排也严重削弱了“四人帮”为可能的同盟者带来明确的政治利益的能力。无论如何，象华国锋这样新提拔上来的官员不可能与之结盟，<sup>60</sup>因为缺乏重要官职的来源使激进派无法满足这些无帮派的有关领导人的要求。由于无法解决官职问题，“四人帮”就不得不依靠意识形态的感染力、“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热情和这一阶段的机遇与压力来拉拢盟员。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似乎只有少数政治局委员偶尔和激进派的具体计划合作。<sup>61</sup>相反，旧路线行政官员不仅拥有充足的官职来源，而且他们的计划的性质也鼓励人们作非常实际的权衡和抉择，由此可能形成一种十分广泛的联盟。

与此相关的组织被削弱，使“四人帮”无力渗透到人民解放军中去。尽管林彪能在军队中用“左”的一套扶植个人势力，但“四人帮”却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团体和官员身上打主意。“四人帮”和军队领导人在战争时期缺乏联系，即使张春桥当上了军队的政治首长，仍不能插手军队。国防部长叶剑英和总参谋长邓小平等军内领导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牢牢地掌握着军队。“四人帮”试图建立一支城市民兵以对抗解放军，但没有成功，这反映了他们无法掌握军队的弱点。他们求助于民兵的战略，不是简单地因为和军队领导人

缺乏旧关系，或者不能把政府的财力转给军队，更根本的是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中激进派的所作所为普遍感到厌恶。如果说人民解放军将领们对林彪的不满，是因为1967年他们反对“左”的进攻时他不予支持的话，那么，后来他们对作为“左”的攻击的发起者即江青等人的敌意，则大得无法估计。确实，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林彪倒台后愿意逐步回到兵营去，这种政治解脱似乎和他们满意“文化大革命”前路线执行者在北京掌管较高的权力有关。这样，1974年初各大军区司令员大变动\*和把邓小平提到政治局重要地位同时进行，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这一时期解放军军官退出地方政权，将权力移交给“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毕业的地方党的行政官员。军队必须遵循“党指挥枪”的正统原则。军队领导人很重视1967—1968年的谨慎教训，不相信激进派会关心他们的利益。<sup>62</sup>

由于“四人帮”与行政官员和军队上层之间充满敌意，他们不得不依靠毛的庇护来维持他们现有的地位和未来的前途。就象1967年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只有主席把他们提到现在的高位上，也只有主席能在与其他人的斗争中使他们的事业得以向前推进。对于获得毛的支持的重要性，敌对的两派都十分清楚。1974年周恩来住院后，邓小平成为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重要人物。在1975年起草经济现代化规划时，邓一再强调必须把报告呈送给毛并听取毛的指示。<sup>63</sup>因

---

\* 这里指的是1973年底的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8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2日，军委发布命令，对8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央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译者注

为双方都认识到了毛的支持的重要性，接近毛成为决定性的政治策略，但这个策略既不能被一方所垄断也不能作为依赖。<sup>64</sup>

由于主席的政策看法和以往一样反复无常（也许他在有意嘲弄敌对派别力量），“毛的因素”从1973年起因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而逐步复杂起来。毛这时确实不能发布有力的指示，从而他日益脆弱，并且为那些有权接近他的人所操纵。此外，由于这场斗争的结局日趋明朗，对激进派和老革命家来说，毛去世后各自的不同结局就要到来。老革命家就须在避开毛的怒火的同时，还要比毛活得更久；而激进派想在毛去世时得到任何占优势的机会，就需要毛的干预以加强他们的地位。但是，毛明确地拒绝倾向任何一边。很明显，出于对“四人帮”政治水平的怀疑和对他们派别行为的打击意图，毛签署了1975年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这个安排加强了老革命的势力。在政策问题上，尽管毛和行政官员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有共同之处，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激进派所提倡的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深得毛的欢心。尽管如此，“四人帮”在与老革命家的斗争中仍然得不到毛泽东的决定性的支持。<sup>65</sup>甚至邓的下台仍不能满足“四人帮”的要求。

由于只能偶尔求得毛的支持，而自己又面临与老革命家为敌的状态，“四人帮”必然被迫采取一个更加冒险的分裂阴谋。除了想激起毛对老革命的不信任以及冒被毛冷落的风险外，<sup>66</sup>激进派还进行了一项罪恶昭彰的否定1966年以前原则的活动，这就更加深了与老革命的敌对。因为主席对“四人帮”的支持摇摆不定，“四人帮”就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中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下面群众的批评渗入到正统原

则中去，以修正这些原则，<sup>87</sup>其结果是直接向列宁主义原则中最基本的纪律挑战。激进派运用舆论工具的强大影响，不断地鼓动人们抵制党和国家的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具有激进倾向的基层干部便拒绝执行这些政策，而更多的官员则对此犹豫不决。这样，“四人帮”的行为从总体上破坏了有秩序进行管理的行政系统的施政能力。与此相似，他们还怂恿群众反对老革命，从而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混乱。这不但引起了老革命的强烈谴责，而且也为毛本人所不能接受。

除了上述手段以外，“四人帮”还依靠他们的派别关系网。虽然老革命们牢牢控制大多数行政管理组织，但“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的要求，以及许多迅速提升的年轻干部的切身利益，为“四人帮”获得一大批拥护者提供了基础。

“四人帮”试图使自己的追随者渗透到各个机构内部充当老革命的反对派，并暗中侦查对方，破坏政府指示，在由老革命垄断的正常渠道外建立自己的秘密联络网，并最终建立了极其严密的帮派体系。这不仅因为违反了主要的原则而惹怒了毛，并引起了充分明了其威胁的旧路线执行官员的怨恨。<sup>88</sup>但很显然，激进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象林彪一样，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毒地攻击了整个上层的利益，但与林彪不同的是，他们缺少重要的组织资本、分布广泛的关系网以及真正的革命威望。如果说林彪是被偶然性或必然性牵到派系政治斗争中去的话，那么“四人帮”要想有一线生存机会，除了破坏各种正统原则外别无选择，因为后者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如果说“四人帮”是被迫运用了一种危险的策略的话，那么老革命则是主动采取了高度冒险的战略。除了要冒抵制

毛部分地支持激进派主张的险外，更大的危险是他们1975年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向前推进，而毛对此持矛盾心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行政官员们制定了一项重大的规划，包括许多和“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观相抵触的具体计划。尽管邓仔细地与毛商量，并且主席也确实提出过一些具体措施，<sup>69</sup>但传说邓说过：“我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这样的话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次冒险前途未卜。<sup>70</sup> 邓的计划公开地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系统地提出来，和197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取的路线相一致，这就为老革命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行政官员并不排斥“四人帮”非法的派别手段，虽然这些派别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危险。因此，他们在1974—1975年采取了一些明显的秘密的准备措施。此外，还包括1976年邓小平被免职以后进行的军队布署。<sup>71</sup>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老革命家联盟充其量不过是各团体基于老关系和共同认识形成的松散联合。然而，老革命们几十年建立的广泛的关系网以及对重要部门的控制，使得他们不需要激进派那种严密的派系安排。但是，促使他们之间进行联盟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清算旧帐、恢复老革命家的名誉以及重建一个能“履行”实现强大、安定的中国“诺言”的可靠体制，而对于个人可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并不太关注。

这场敌对双方斗争的高度风险性，在1976年的一系列事件中越发突出了。邓小平的政策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怀疑。此外，周恩来去世后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使主席下了清洗邓的决心。但邓的下台不是为“四人帮”扫清道路，而是导致了华国锋被指定为周和毛的接班人。尽管老革命在猛烈的批邓运动中处于防守地位，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未被打破。当主席终于在9月与世长辞之时，“四人帮”

则完全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10月初逮捕“四人帮”，不仅是他们再三违反正统原则的报应，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期间的紧张对抗，使谨慎的指导方针遭到了严重的扭曲。

## 第五章 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时代

(1976/77—1982)

清除“四人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华国锋被确认为党的主席，很快在下列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加强社会秩序的稳定，遵循1975年的纲领路线使经济现代化，以及恢复1966年以前的政治体制。在随后的几年内，人们努力恢复正统原则，因为正统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同时，加强谨慎原则的过程也开始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返回领导岗位的条件和时机，为1966—1976年同其余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的速度，对“左”倾分子清洗的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性评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以及对毛泽东在更广泛意义的态度问题等等。到了1978年末，另一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如对政治自由化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评价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对经济政策的重评导致了从相对正统的方针向改革方针的转变，这种改革涉及到下放权力、市场机制和复活私有成分的作用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同邓小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转变相吻合的。邓小平力图与过去的僵化正统的东西决裂。在此过程中，也造成了毛逝世初期的联盟的解体。这样一来，到1979年初，反对向毛的象征性地位提出任何疑问的汪东兴的“凡是派”，开始全面退却。到了1980年末，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最终，在1981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

党新的主席。

对毛以后联盟进行划分的最基本的依据，是比较各位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参见下表）。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为他们获得了最高层的领导职位，而这些职位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是肯定不会得到的。因此，无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但他们却不会有兴趣去贬低“文化大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况且，作为1966—1976年间活跃的政治家，这些高级官员常常采取不利于其他领导人的行动。当然，华国锋本人在1966—1968年间并没有卷入中央的激烈冲突中去。<sup>72</sup>“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既是本来意义上的受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保护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持一种全盘否定的观点。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个人的特别的行动，怀有痛苦的记忆。在这两部分人之间，是1966—1968年间运动的幸免于难者，这些官员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首。总的来讲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1968年后，他们的地位有升有降，呈现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这些幸免于难者猛烈地批评“文化大革命”。<sup>73</sup>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来，他们受到的个人迫害当然很少。他们在推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尽可能顺利地进行转变方面，还是抱有一定兴趣的。新时期刚开始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为邓小平平反。“文革”的主要受益者试图阻挠邓小平重新掌权。“文革”的幸免于难者怀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要求重新启用邓小平，自然同时也帮助制定肯定华的地位的妥协方案。<sup>74</sup>在这些活动中，很难说华国锋起了何种作用。虽然在1980—1981年间，人们指责华国锋在启用邓小平问题上起了



## 十一届和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分析

|                  | “文化大革命”<br>的受益者  | “文化大革命”中<br>幸免于难者  | “文化大革命”<br>的受害者  |
|------------------|--|--|--|
| 常<br>委           | (P) 华国锋 <sup>a</sup><br>• (PS) 汪东兴 <sup>b</sup>  | (M) 叶剑英<br>+ (C) 李先念<br>(C) 陈云 <sup>e</sup>  | (C) 邓小平<br>(P) 赵紫阳 <sup>h</sup><br>+ (C) 胡耀邦 <sup>i</sup>  |
| 正<br>式<br>委<br>员 | + • (M) 陈锡联 <sup>c</sup><br>• (P) 纪登奎 <sup>c</sup><br>• (P) 吴 德 <sup>c</sup><br>+ (M) 李德生<br>(BC) 陈永贵 <sup>d</sup><br>(BC) 倪志福 | + (M) 刘伯承 <sup>f</sup><br>+ (M) 徐向前<br>+ (C) 聂荣臻<br>+ (C) 余秋里<br>+ (M) 许世友 <sup>g</sup><br>+ (P) 韦国清 <sup>g</sup><br>+ (C) 方 毅<br>+ (D) 耿飚 <sup>f</sup><br>(P) 彭冲 <sup>f</sup><br>(C) 王震 <sup>e</sup><br>+ (C) 邓颖超 <sup>e</sup><br>+ (M) 杨得志 | (P) 乌兰夫<br>(M) 张廷发<br>+ (M) 苏振华 <sup>j</sup><br>+ (C) 彭 真 <sup>k</sup><br>+ (P) 万里 <sup>l</sup><br>+ (C) 习仲勋 <sup>m</sup><br>+ (C) 杨尚昆<br>+ (C) 宋任穷 <sup>n</sup><br>+ (C) 胡乔木<br>+ (C) 廖承志 |

姓名下面划横线者，表示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上当选的领导人。

• “凡是”派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经历中与邓小平有重要联系。

“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P) 省委，(C) 中央(党或国家)，(M) 军队，  
(PS) 公安部门，(BC) 基层干部，(D) 外交部门

a. 1981年6月从主席降至副主席，在1982年9月没有再被选入政治局。

b. 1978年12月从副主席降至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被解职。

c. 1980年2月被解职。

d. 陈持类似观点，但与“凡是”派没有联系，1982年9月被选入政治局。

- e. 1978年12月当选。
- f. 1982年9月没再当选。
- g. 许和韦表面上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但在1967—1968年两人均遭严厉批判，许1982年9月没再当选。
- h. 1979年9月晋升为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晋升为政治局常委，1981年6月当选为副主席。
- i. 1978年12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晋升为政治局常委，1981年6月当选为主席。
- j. 1979年2月逝世。
- k. 1979年9月当选。
- l. 一直在中央部门任职，1958年调到北京市任职。
- m. 1962年被解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攻击。
- n. 60年代初在地方任职。

不良作用。但是，从1976年末到1977年初，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当时的政治局反对邓小平，也许在那种转折时期是为了适合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sup>76</sup>不管怎么说，随着1977年7月邓小平的正式复出，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将对毛以后中国的分析集中于华与邓之间所谓的继承斗争上，就无法抓住领导层新的力量对比的实质问题。两人之间无论存在何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他们也决不会发生势均力敌的斗争；无论是怎样斗，邓也会取得胜利。对此，双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尽管华的正式职务是主席，但许多事情很快表明：邓是事实上的领导人。邓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总能变成官方的路线和人事任命。虽然没有建立起狭窄的邓小平集团，然而遵循邓小平方针的人的权力，却不断地得到加强。也许对此所做的最好解释是，邓可以经受得起政策的挫折，而不用担心对他的地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威胁。因此，

在1979年初，面对由试行的民主化措施、1977—1978年冒进导致的经济损失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复杂后果引起的三重不安定的挫折，邓小平能够承担起责任来。<sup>76</sup>他通过号召回击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他还轻而易举地挫败了汪东兴等人的新的攻击。<sup>77</sup>这样的政策变动与其说是为了反对真正威胁他的地位的人，不如说是表明了邓治理政治体制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政治局成员谨慎于事的主要作用，就是使自己保持与邓的一致，得到后者的信任。汪东兴等人不了解这个规律，<sup>78</sup>同时，1966—1976年间的经历对他们地位造成的损害，也使他们只得忽视这一规律。华国锋懂得这种要求，并试图满足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有多种原因使邓小平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得到保证。正如在前一编中所讨论的那样，<sup>79</sup>关键的因素是，他拥有“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领导核心圈子中的主要幸存者这种身份。邓小平作为经历奇特的人物，使他既被毛泽东两次清洗，又得益于他曾经是这位主席晚年的“亲密战友”之一。最热情地支持邓小平的，是同样挨过毛泽东整的人；而更根本的支持来自那些认定邓小平是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长期合作者的更加众多的要人。这些领导人把革命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除此之外，就本编已讨论过的谨慎原则而言，邓小平从许多因素中得到益处。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他形成了一种战略策略，不如说是在早期耕作结出的果实。首先，人们广泛认为他能够“不负众望”。他不仅在1949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获得了作为行政家的相当高的声望，而且在1975年形成了基本的经济纲领。这个经济纲领立即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所付诸实践。这一纲领允诺给

大多数部门和人们带来利益。华国锋把这个纲领当作他自己的纲领，并在官方的秘密会议上宣布它。但是，人们都明白邓小平是这一纲领的设计师。况且，邓小平从1956至1966年间作为老革命家和中共总书记的经历，使毛以后的中国上层机构，布满了与邓小平有着重要联系的人们，以及更加众多的习惯于把邓小平视为最高权威的官员。由于“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削弱了制度模式，这些广泛的关系必然加强邓小平的地位。同象华国锋这样的官员相比尤其如此。

鉴于邓小平强有力的地位，自从1977年年中（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以来，谨慎的中国政治家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适应他，赢得他的信任，取得他对他们的纲领和利益的支持。然而，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那种形势。首先，正统原则——特别是集体领导的要求——是更有约束力的。邓小平不仅缺乏只有象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才能真正拥有的超凡魅力性权威，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毛泽东滥用权力的教训，也成为限制过分的个人权力的强大障碍。此外，其他几乎拥有与邓差不多声望的领导人——也许最著名的是陈云<sup>80</sup>——与邓同在政治局，他们也有自己十分广泛的个人和机构支持的基础。在这些情况下，邓小平只能依谨慎原则行事，即尊重主要领导人的利益，必要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妥协让步，努力建立一个支持他的纲领的联盟，以及把他的支持者放到关键的职位上又不忽视其他集团的利益。邓小平在1978年底针对正统官员中广泛的失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行政治自由化，后来在此问题上又走了一段之字形道路。尽管可以认为邓是想限制自由化的，<sup>81</sup>但是，他显然需要在政治上兼顾各方面的要求。在起草评价毛泽东的贡献与失误的历史决议的16个月

里，可以看到邓通过妥协谨慎地达到意见一致的要求。这使人们又一次怀疑这一最后结果能否完全与邓的个人地位相吻合。<sup>82</sup>1980年2月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选出的书记以及1977年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增选的政治局委员在职业经历上的多样化，表明了邓避免在人事任命上过分插手干预的需要。<sup>83</sup>

尽管邓在权威上存在所有这些限制，他仍然是一位调解各种利益的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依赖任何特殊支持基础的脆弱的人物。1976年以来，毛泽东逝世以后政治上的这些特色，在对解放军的作用中体现得很明显。军队领导人虽然由于在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决定作用，以及在1977年选出的新政治局中居有重要的军队代表地位，开始被认为极有势力，但他们对邓小平领导下采纳的许多政策并不十分满意。就经费分配而言，国防开支由于军队现代化被置于经济发展之后而受到限制。况且，许多官员对人事和专业化改革感到不安，因为这种改革实行强制性退休制度，并对把解放军作为调动农村青年积极性的一种渠道加以限制。此外，有些解放军领导人批评非军事领域的许多党的政策。例如，对战士亲属产生不利影响的农业变革，造成军队内纪律问题并破坏其社会声望的社会上的自由化，以及对毛的贬低等。<sup>84</sup>

尽管有这些不满，军队并没有对邓产生什么严重的挑战。相反，军队仍然遵循“党指挥枪”的正统原则；林彪倒台以后，军队开始从广泛的政治干预中撤出，现在军队仍在继续完成这一工作。为了遵循这个原则，军队领导人基本上是一个关心解放军体制利益的压力集团行事。例如，他们始终不企图干预经济决策。<sup>85</sup>然而，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军队领导人作为更大的革命精英集团的成员，对意识

形态和政治领域里的事情却是直言不讳的。当然，依照恢复了的原则，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干预超出限度时，如1982年8月《解放军报》一篇文章中批评自由倾向那样，迅速的纪律措施便会随之而来。<sup>86</sup>从邓小平谨慎考虑的观点来讲，军队领导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势力，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必须加以考虑，有时还须抚慰，<sup>87</sup>但不给他们对党的政策的否决权。甚至在拒绝军队的一些特殊要求的同时，邓小平还表明他广泛接受解放军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化的要求。鉴于邓小平对军队的利益和对控制老百姓的全面兴趣，军队领导人总是限制他们对党的路线的不同意见。因此，由于中共上层是一个整体，邓小平只有继续对各种集团的利益保持敏感，他的政策至少在最低限度作到“不负众望”，以及不粗鲁地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的条件下，他的地位才会十分稳固。

如果说甚至象邓小平这么卓越的人物都受到许多限制的话，那么华国锋会有哪些谨慎的考虑呢？他的地位本来就很弱吗？在有些重大的问题上，相对来说，华国锋几乎对维护他的地位无能为力。就能否“不负众望”而言，在北京的短暂时期，不太可能为他提供年青有为人物的声望。鉴于1972—1975年间，华在老一代领导人手下担任广泛的领导职务，使关于华在领导方面缺乏才能的说法显得不切实际。<sup>88</sup>但是，无论如何，他的领导才能是无法与邓小平的能力相提并论的。这一点，以及上面提到的关于华起初采用邓1975年纲领的事实，都说明华在党中央几乎没有权威性的发言权。同样，在人事安排方面，华国锋的长期关系局限于省级这一情况，也严重地限制了他将自己的支持者放在关键职位上的机会。因此，除了新的政治局以外，在邓小平恢复职务前9个

月的省级领导大改组的过程中，所任命的大多数官员在经历方面更多地是与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有关系。<sup>89</sup>华国锋长期的合作者十分少，而且资历太浅，不能胜任许多重要的职务。而有足够资历的官员，即使与邓小平缺乏亲密的个人联系，至少也与邓小平有过交往。

在建立联盟方面，华国锋面临一些令人不快的抉择。如果他过分站在他的“自然”支持者即“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伙伴一边，就意味着依靠上层人物中最薄弱的力量，并且要冒引起“文化大革命”幸免于难者和受害者两个集团愤怒的危险。但是，如果他全心全意地认同邓小平政策的所有方面，那么，他又会失去所有独立的支持。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便是，加深他与“文化大革命”幸免于难者集团的联系。这个集团以保持连续性的名义支持他，并且对邓的某些政策明显存有疑虑。但是，这个集团最终必定会支持邓小平，并把邓作为老革命家的头面人物的。况且，在这种背景下，与邓小平相对照，华国锋大胆的进取心往往要冒重大风险。这一点也很不利于华国锋。而邓小平，由于他的地位，以及整个领导层指望他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他可以提出并实施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欢迎的改革措施，却不招致对他的地位的严重威胁。华国锋内在的弱点意味着，他提出的任何创新措施，都会引起他不能与之疏远的集团的愤怒。华国锋也许真心地喜好更正统的“毛主义”地位，他在1977—1978年间正是要建立这种地位。<sup>90</sup>但是，他的政治状况却要求他依靠现存的手段，并使他处于响应邓小平的倡议的被动地位（参见下文）。

在这些情况下，华国锋只能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避免与任何集团过分认同，同时，又试图利用他的主要资本——

他的地位、明显地作为毛的接班人以及政权稳定和统一的需要等。的确，就某种意义来说，华国锋是幸运的。因为，他的个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些政体的需要相吻合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这些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是过渡性的，而且由于与“文化大革命”进行妥协，便与更长远的需要相冲突，使华国锋处在不利的地位。在这一方面，几乎对华国锋的所有指责都涉及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前的过渡时期。认识到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与“文化大革命”的符号的断然决裂。<sup>91</sup>因此，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起初是为了维持1976年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后与毛泽东在领导上的联系，以及巩固他个人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1980年，个人崇拜被当作封建主义的表现而受到攻击（个人崇拜损害了毛泽东的晚年形象）。1977—1978年沿续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口号（实际从整体上看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改变），为的是使相反的政策所引起的震动得到缓冲。但在后来，这些口号被作为华国锋“左”倾思想和冒进的经济发  
展纲领的反映而受到抨击。此外，正如前边已经提示的，平反的有分寸的速度，也许反映了作出可接受的妥协的真正需要。但是，在1980—1981年，它被当作华国锋阻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深思熟虑的努力。在这些和所有其余问题上，与其说华国锋犯了顽固抵抗历史发展潮流的错误，不如说他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

事实上，华国锋十分明了谨慎地适应邓小平的需要，甚至不惜失去他自己的地位，以及与他的“天然”盟友疏远。一般认为，华国锋提拔了拥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人，并企图压制邓小平支持的关于“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讨论。但实际情形更加复杂。华国锋显然在1977年1月的讲话初稿中提出了“两个凡是”，这个提法又被以后称之为“凡是”派的汪东兴和其他人接了过去。后来，华似乎不太采纳这个方针，尤其在1977年4月邓小平写信批评这个概念之后更是如此。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华针对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凡是”观点的错误，找了后者进行谈话。<sup>92</sup>与此类似的是，据说华国锋对“真理标准”的争论实行妥协，而这个争论将会降低毛泽东的声望，从而损害他自己的合法性。汪东兴这时再次跳了出来，他下令禁登有关“实践”问题的文章。1978年秋冬，华国锋站在“实践”派一边采取了行动，他撤消了汪东兴关于报刊不得刊载实践问题文章的禁令，指责汪的行为破坏了安定和团结，并号召“解放思想”。<sup>93</sup>从1978年末起，随着“凡是派”失去人心，华国锋别无选择，只能进一步与占统治地位的联盟合作，并且试图作为这一联盟中举足轻重的一名成员。当时，邓小平不断批评1977—1978年这一过渡时期。<sup>94</sup>华国锋的困境在198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会议对他过去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华国锋竭力诉说他赞成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以图证明他的思想与邓小平的路线是一致的。<sup>95</sup>

但是，失败已成定局。不管是否由于怀疑华国锋对新纲领的忠诚，邓小平确实感到华企图阻挠为邓本人以及其他人平反，确实对1976年的事件很气愤，<sup>96</sup>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让更值得信赖的人作最高领导人。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邓小平对华国锋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迫使他辞职，让胡耀邦接任。华国锋虽然被指责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但他仍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集体领导的正常要求，并且对谨慎统治策

略也实行得不算坏。诚然，甚至可以说，在防止紧张局势的出现，以及在毛逝世不久促进一种相当顺利的过渡方面，华国锋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论华国锋有何长处，或者作为政治家的技能如何，都无法与老练坚定的邓小平相抗衡。如同我们在前一编所看到的那样，<sup>87</sup>邓小平的行动引起一定程度的不满，但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抵制。这也许是由于缺少控制继承人选举的有约束力的正统原则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政治家们认为要注意谨慎地选择当前的领袖。前提是，要使他们满意地看到，对领袖的选择对上层整体的更大利益没有威胁，从而避免林彪事件的重演。

## 结论与展望

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中的正统和谨慎原则我们能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任何制度下的谨慎原则都是经不起冲击的——它们只能为政治策略提供一般的指导方针，而政治策略却是在任何时候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在最稳定的形势下，政治也是一门艺术；不管怎样百折不挠地遵循谨慎原则，要想成功，技巧和运气二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总之，谨慎原则的实用性和正统原则的强制力是密切相关的。按正统标准不仅要规定议事程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规定人们可以接受的内容对政治行为加以规范。这样就使得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能在这些因素限制的范围内制定某种成功的战略，更确切地说，就是制定不冒任何风险的战略。假若上述标准不起作用，那么，政治预测的基点就不存在了，谨慎原则对行动将起不到预期的指导作用，而因损失造成的不良后果也就更大了。一般地讲，由于限制了政治家的选择权，由于不得不妥协，并且由于减少了这种竞赛的风险，就会使政治变得更为保守了。

在中国的政治中，正统和谨慎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十分清楚的。在“文革”前的那些年中，尽管正统原则在那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受到明显的侵蚀，我们仍可以认为对正统原则执行得不坏。政治局领导在已有的保守政治中，所能普遍制定的是一条安全的路线。1966年以前，毛的副手们大体上能够正常进行工作而不用担多大的风险或提防同僚。但

是，在1966年——1976年那10年中，原则靠边了。满眼看到的是疯狂的争斗，且常常是致命的政治迫害。在这种情形下，头面政治人物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党章的保护，他们同时被抛入了一场极其冒险的、政策变幻莫测的斗争中去。在这种艰难、危险又变化无常的形势下，以往谨慎原则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了；因此，林彪努力想通过强有力的个人组织把军队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后盾，但他的企图并未全部实现。另外，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上层政治家们对与正统原则相悖的种种措施感到失望，包括赤裸裸的宗派主义、军事行动计划及有预谋的暗杀。

导致谨慎原则和正统原则发生戏剧性变动的关键人物自然是毛。事实上，主席任意地改变这两类原则。在“文革”前出现的各种违反原则的行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攻击——在理论上毛支持了公开的政策，实际上也多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抛弃了正统原则。当然，后来毛有选择地支持了对林彪和“四人帮”宗派活动的打击。从60年代初开始，要想不通过主席而执行中央的谨慎原则就极其困难了，即使是林彪（他象其他人一样明白接近毛的必要性），最后在如何维持他和毛的关系时也彻底失算了。总之，纵观毛的一生，无论从领袖个人的命运来看，还是从影响政治生活的政策方针来看，这位有着感人的超凡的魅力的领袖，他的观点和理想都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毛的逝世使政治局领导得以预先制定周密的计划，清除破坏正统原则和削弱他们的权力的主要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原则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领导者们坚定不移地信仰着正统原则，因为正统原则使政治变成一种更安全的竞争。而对正统原则的信仰，则使他们又一次坚持了这些原

则，包括强调集体领导以限制邓小平的实际权力。由于这种坚持，1966年以前的许多小心谨慎的行动又重新出现了，如避免在职务选拔上过分地倾向任何一派，对引起争论的观点小心求同。另外，毛这位有着超凡魅力的领袖的逝世，相应产生出一种重要的需求，那就是补充仍然有效力的谨慎原则的需要使之与领袖相适应：领袖必须注意特定社会制度固有的根本利益，必须注意老革命家的意见。毛可以违反这种要求，他一直是至高无上的，但邓却更多地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关键部门的包围。

尽管邓的权力受到较多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仍是模棱两可和容易受政治环境及个人性格的影响的。虽然这些原则一直在强调，并一直在按制度化模式重建，但在这种条件下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权力问题的最后解决并不真正受正常议事程序的控制。所以，邓小平用不着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就能运用权力。而且，即使他担任了某一相应职务——如管理军事事务的军委主席<sup>92</sup>——权力也更多的是来自个人而不是这一职务。他在适时地采取折中和广泛协商的手段以取得支持方面表现的技巧是相当高超的。显然，邓要破坏上层的利害关系却不能推行失败的政策，但在对权力的变动没有制定议事程序的情况下屈服于正统原则、打破谨慎计划的权力仍然是可以考虑的。

邓以后的时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苏联化的政治（强调正常的职务任命和对组织利益的权衡）似乎会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邓以后将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过渡时期。到那时，中国革命的独特结局和毛的规则，仍然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发生强烈影响。在更加制度化的模式占主导地位之前，首要的问题是在革命的先辈去世后怎

么办。在此之前，他们虽然由于年事已高而不能担负全部领导责任，但对党委仍将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有当制度化模式占主导地位时，个人“关系”才会被组织联系所代替。”

鉴于中国正统原则的约束力仍然不会太强，因而政治必然仍带有个人化特征。不过，趋势还是明显的：主要政治领导人的作用范围，将随着制度化进程的展开而在逐渐缩小。

## 注 释

1. 以下集中讨论各个政治局关键领导人的策略，但许多结论也适用于中国的“八百统治者”。
2. 关于“文化大革命”10年间和毛去世后正统原则的兴衰，见泰韦斯的《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619—633页。
3. 即使是制度化程度很高的体制，其谨慎原则的脆弱也可在当代美国政治中得到反映。1980年里根总统的选举和他早期行政立法的成功，都违反了长期存在的关于必须争取中间力量的传统做法。国务卿黑格的命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即一种政治形态在一个民主管理的国家能获得辉煌成功，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会失败。
4. 除了这里考察的原则之外，在《中国的政治与清洗》中进一步讨论了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两条原则：纪律处分一般应宽大些，以利于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而且这些处分措施应由党的领导机关执行，由群众参加使其受到严格控制。经过研究之后，我认为和中共其他组织纪律相比，第二条原则的正规性很小，它的矛盾含糊性却很大。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至少最高领导层广泛地接受了这条原则。
5. 波兰自1981年下半年以来的军管，如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的作用一样，对于突出这个原则的作用，都是非常罕见的。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224页。

7. 见《赫鲁晓夫和苏联政治运动的原则》（文章提交给1980年8月在堪培拉召开的澳大利西亚政治研究会年会）第1—4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里格比的观点，只是略作修改而已。此外，我还没有把里格比提的“第四原则”包括进去。“第四原则”是说需要冒险。虽然人们同意冒险是政治的共同特征，并在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系列斗争的叙述中注意到这一特征，但在很多情况下，成功的政治含有避免冒险的成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领导政治尤其具有避免冒险的特征。
8. 见前编，第56—57页（英文版，下同——译者注）。
9. 见T·H·里格比《单一组织社会的政治》，此文收入安德鲁·C·雅诺什编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治：一党专政国家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关于这一矛盾对中国基层干部的影响，参见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117—120页中的论述。
10. 关于苏联政治局集体的利益重于政治局的下级机关利益的讨论，见迈伦·拉什《苏联的军事集结和即将到来的继承权问题概论》，载《国际安全》1981年春季号，第170—171页。
11. 略
12. 见乔纳森·R·阿德尔曼的比较研究《革命军队：苏联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0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观念重“文”（指有文学成就的文官）而轻“武”，（指的是军官），尽管儒家的“文”在时代需要的情况下能披上“武”的外衣。在中国革命中，这种传统观念受到了排斥。当然，文与武的区别加强了党指挥枪的概念。
13. 军队领导人在1956年党的“八大”以前大致占政治局委员的1/4，以后占1956年“八大”政治局总人数的1/3，占1969年“九大”政治局委员的45%，在1973年“十大”政治局中占1/6，占1977年“十一大”政治局人数的1/3，在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局中占1/4。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165页，以及下文第107、114、120页（英文版，下同——译者注）。

中共政治局的这种情形与苏共政治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苏联，职业军官进政治局的机会非常少。

14. 见本书第55—58页。

15. 见刘少奇1939年的论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6. 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现在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尽管它公然蔑视当时的合法权威。这一事件表明人民支持老一辈党的干部同“文化大革命”激进派的斗争。

17. 关于更进一步的讨论，见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三部分。

18. 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6人之一），也在1959年与彭一起被免职。陈云则在1961—1962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活跃起来，但一旦危机过去，他又消失在幕后。关于陈云消失，参见注31。

尽管1958年以后中央委员和主要部门负责人职务变动显然增多，但就“文化大革命”前整个时期而言，领导层还是比较稳定的。

19. 象第一编中提示的那样，自从毛在60年代初到中期（即1962—1965/66年）开始对他的政治局同伴失去信任时起，就出现了一个选择时机的问题。同样，在这一时期毛允许他的妻子在文化战线独立行动，而不是对政治局“分而治之”，这些行为表明毛泽东想在更高的领导层内树立敌对派。而林彪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地位日益增长，则可以被视作“分而治之”，我总的感觉是，60年代初这种趋势刚刚出现，只是到了1965年末和1966年初，毛对最高领导层中的伙伴的态度才明朗化。

20. 除了朱德（他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时期内没有发挥关键的实际作用）外，这个名单包括了1956年前书记处和1956年后政治局常委的所有人员。此外，它还包括了彭真。1949—1965年间，他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的重要职务。1964年，他被认为是毛的“亲密战友”。

21. 两人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都和毛有密切联系，林彪与毛的最初交往是在20年代末的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必须看到林和邓之间的一个很大区别，30年代初，林作为一个天才的军事指挥员已有自己独立的威望，而邓的提升，尽管反映了真正的才干，却更加依赖于毛的



庇护。

22. 见上第30页及下第106—107页。
23. 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5章。
24. 关于更详细的分析，出处同上，第9章。
25. 见上第66页和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420页。
26. 见华国锋1980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北京周报》1980年第38期，第22页。这里针对的是中、低层干部，但问题无疑也影响到了更高级的干部。
27. 对1955年集体化运动和“大跃进”资料的考察表明，热烈执行这些政策的省份，其省委领导层都呈现相对地不稳定状态。见泰韦斯《中国各省政治》，第167—174页。
28. 明显的例外是周对“百花齐放”试验的支持。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18—219、232、235—236、238—240页。
29. 参见上书，第86—90页、122—129页及前文第37页。
30. 关于相反的观点，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88、312、315页。
31. 在《中国的政治与清洗》一书中，我认为陈云已被降了级，尽管不是作为他反对“大跃进”政策而受到的正式纪律处分。这个结论，不同于研究其他人得到的所有结论，它是完全基于有关事实，而不是基于官方或红卫兵对陈的攻击。

相反的解释认为，陈云是自愿靠边的，因为他不愿意去执行他相信是错误的政策。这种说法当然和前面第二编第59—60页论述的传统观念一致。
32. 关于各野战军在1949年以后地方军区结构中的地位的最详尽资料，参见威廉·惠特森《中国共产主义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中国季刊》第37期（1969）。惠特森关于这些军队中权力政治的所谓冲突和力量对比的结论，我觉得站不住脚。
33. 见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中国大陆党的省级干部1956—196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增刊，1967年），第20页。和邓

- 明显的克制相反，赫鲁晓夫 1953—1955 年间任命了许多以前他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工作时的下级到中央和各省担任重要职务；里格比《赫鲁晓夫》，第 20 页。
34. 这项任命产生在邓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以前。胡耀邦受到邓的庇护的假设是根据胡 1952 年随邓从四川到北京以及他们早期的亲密关系这一事实推断出来的。
35. 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第 152—156 页。毛在 60 年代的退却（见前文 29 页）也反映了由于“大跃进”失败而产生的沮丧心理，但“二线”方案很明显是在努力为接班铺一条平坦的路。
36. 迈伦·拉什在《共产党国家如何改变他们的领袖》（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 年），第 295—298 页中论述说，在通常情况下，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仅要继承第一把交椅，而且也要巩固其领导地位。如果原最高领导人明确指定他为继承人，那么这种趋势就会得到加强。
37. 在这里时间问题再一次变的至关重要（参见注 19）。1964—1965 年，可能由于毛对刘不再欣赏，使他对继承问题作了重新考虑。明显的迹象有。1965 年林彪日益增长的声望，此外，大约在那时彭真也被视为是一个可能的继承者。见前第 30 页以及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 503—504 页。
38. 见前第 24—25 页、29、40—41 页。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几年许多不稳定方面的详述，参见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 491—492、495—506、572、592—596 页。
39. 《陈毅言论集》，第 25 页。
40. 见前文第 27 页。当然，毛之所以选林彪为接班人，还可能因为毛在发动一场群众进攻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运动时需要军队的支持。另外，毛对革命未来的担心和对忠诚的革命接班人的需要，表明选择林为接班人决不仅仅是出于暂时结盟的考虑。
41. 例如教育改革和现代京剧。
42. 周恩来与美国报纸编辑代表团的谈话，引自 1972 年 10 月 12 日《纽

约时报》。

43. 虽然人们对林彪政变计划的揭露方式十分怀疑，而且内容也常常令人难以置信，但林消失后发布的各种文件及1980年审判林的同伙期间透露的有关资料却很有说服力，它们证明这场阴谋确实存在。
44. 引自1972年7月28日《纽约时报》。
45. 参见《问题与研究》1972年6月号，第2—4页。《起诉书》第27页以及哈里·哈丁《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势》，《年刊》1972年7月号，第73页。
46. 参见高英茅（音）和皮埃尔·M·佩罗尔《林彪流产的军事政变计划》，《亚洲概览》，1976年6月号，第566—567页。
47. 林彪和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的联系进一步由林倒台后军费开支严重下降的事实得到印证。见悉尼·H·雅姆《中国的国防负担，1965—1974》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中国：经济再估价》（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处，1975年），第460—464页。
48. 林、周和毛对于外交政策争论的确切差异和时间还不清楚。托马斯·M·戈特利布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派主义和三角战略的起源》（《兰德公司报告》，R-1902-NA，1977年11月）中对此作了富有新意的研究，认为林和周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始于1966年，林彪主张对苏联采取温和的外交姿态。在我看来，林对莫斯科的温和姿态是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与毛在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后采取的。参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伦敦：克鲁姆·赫尔姆，1978年）第220—224页。
49. 参见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的政治战略计划》，《兰德公司报告》R-548-PR，1971年2月，第52页。
50. 参见埃利斯·约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军队：介入的结果》（载《中国季刊》1973年第55期）尤其第452—455、460—464页中作的出色分析。
51. 出处同上，第470—471页；菲力蒲·布里奇哈姆《林彪的倒台》，《中国季刊》1973年第55期，第432页。

52. 见哈丁的《政治趋势》，第71、74—75页。
53. 从另一意义上说，林彪对激进派的吸引力也被“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件所破坏。比如，在新政治机构的人员配置上，林对解放军军官的支持要超过对群众代表的支持。
54. 庐山会议以后，人们执行“毛主席的农村经济政策”，努力控制农业上的激进主义；见丹尼斯·伍德沃德《农业运动：在中国农村的继续与变化（1969—1972）》《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1981年第6期，第105页。至于外交政策，1968年后半年开始的对华盛顿的外交试探，如果没有毛的批准，则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毛的态度转变了，他对1970年春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公开反应是严厉的。毛可能受了这一时期林与周争论的影响，或者甚至让他们互相攻击。总之，只是到了1970年10月，毛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才在一起公开露面。稍后在1970年底，毛才告诉斯诺说尼克松访华将会受到欢迎，从而公开表明了他的个人态度。参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87—702页。
55. 毛在庐山会议上的谈话记录收在高英茅的《林彪》一书第55—68页。
56. 可能存在另外的反周动机。布里奇哈姆在《林彪的倒台》一书第434页断定林彪和陈伯达直接攻击周恩来和其他重要领导是因为起草新的国家宪法时删去了国家主席的职位和涉及了毛的“天才”。
57. 见高和佩罗尔《林彪流产的军事政变计划》第561—562页以及《起诉书》第27—31页。
58. 只有对于这一时期来说，第一编批评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某些重要特征才适用政治高度分化，完全对立的政策方针和与之相应的上层派系，进行着阵线分明而尖锐的斗争。这种情况和1966—1976年的情况不同，那时林彪的计划没有公布于众，而且更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但“两条路线”模式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毛不倒向斗争的任何一边，也因为在对立的力量中间，还有一个中间派。
59. 据说毛泽东首先使用这个词来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35期，第26—27页。

60. 华国锋这样的官员处在一种矛盾的地位上，相对于老一辈官员来说，他们提升的速度超过了元老派中的某些成员，同时他们由于具有1966年以前的丰富工作经历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攻击的事实，又使他和激进派有明显的不同。这些官员也有别于级别稍低但上升速度更快的干部，后者的升官常常是整他们上级的结果。在邓小平被重用的时期，这些“直升飞机干部”，更倾向于和“四人帮”站在一边。当然，这两种类型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区分界线都不明确。  
对于华国锋来说，1976年他提升时，据说“四人帮”对他进行攻击，这表明他和激进派互不相容。见《起诉书》第10页。
61. 关于“四人帮”与陈锡联、吴德和李德生之间的可能合作，见厄尔·A·韦恩《中国各省重新配备领导过程中的政治斗争，1976—1977》，《现代中国》，1978年春季号，第126—127页。
62. 见埃利斯·约菲和杰拉尔德·西格尔《中国军队和职业化》，《共产主义问题》，1978年11—12月号，第1—5页；迪特默《权力的基础》，第53页；约翰·布赖恩·斯塔尔《1974年的中国：“除旧迎新”》，《亚洲概览》，1975年1月号，第12页。
63. 参见《问题与研究》1977年9月号，第76页。
64. 很明显只有3个人帮助毛，尤其重要的是毛的侄子毛远新，他已是“四人帮”的死党，他可以自由进出毛的住处。据说从1973年初开始，江青不得不经安排才能见到毛，而周恩来则是在1974年住院后才不能经常见到毛。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85—387页，王停《华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香港：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
65. 参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74—375、381—384、386、392—395、417页；《起诉书》第9—10页，默尔·戈德曼《邓小平与关于科学技术的争论》，《现代中国》1978年冬季号，第62—64页及前文第72—73页。
66. 据说主席为“四人帮”竭力引起他对周的怀疑而生气。见《北京

- 周报》1977年第35期，第26—27页；1978年第10期，第9页。
67. 见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624—626页。
68. 关于“四人帮”的派系活动，见《起诉书》，第13、24页；《问题与研究》1978年7月号，第99—102页；肯尼思·利伯索尔与詹姆斯·童以及袁赛纯(音)合著的《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的政治活动》，(安·阿伯：密西根中国研究文集，1978年)，第33页。
69. 见《问题与研究》1977年7月号，第112页；1977年9月号，第64页。
70. 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报》。
71. 见王停《华主席》，第114—115页，及前文第75页。
72. 将他们与华国锋进行对照不无益处：华1971年才到北京，而那些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首都活动。尤其值得考虑的是汪东兴，他作为中央警卫部队的司令官，其任务包括逮捕和监禁如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人。见帕里斯·H·张《汪东兴的崛起：中国安全机关的首脑》，《中国季刊》第73期（1978年），第130—132页。就华国锋来说，也许他在镇压天安门暴乱中态度最温和。
73.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赞叶剑英、李先念和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在1967年“2月逆流”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过激作法提出尖锐批评。见《北京周报》，1981年第27期，第22页及前文第70页。
74. 见帕里斯·H·张《中国政治：邓小平的奋勇探索》，《共产主义问题》，1981年1—2月号，第2—3页；《中国法律和政府》，1977年春季号，第52—53页。
75. 尚不知道华的打算，他当然有可能尽力把邓排除在领导层之外。不过，早在1976年12月华已同邓商量政策问题了。见《问题与研究》，1978年12月号，第103页。
76. 参见邓1979年3月的谈话。这次谈话使人联想到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邓宣称：“这次我好象引起了一场灾难”。转引自《中国大陆内幕》，1979年5月号，第1页。即使上述引文不真实，但人们显然认为邓和这三项政策紧密相连，而这些政策当时都

遇到了麻烦。

77. 见《问题与研究》1980年10月号，第96页。
78. 关于汪东兴，1979年在北京流传着一个关于他的故事，说他开始受到冷淡后便去读《三国演义》，想从中找到和邓搞好关系的线索，但他太不聪明而不能吸取《三国演义》中的教训。
79. 见前文第84—85页。
80. 陈云除了作为一个忠诚而随和的领导人的个人声望以及作为毛的“亲密战友”的重要身份外，他还具有50年代初、中期成功的经济政策以及1961—1962年经济恢复措施设计师的很高名望。见《争鸣日报》，1981年7月13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7月15日，第WZ—5页。
81. 人们不必采纳这种冷嘲热讽的观点，当这位旧路线的党的领导人认为，这场伴随着自由化而来的混乱在1979年初达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时，他就开始排斥这些冒险行为。
82. 关于起草的过程，见《北京周报》1981年第30期，第5页。作为“文化大革命”前毛的亲密合作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受害者，邓无疑非常乐意接受这样一个方案，即肯定主席大量的革命成就，而批评他晚年的错误。
83. 虽然新当选的书记处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整个工作经历中，与邓有一些重要的联系，但11个人中只有2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同他有联系。而其他的人则主要和诸如季先念、彭真等活跃人物以及其他已故领导人发生关系。同样，自1977年以来增补到政治局的13个人中，只有4人算得上邓的亲密合作者。
84. 关于人民解放军怨言的详细材料，见理查德·D·内瑟克特的《邓和枪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军关系》，《亚洲概览》，1982年8月号。
85. 见约菲和西格尔的《中国的军队和职业化》，第5—9、15页；奥克森伯格的《经济政策的制定》，第192页。
86. 见《中国大陆内幕》1982年11月号第1—7页上关于此事的文章。

《解放军报》1982年9月27日的自我批评，一方面区别于人们可以对已经作出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可以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在官方机构禁止“出版和广播和党中央决定相抵触的言论”的行为；出处同上，第6页。

87. 例如，关于1981年“自由主义”军队作家与释的事件，尽管也有可能反映了邓本人的倾向，但来自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压力比中共文化统治集团所带来的压力还要严重。是否如此，还无定论。见《争鸣》，1981年10月1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10月28日，第W4—10页。
88. 华国锋在国务院时，受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领导，他的职权范围包括公安、农业、科技等许多重要部门。见王停《华主席》，第79—82页。此外，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家们在1979—1980年间与华打交道时，对他日益增长的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
89. 见韦恩《中国各省重新配备领导过程中的政治斗争》，第150—151页。他用诸如作为同代人这样无力的标准夸大了可能与华有的联系；他提供的可靠资料表明，被任命的人中有5个与邓有明确的关系。相比之下，只有1人与华有关系。
90. 关于1977—1978年华国锋更为保守、邓更愿意进行变革的分析，参见利伯索尔《现代化的政治》，第8—14页。
91. 我只发现了一份半官方资料。这份资料表明华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这是一个湖南会议的报告。报告指责华阻碍农业责任制的贯彻执行；《大公报》（香港），1981年8月25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8月27日，第W1页。香港亲共刊物对华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指责，范围更广但又更加含糊不清。参见《争鸣》，1981年6月1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6月3日，第W4页。
92. 参见1981年7月21日《人民日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7月22日，第K5页；及《问题与研究》1979年2月号，第39页，1980年5月号，第83—84页。



93. 见《争鸣》，1981年7月21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2月2日，第U2页；《问题与研究》1980年10月号，第93—95页；以及《中国大陆内幕》1981年3月号，第16页。
94. 当然不可能知道这种合作所达到的程度，但我对1981年历史决议和其他官方发言对华1978年以后这一时期并不指责印象很深。关于于一届三中全会后华的错误的提示，参见注91。
- 还要注意的是1980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西方分析家（如：内瑟克特《邓和枪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军关系》，第697页）把华提出毛的口号“兴无灭资”解释为对邓的反击。但也有可能是华利用这次机会加强其在军队领导人中的地位。据邓自己讲，他当时也赞成这个口号；《问题与研究》1981年3月号，第98页。
95. 参见《北京周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北京周报》1980年第38期，第15—16页、19—24页。在这个报告中他是作为个人发言而不是宣读政府报告，并且在赞同改革措施耐用的是第一人称。
96. 除了担任总理职务以外（对邓来说这是一个标志），华还负责批邓运动，并共同负责镇压天安门暴乱，尽管他对此事的全过程都持谨慎和温和态度。参见王停《华主席》第101—108页。
97. 参见上文第87—89页。
98. 当华国锋被迫辞去党的主席职务时，他也辞去了军委主席一职，而这一职务以前一直是由党的领袖兼任。邓很显然希望由新的主席胡耀邦来担任这一职务，但由于军方的反对而作罢。这表明军队领导人只乐意服从邓的命令，就象邓没有担任军委主席职务时，他们事实上也听他的一样，但不愿被置于胡的指挥之下，因为后者缺乏必要的革命资历。见《争鸣》，1981年2月1日，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2月2日，第U3页，及见前文第89页。
99. 中国的仕途，如同苏联的一样，都倾向于使官员们局限于特殊的机构或者职能系统之中。这样一来，大批官员的个人关系就从组织上被限制住了。但对于老革命家来说，1949年以前的活动具有

很大的流动性，因而使他们建立了巨大而广泛的关系网。

## 译者后记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毛泽东，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存诸多先天不足，主要是观点上的一些偏颇和谬误，以及史实上的匮乏和失真。

在众多的西方著述中，我们发现，美籍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所著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原书名为《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由美国M·E·夏普出版公司于1984年出版），对毛泽东现象作了独到的剖析。因此，我们组织力量译出此书，奉献给我国的广大读者。

早在60年代初，泰韦斯先生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当代政治现象的研究生涯。他侧重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现象，著述甚丰。在本书中，作者发挥了马克斯·韦伯关于领袖权威三种类型学说，用以探究毛泽东崇高权威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几十年中，借助超凡魅力型权威，以自己的思想、意志，影响决定了中国的政策走向，建立了高层政治运行的独特模式，也形成了高层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独特格局。作者发现，在毛泽东超凡魅力强光下建构起的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人治重于法治。正由于形成了这种独特模式和格局，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类史无前例的事情才会发生，毛泽东接班人的悲喜剧才会以那样惊心动魄、那样奇特的方式上演。俱往矣！泰韦斯教授不无欣喜

地发现，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于世。新的领袖集团，努力剔除人治因素，铸出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和机制，逐步走上法治的健康轨道。

当然，由于本书写作时间较早，加上受到资料和西方某些学术政治倾向的局限，泰韦斯这部著作尚存有史实、分析等方面的一些缺陷。金春明教授在他为本书写的序言中给予了中肯的说明。我们相信，读者也一定会予以鉴别的。

出于出版便利等方面的考虑，原书的鸣谢和索引等没有译出，并对某些细节作了适当的处理。为了方便读者，原来的全书正文后的注释改为编后注释。

本书翻译的组织工作和译稿的统校由王红续承担。翻译的具体分工是：王红续（导言、第一编、第三编第五章等），宫力（第二编），喻晓（第三编前四章）。

金春明教授精心审阅了本书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并为之作序。本书作者泰韦斯教授热情地写来了中文版序言。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激。

王 红 续

1990年7月